新建設

學術性月刊

6

1953

理論學習與經濟建設……高林（一）
學習「資本論」第一卷……王學文（五）
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王南（八）
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關夢覺（一二）
讀「學習和時局」的一些體會……梁純夫（一六）
紀念「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發表三週年
評對於語言文字的一些保守觀點……鄭林曦（一九）
關於學習祖國語文的幾個問題……汪金丁（二四）
紀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週年
屈原傳……鄭振鐸（二八）
「屈原集」前言……文懷沙（二九）
屈原文學作品的人民性……游國恩（三一）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
論第二次鴉片戰爭（下）……馬克思（三四）
黨內危機和我們的任務……斯大林（三八）
馬列主義基礎參考資料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國民經濟計劃化……（四一）
斯大林著作中譯文簡目……（四五）
新書介紹
介紹「蘇聯初期文化建設史略」……楊履武（五〇）
國內報刊重要學術論文提要……（五三）
國外報刊重要學術論文介紹……（五八）
新書簡介……（六五）

新建設
（學術性月刊）
一九五三年六月號
（總第57期）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日出版

編輯者：新建設雜誌社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新建設雜誌社
北京東華門南夾道62號
總發行處：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購處：全國各地郵電局、所
代訂代售處：全國各地新華書店、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印刷者：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

定價：每冊四千元
預定：全年十二期 48,000元
半年六期 24,000元
三個月三期 12,000元

廣告刊例
封底全面三百萬元，半面一百六十萬元。封內全面二百萬元，半面一百一十萬元。

本期印數：1—38000

理論學習與經濟建設

高林

一

「中共中央關於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幹部理論教育的指示」，規定了全黨幹部理論學習的內容、步驟和方法，這不但將會進一步加强和鞏固各級幹部的理論學習制度，並將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個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新高潮。所以，這個指示的發表，是中國人民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我們偉大的祖國已經跨上了新的歷史時期，今年是我們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全國人民已經動員起來，爲使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爲强大的工業國而努力奮鬥。「爲了適應全黨在進入經濟建設時期的需要」，正如指示中所說的，就「要求全黨主要幹部都能有系統地瞭解蘇聯實現國家工業化、農業合作化和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以便在我國經濟建設過程中根據我國具體條件正確地利用蘇聯的經驗」。因此，我們加强理論學習，不是「爲學習而學習」，而是爲完成擺在我們面前的偉大經濟建設任務而學習，是通過理論學習，使我們更好地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把自己武裝起來，加緊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經驗，來指導我們的國家建設工作。

二

這是一個艱鉅而光榮的任務，它首先要求每一個國家幹部都能正確地認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對於我們的革命實踐是具有偉大的指導作用的。列寧說過幾十遍了：「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也正如斯大林所說：「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爲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㈠；「理論如果是眞正的理論，就能賦予實際工作者確定方針的能力，明白認識的前途，進行工作的把握，確信我們事業必勝的信念。」㈡這眞正的理論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眞理。

「理論只要一掌握羣衆，就立刻成爲物質的力量」（馬克思）。對於我們中國人民來說，從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就更能深切地認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不可戰勝的力量了。因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眞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論聯合政府」）㈢；我們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與一降生就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所武裝的中國共產黨不可分的，是與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可分的；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也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

非常明顯，在一切國家建設工作、特別是在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中，我們如果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爲指導，就一定不可能完成任務，並且會在工作中走彎路，甚至會跌交子。斯大林教導我們：經濟法則是反映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法則；如果否認經濟生活中有客觀規律性的存在，「這就會使我們陷身在混亂和偶然性的王國，使我們處在奴隸似地依賴於這些偶然性的地位，使我們不僅失去了解事情的可能性，而且簡直會在這偶然性的混亂中瞎摸」㈣。而我們祇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照耀和指導之下，才有可能發現和認識這些客觀的規律性，再進一步依靠和利用它們來爲社會謀福利。正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結束語中所說：「馬列主義理論强有力的地方，就在於它使黨能判明局勢，能瞭解周圍事變底內在聯繫，能預察事變的進程，不僅能察知事變在目前怎樣發展和向何處發展，而且能察知事變在將來會怎樣發展和向何處發展。」㈤工人階級的黨，不論是領導革命鬥爭和生產建設，其所以能够無往而不勝，就因爲它精通生產發展的規律、社會發展的規律，也就是因爲它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我們的廣大幹部內，經過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林科夫同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以後，儘管已經普遍認識到理論學習的重大意義，但是他們對待理論學習的態度，還不是完全正確的。有不少同志認爲理論學習對高級幹部是重要的，對製訂政策方針是有用的；但對一般幹部是「可學可不學的」，「不學理論也照樣可以工作」，「也同樣可以執行上級交下來的任務」。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十分有害的。我們必須認

㈠ 均見「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三六頁。

㈡ 同前引書，第三七八頁。

㈢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一一一七——八頁。

㈣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三頁及第七八頁。

㈤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四三三頁。

清：黨和國家的一切政策方針，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具體革命實踐的結合，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實際運用。祇有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人，祇有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實質以後，我們才能正確地、勝利地執行這些政策、方針。否則的話，一旦遇到了新的情況，出現了新的問題，就會感到束手無策，就可能在工作過程中知難而退或者碰得頭破血流。斯大林曾給我們指出：「在國家工作和黨工作任何一個部門中，工作人員底政治水準和馬列主義覺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底結果也愈有效力；反過來說，工作人員底政治水準和馬列主義覺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誤和失敗也愈多，工作人員本身也會愈加變爲鼠目寸光的小人，墮落成爲一些只圖眼前利益的事務主義者。」(六)這就是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對於一切幹部都是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七)。不肯學習或不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都是一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懶漢。

也有些同志認爲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應該學習的，但「多少學一些就得啦，用不着鑽進去」，好像一鑽進去，就成爲教條主義者了。這種態度也是必須予以批判的。我們强調理論對實踐的巨大指導作用，並沒有否認革命理論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因爲，「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綜合經驗」，「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八)。我們學習理論既爲了指導實踐，既爲了「找出方針，制定政策，拿出辦法」，既爲了更好地完成我們的工作任務，我們就不會把理論與實踐割裂開來，當然不致於成爲教條主義者。剛剛相反：我們的學習愈深入，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愈提高，我們就愈能通曉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愈能熟練地運用這些規律，來進一步推動我們的國家建設工作。毛主席在「論新階段」中早就說過：「我們的工作做得還不錯，但如果不加深一步的學習理論，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們的勝利。因此，學習理論是勝利的條件。」(九)

所以，爲了在祖國的經濟建設戰綫上獲得更大的勝利，我們對廣大幹部所要求的理論學習，並不是「多少學一些」，而是要求一步步深入。今天，我們學習經濟工作、學習業務技術，要鑽進去；同樣地，對理論學習，也不能停留在不求甚解或咬文嚼字的階段，也要鑽進去。「在科學上面是沒有平安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勞苦的人，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十)。我們如果要真正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就必須抱決心，下苦功，絕不能「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要牢牢記住毛主席的話：「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一一)

誰都承認，解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之下，全國廣大人民在思想上的進步，是非常顯著、空前迅速的。但是，我們也無可否認，在各條戰綫上，我們的思想戰綫却顯得比較薄弱。我們的思想工作，還遠遠地落在經濟發展的後面。在好多工作部門裏，都感到思想領導不强，這是什麼原因呢？馬林科夫同志給我們指出：這是「沒有努力提高自己的覺悟、充實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和吸取黨的歷史經驗的結果」。那末我們怎樣才能提高工作中的思想性呢？

唯一的辦法，就是加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祇有通曉了社會發展規律，祇有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們才能對具體的情況作具體的分析，得出正確的結論，來指導我們的革命實踐，並把我們引向勝利。所以，我們必須加强思想工作，並把它放在特別重要的地位。誠如馬林科夫同志所說：「思想工作是黨的首要職責，不重視這種工作就可能給黨和國家的利益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我們必須時刻記住，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任何削弱，都是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增强。」(一二)

三

這種低估思想工作的重要性的現象，在我們的財經部門裏，是相當嚴重的。許多經濟工作幹部都忙於浩繁的實際事務，輕輕地把理論學習放在一邊，認爲「學習理論好是好，祇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由於他們只顧經濟事務，往往使思想工作處於無人照顧的狀態，就給國家建設事業造成了不少損失。今年一月六日，在中央財經各部部長會議上討論改進領導工作時，薄一波副主任一針見血地指出：「爲了作好工作，我們必須首先弄清楚我們要反對什麼，提倡什麼。」我們「必須反對企業管理工作中的供給制殘餘，提倡經濟核算制的觀點；反對國家建設工作中的盲目積極性，提倡計劃性；反對保守思想，提倡發掘後備力量和潛在力量」(一三)。在我們的經濟工作中，爲什麼會存在這種

(六)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七八二頁。
(七)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七四頁。
(八) 與註(一)同。
(九) 轉引「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九五〇年解放社版，第四三八頁。
(十)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序文第十九頁。
(一一) 與註(九)同，第四四〇頁。
(一二) 以上兩處，均見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版，第九二——三頁。
(一三) 見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保守主義、盲動主義和本位主義的思想作風呢？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於缺乏思想領導，好些工作幹部沒有全局觀點，祇是表面地、片面地、主觀地看問題，不能了解事物發展的內部矛盾，也不能掌握它的規律性，當然「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因而，在工作上就「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引自「實踐論」），而成爲庸俗的事務主義者和狹隘的經驗主義者了。

對於這種不健康的現象，我們當然不能熟視無睹。要糾正它，就得從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入手。蘇聯共產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疆區委書記奧爾加諾夫在「關於經濟工作中的黨性」一文中說得對：「一些經濟工作者在工作中產生不正確的方法的原因之一，是他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不够。一個經濟領導者，如果他願意成功地完成委託給他的事業，他應該一貫堅持地學習，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㊀㊃

從各地的報導來看，全國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學習馬林科夫同志的報告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以來，對改進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已經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許多財經部門，且已收到顯著的成效。如國家計劃委員會在學習過程中，討論了國家建設的方針、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比例關係及當前基本建設中的一些問題，一致認爲國家建設必須抓住主要環節，反對分散主義思想，反對「百廢俱興」、盲目建設的思想和本位主義，反對不從全局出發的局部觀點。財政部的高級幹部在學習中檢查了工作中違反經濟法則的錯誤思想；中華全國合作總社機關幹部結合學習了蘇聯經濟核算制的經驗，提出了改進全國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的辦法。其他中央和各地財經部門的廣大幹部，多以馬林科夫報告的第二部分爲重點，學習蘇聯經濟建設的先進經驗，並檢查了自己的工作，分別提出了改進的辦法。

經過了這次的理論學習，對推動工業生產所起的作用，特別值得我們重視。以東北區一級工礦機關爲例，許多幹部學習了馬林科夫報告中關於工業的部分後，不但對我國目前進行的大規模經濟建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並且對工業生產上的一些基本問題，也從思想上得到了解決。如：過去許多幹部滿足於個別車間和個別小組的新紀錄，對均衡生產的重要性是認識不足的。經過學習後，對均衡生產從理論上有了更深的了解，大家並對一些工廠作了檢查，發現在個別車間和小組雖然出現了許多新紀錄，但因生產不均衡，這些新紀錄並沒有眞正使生產提高。這就使大家對均衡生產的重要性，有了更明確的認識。又如：在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個問題上，過去大多光是從提高技術方面去考慮，很少從各種條件進行全面的考慮。因而，有些企業單位的產品增加了，隨着人員也增加了，結果，成本降低很少，甚至沒有降低。經過學習以後，才認識到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必須從提高生產技術、改進勞動組織、增加機器設備等各方面去考慮，這樣，就克服了過去對這個問題的片面觀點。

不用說，理論學習對推動農業生產方面，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以河北省爲例，過去在國營農場中缺乏經濟核算，由於忽視副業的發展，就發生了季節性的勞動力的浪費。對經營中的某些資本主義思想和表現在分配問題上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也沒有認眞地糾正過來。通過馬林科夫報告的學習，領導幹部已深刻地認識到這些弱點，正在設法改進中。爲了加強經濟核算，國營農場中決定進行三定（成本定額、效率定額、產量定額）和計劃生產，目前已經着手進行查定工作了。在東北方面，一些高級農業幹部學了馬林科夫報告以後，都加強對羣衆生產實踐的重視，批判了對羣衆豐產經驗不加認眞研究的錯誤態度，揭露並批判了過去只在口頭上鑽研米丘林學說、實際上仍搞孟德爾、莫爾根的一套，產生了使農業科學脫離實際脫離羣衆的錯誤傾向。由於在這些問題上提高了認識，對推廣豐產經驗（如推廣肇源縣的豐產經驗）和發掘東北農業生產的潛力，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這些具體的事例，都集中地表明起來：理論學習對我們的經濟工作，是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的。在個別的財經部門，由於接受了理論的指導，在短期內已使生產建設有了飛躍的發展。如鐵道部鋼管部門解決了嚴重的廢品問題，石景山鋼鐵廠克服了生產不均勻的現象，中國百貨公司也糾正了盲目調撥商品的現象而確立了經濟核算制度。

當然，我們強調理論學習的重要性，也不應該把這個問題孤立起來看待。理論學習對指導經濟工作之所以能够發揮這樣顯著的效果，基本上還是因爲理論學習是服從於當前工作任務的需要。這就是說，它是從理論上提高幹部的政策思想水平，以達到改進當前工作的目的。而這種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方法，就正是我們理論學習的最基本的方法，也正是我們理論學習的最主要的特點。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諄諄教導我們：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眞理，是「爲了革命實踐的需要」，我們要學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㊀㊄。

四

我們的祖國正在進行着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但是，「沒有正確的領導方式

㊀㊃ 一九五三年一月四日「眞理報」，譯文見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

㊀㊄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一七—八頁。

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開展經濟戰綫上的運動，是不可能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㊀㊅。因而，對於各級領導幹部來說，理論學習就格外來得重要了。在過去，我們對於高級幹部的理論學習，是不够重視的，甚至在某些高級幹部中還產生一種「抓住了業務，丟掉了政治」的傾向。在這次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過程中，發現了不少高級幹部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知識都搞忘了。據一個省的省級機關統計，參加高級組學習的一百二十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對法則、價值、利潤等概念弄不清楚。㊀㊆這更說明加強高級幹部理論教育是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了。毛主席從來就很重視高級幹部的理論學習，他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國共產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曾這樣號召：「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並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說，幹部應當着重地研究這些，中央委員和高級幹部尤其應當加緊研究。」㊀㊇

我們必須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把高級幹部的理論學習重視起來，並且要堅持下去。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的高級幹部，就因堅持了理論學習制度，結果，他們的政治眼界擴大了，政策思想水平也大大地提高了，所以，他們能够克服某些幹部中的本位主義和事務主義的作風，改進了他們的領導方法，使工作少走了許多彎路。爲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爲了提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我們必須要求每一個高級幹部都能自覺地加强理論學習。斯大林早就說過：「爲着要領導，必須有預見。」沒有預見，就不能預察事變的進程，就不可能進行正確的領導。可是，要有科學的預見，就「應當從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爲我們行動的嚮導」㊀㊈。前面已經說過，我們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就容易掌握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就可能預見事物發展的趨向，也就可能正確地來決定工作的方針和步驟了。所以，爲着要正確的領導，必須有預見；爲着有科學的預見，就必須好好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

當然，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也不能「一曝十寒」或「囫圇吞棗」，我們應該根據具體的情況，訂出學習的計劃和進度來。在今後的一年半內，我們必須以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爲主。因爲，這「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改造我們的學習」），「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最偉大的友誼」），「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眞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㊁㊉。爲了進行偉大的國家建設，毛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號召我們要誠心誠意地向蘇聯學習。「不僅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而且要學習蘇聯先進的科學技術。」㊁㊀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就是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蘇聯的一本最完善、最合適的百科全書。

「中國靠我們來建設，我們必須努力學習」（「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㊁㊁。毛主席的這個英明的指示，就是我們今天的行動綱領。我們要加强和鞏固思想戰綫，使我們的理論工作不僅要趕上實際工作，並且要超過實際工作，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光輝照耀之下，高舉着毛澤東的旗幟，爲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並向着社會主義前進而奮鬥。

㊀㊅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一九頁。
㊀㊆ 參閱一九五三年五月六日「人民日報」。
㊀㊇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四九五頁。
㊀㊈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二〇頁。
㊁㊉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二三頁。
㊁㊀ 見「新華月報」，一九五三年三月號，第十三頁。
㊁㊁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一〇四一頁。

蘇聯出版「毛澤東選集」俄文版第二卷

莫斯科外國書籍出版局繼去年五月間發行「毛澤東選集」俄文版第一卷後，最近又出版了俄文版第二卷，受到蘇聯讀者的熱烈歡迎。出版局是把「毛澤東選集」中文版第二卷分成兩卷——第二卷和第三卷用俄文出版的。俄文版第三卷正在準備付印，預計可在今年六、七月間發行。

朝鮮出版「毛澤東選集」朝鮮文版第一卷上册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上册的朝鮮文譯本已由朝鮮勞動黨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決定把「毛澤東選集」各卷分爲幾個分册翻譯出版。

「勞動新聞」在報道中扼要地介紹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上册的內容。

保加利亞出版「毛澤東選集」保文版第一卷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保加利亞文版已經出版。這是保加利亞共產黨出版局根據俄文版轉譯成的。

學習「資本論」第一卷

——慶祝「資本論」中譯本重版本出版

王學文

一

一九五三年是我們偉大的導師馬克思逝世的七十週年，是他誕生的一百三十五週年。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已決定今年爲紀念馬克思年。在我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已經開始的今天，革命導師的偉大著作「資本論」的中譯本重版本出版，是有着它的重要意義的。

「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之一。是「馬克思理論最深刻、最周到和最詳細的證實和運用」。㊀按照馬克思的計劃，他的政治經濟學，共分爲：（一）資本，（二）土地所有，（三）僱傭勞動，（四）國家，（五）國際貿易，（六）世界市場㊁六個部分。這個計劃，馬克思未能完成，他只寫了第一個部分——資本。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資本論」一、二、三卷和「剩餘價值學說史」。此外，還有大批政治經濟學的草稿，在蘇聯已公佈了其中一部分。

「資本論」照恩格斯的意見說來，是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爲研究對象的科學。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世的時候，還未建立起來㊂。但馬克思不單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闡明了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法則，也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各種經濟，闡明了某些經濟運動的法則，並且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也有若干預示，爲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廣義的政治經濟學，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不同發展階段上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法則」的科學㊃。

「資本論」的最後目的，照馬克思說來，在於闡明資本主義社會底經濟的運動法則，也即資本主義經濟的發生、成立、發展和死亡的法則㊄。

「資本論」所闡明的是資本的運動法則，也即資本的生產法則、資本的流通法則與資本的總生產法則。資本的運動同時是剩餘價值的運動，資本的運動法則同時也是剩餘價值的運動法則，即剩餘價值的生產、實現與分配的法則。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把剩餘價值當作中心問題來研究的。馬克思指出：在資本的運動過程中，也即剩餘價值的運動過程中，資本主義經濟所以發生、成立和發展，同時闡明其所以死亡，由高級社會主義社會來代替的必然性。在資本主義支配下的無產階級，爲了反對資本主義，解放自己，解放人類，獲得勝利，需要掌握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法則這個有力的武器。

二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分析龐大複雜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象，發現商品交換是「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社會)裏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平常、隨時隨地都可碰見的關係」㊅。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原素形態(財富的「細胞」)。商品是對立物的統一體，它統一着各種互相矛盾的對立物——其中有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矛盾、個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等等。在商品生產過程中生產商品，同時商品內在的矛盾也產生出來了。商品內在的矛盾需要在商品交換過程中來解決。商品經濟的運動，是不斷地產生矛盾，不斷地解決矛盾。價值法則在商品經濟運動過程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商品運動的結果產生貨幣，貨幣產生以後，在商品流通過程中，有商品的流通，同時有貨幣的流通。在貨幣流通過程中，貨幣流通的法則起着支配的作用。商品和貨幣的運動發展到一定程度就產生資本。資本的產生，表示着商品經濟相當高度的發展，不單一般生產物(包括生產資料與消費資料)當作商品生產出來，在商品市場上出賣，同時人的勞動力也當作商品出現於勞動

㊀ 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解放社版，第二七頁。
㊁ 見一八五九年一月「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㊂ 見「反杜林論」，第二編，第一章。
㊃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六四頁。
㊄ 見「資本論」第一卷初版序和第二版跋。
㊅ 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第二七九頁。

市場之上，於是資本的所有者出現於市場（包括一般商品市場與勞動市場）以其貨幣（貨幣形式的資本，這時還是可能的資本）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將二者在生產過程中結合起來生產商品。

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的商品，認爲它和簡單商品不同：簡單商品是由使用價值和價值兩個因素形成的；資本主義的商品，不只有使用價值和價值，而且價值之中還包含有剩餘價值（即生產物價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剩餘價值）。因此，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時是剩餘價值的生產。剩餘價值生產出來，就是資本家所要剝削的東西生產出來了，僱傭勞動者被剝削的東西生產出來了，也就是資本家和僱傭勞動者的生產關係生產出來了。在資本的生產過程中，由於剝削了剩餘價值，可能的資本也就成爲現實的資本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詳細地分析了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即如何由於延長勞動日（勞動時間）而產生的絕對剩餘價值和如何由提高勞動生產力（在一定勞動日內由於縮短必要勞動時間而相對地延長剩餘勞動時間）而產生的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由此闡明剩餘價值生產的法則。剩餘價值的生產是資本家生產的目的和動力。馬克思分析剩餘價值生產的法則之後，又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的工資。

資本主義的生產，不是一次的生產，而是再生產。資本主義的再生產是資本主義商品的再生產，是剩餘價值的再生產，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再生產有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兩種形式。資本主義的簡單再生產是資本家把其所得的剩餘價值全部用於生活上的消費。其生產按原有的規模繼續下去。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是資本家消費剩餘價值的一部分，而以一部分剩餘價值化爲資本，擴大原來的生產規模。剩餘價值的資本化，叫做資本的積累，在資本的積累過程中，商品生產的所有權法則轉變爲資本主義佔有的法則，資本的集聚和集中的法則，資本主義的人口法則，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法則等等起着一定的支配作用。

馬克思在「所謂原始積累」一章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成立的前提條件和它的過程，指出了資本的形成過程是對於農民的盜劫欺詐的過程，是生產者的生產資料被剝奪的過程。馬克思又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必然地走向獨佔（壟斷），獨佔的形成，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高度的程度，和資本主義的外殼不能兩立。「這種外殼會被破裂。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響起來了，剝奪者被剝奪」㈦。

三

以上是「資本論」第一卷資本的生產過程的概略敘述。我們由此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是怎樣進行的，它是怎樣生產剩餘價值、怎樣生產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剩餘價值又怎樣積累爲資本，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過程中，存在着那些經濟法則。並揭示了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的私人形式之間的基本矛盾，以及這種基本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

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一卷，也如同第二、三卷一樣，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解剖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象。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是從其構造和運動兩方面來認識的。他首先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即資本家和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關係來看其如何構成，同時更重要地從其活生生的不斷的運動和變動，也即從其發生、成立、發展和衰亡的運動過程中來看其如何變化。

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經濟的構造與變動的實際情況出發，搜集了詳細的多方面的材料，加以分類整理，進行週密深入細緻的考察，分析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變化。這種研究方法，也就是從資本主義的經濟現象以至經濟關係的統一聯繫性上、運動發展過程上、質量互變上、與對立鬥爭上來觀察分析。簡單說來，是以唯物辯證的方法來研究的。因爲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是按其自身的法則運動的，科學地反映這種運動法則的，就是唯物辯證法。所以運用唯物辯證法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就能夠正確地深刻地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並理解其運動法則。這同時也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爲理論指針，歷史地全面地本質地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和它的內在的發展動力。而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首先從資本的生產過程中來認識資本以及剩餘價值的生產法則。

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的法則，是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條件產生出來的客觀存在的法則。不管人們主觀上認識和相信與否，以及認識和相信的程度如何，它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過程中起着支配的作用（或者說起着決定的作用）的。根據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的法則，不只可以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生、成立和發展的必然性，同時也可以證明其沒落的必然性和向社會主義社會轉化的必然性。通過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的法則，人們不只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有肯定的理解，同時也包含着其否定的理解。照斯大林的說法，它是「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高漲和危機，它的勝利和失敗，它的長處和短處，——它的矛盾發展的全部過程」㈧。不用說，在「資本論」第一卷裏所敘述的，並不是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全部過程和支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法則，而只是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和支配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的法則。至於資本的流通過

㈦ 「資本論」，第一卷，中譯本重版本，第九六四頁。

㈧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五頁。

程與資本的總生產過程與其運動的法則，那是「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所要闡明的主題，就不在第一卷範圍之內了。

四

「資本論」中譯本重版本的出版，首先第一卷的出版，在新中國有其重要的意義。

第一，在世界上還有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資本家集團為了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不只剝削本國的無產階級與其他勞動人民，並且剝削落後國家的人民。我們閱讀「資本論」，可以認識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生產的法則與其生產發展的趨勢。新中國和資本主義國家及其附屬國家在經濟上有一定的關係，雖然美帝國主義對我實行封鎖禁運，但這並不能完全斷絕這種經濟上的聯繫。我們為了深刻地了解資本主義經濟情況，採取正確的政策，所以，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及其運動法則的知識是必要的。當然資本主義已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為了深刻地了解帝國主義，還要學習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列寧、斯大林關於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學說、以及斯大林的遺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關於現代資本主義的部分。這些著作都是「資本論」的繼續和發展。

第二，新中國國內有簡單商品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我們為了深刻地了解簡單商品經濟（簡單商品生產及價值法則）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剩餘價值生產及其法則），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知識是需要的。不用說，新民主主義社會內簡單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在照顧其基本要求的條件下，即個體經濟要有利，私人資本要一定利潤的條件下），要按經濟方針與經濟政策辦事，並向一定方向發展（個體經濟向合作經濟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向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同時其經濟活動範圍要受到一定限制的（如直接間接限制其盲目的生產與盲目的經營，私人資本家只准獲取合理利潤，不許有「五毒」行為）。這與一般簡單商品經濟及一般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不同。

第三，「資本論」第一卷中關於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的材料甚多（「資本論」以英國為研究的典型），便於我們了解英國資本主義初期及發展時期的經濟情況（如關於勞動日，機器與大工業的各種史料，資本積累的一般法則的例解，所謂原始積累等）。我們要研究近代中國經濟發展史，尤其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那末，對於「資本論」第一卷中的這些英國史料及其分析，就應好好地加以學習。此外，第一卷中關於協作與分工的敘述，也是很好的歷史材料。我們通過這些經濟發展的歷史材料，可以具體地了解社會經濟的實質及其運動法則。

第四，「資本論」又名「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建立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巨著，其中第一卷本文及附註中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包括庸俗派經濟學）的地方甚多。我們讀「資本論」第一卷，掌握其精神與實質的時候，可以用作武器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錯誤觀點。只有正確地深刻地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觀點，才能不受其錯誤的經濟思想的影響，順利地進行我們的經濟工作。

第五，「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二、三卷一樣，是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好著作。列寧在「哲學筆記」中說：如果馬克思沒有留下「**邏輯**」的話，那末他留下了「資本論」的**邏輯**。我們從第一卷可以看到這種科學的觀點與方法。如果我們學會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運用這種觀點和方法解決新中國經濟建設上一些問題及其他問題，對於我們的經濟工作以及其他工作是有益的。

「資本論」第一卷是馬克思不朽的偉大著作之一，具有極大的科學的革命的意義。希望有閱讀能力的讀者細心閱讀，不怕困難，堅持學習下去，並要學習掌握其精神與實質，學會靈活地運用。馬克思說：「在科學上面是沒有平安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勞苦的人，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⑨讀者們，努力罷！

---

⑨ 「資本論」第一卷，「法文譯本之序與跋」。

「資本論」中譯本重版本出版

人民出版社自今年五月起出版馬克思的偉大著作「資本論」中譯本的重版本。這個重版本是郭大力、王亞南就他們一九三八年的譯本重新校訂的。這個版本改正了初版本一些譯文上的錯誤，改譯了一些名詞，並整段重譯了某些段落。這一重版本和一九三八年的譯本一樣，附有馬克思和恩格斯二十幾篇關於「資本論」的通訊，分編在各卷後面。第一卷還附有馬克思一篇論文和恩格斯介紹「資本論」第一卷的文章。第三卷後面附有恩格斯為「資本論」第三卷寫的一篇「增補和跋文」。

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

——關於「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

王　南

毛主席在「最偉大的友誼」中指出：「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不朽的文獻。他所著『列寧主義基礎』、『蘇聯共產黨歷史』以及他最後的偉大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是百年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經驗的綜合。」㈠

還在十二年以前，毛主席曾教導我們說：「『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㈡

我們應當怎樣來理解毛主席的這一教導呢？「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為什麼是百年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經驗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呢？為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呢？下文先就這兩個問題簡略地加以說明。

首先，我們應該明白什麼是共產主義。毛主席告訴我們：「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別於任何別的思想體系和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㈢正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共產主義學說、共產主義運動，首先出現於人類最先走上資本主義，最先出現無產階級，最先展開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歐洲，首先出現於造成十九世紀人類三個主要思潮這些優秀成果的歐洲㈣。而處在歐洲的德國，它當時具有比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的法國更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它是當時革命運動的中心。所以德國無產階級的領袖馬克思與恩格斯就成為共產主義學說的偉大首創者與奠基人，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最先的最偉大的導師。

馬克思、恩格斯參加了以及總結了發生在歐洲和美洲的一些革命運動，一直關心到中國的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特別是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馬克思、恩格斯對一切非科學的社會主義，進行了毫不調和的鬥爭。他們第一次闡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社會主義社會的創造者與建設者，論證了資本主義滅亡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必然性，因此把社會主義從空想的變成科學的。他們創立了和領導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以及偉大的「第一國際」。所有這一切，就使共產主義必得冠以光輝的馬克思的名字——稱之為馬克思主義。

當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的時代，革命中心轉移到俄國來了。俄國成為帝國主義各種矛盾的集合點，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前夜，具有比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更為發展的無產階級。因此，俄國無產階級的領袖列寧與斯大林就成為馬克思與恩格斯的事業的天才繼承人。「俄國革命家認為自己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著名鼻祖之學生和繼承者」㈤。列寧和斯大林繼續豐富了與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將它發展到新的階段。列寧和斯大林在俄國創立了眞正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的黨，用這個黨領導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經歷三次革命取得勝利，在革命勝利以後，建成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它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這樣，首先由馬克思、恩格斯所論證了的共產主義這樣「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到列寧、斯大林才被證實和實現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開始了。因此，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勝利時代的共產主義，也就是說這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就必得冠以光輝的列寧的名字——稱之為列寧主義。

由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到列寧、斯大林的時代，由一八四八年到現在，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有了百年以上的歷史。在這一百年之中，蘇聯共產黨所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社會建成的勝利，就是共產主義首先在蘇聯的勝利，就是自從馬克思、恩格斯以來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首先在蘇聯取到的勝利。把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勝利，脫離開這樣一百年的歷史而孤立

㈠「偉大的斯大林永垂不朽」，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一—二頁。
㈡「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八二三頁。
㈢「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六五七頁。
㈣參閱「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七〇頁。
㈤「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四一頁。

地來看，是不正確的。

斯大林的偉大著作「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總結了蘇聯共產黨領導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蘇聯共產黨是吸取已往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運用馬克思主義來進行領導的。因此，「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同時又是列寧、斯大林「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眞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㈥的歷史。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指明這一點，是異常重要的。

正因爲這樣，所以，那些只是表面地看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對歷史事實的記載其時間僅從一八八三年開始，其範圍僅限於俄國，因而不能理解「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爲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最高的綜合和總結的看法，顯然是不對了。

這樣一個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最高的綜合和總結，特別是在這一百年之中的蘇聯五十多年（自一八八三年到一九三七年）來偉大共產主義運動的綜合和總結，就決定了這個總結的成果——「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一定成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

蘇聯共產黨中央爲「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的出版，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作出了有名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指出「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一書「它是以發揮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基本思想爲基礎來叙述黨史的」，「是以根據歷史事實來講授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學說的任務爲出發點的」，因爲「這樣來叙述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是最適合於事業利益的，因爲根據歷史事實來說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基本思想，是要好些，自然些，使人容易了解些；因爲聯共（布）歷史本身，就是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所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經過蘇聯革命和建設的無比豐富的歷史事實，向我們「講授」和「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如此深刻、具體、生動地講授行動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決不是一冊普通的歷史讀本。

無論就其理論的或歷史事實的內容來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確實有百科全書式的豐富：

一、它是無產階級建立自己新型政黨的歷史。黨的四大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敵底武器；黨是在和工人運動內部、黨的內部進行「原則鬥爭」，在和一切階級敵人進行「革命鬥爭」中發展、鞏固和鍛鍊起來的。

二、它是黨領導三次革命的歷史。在帝國主義時代初期和帝國主義大戰環境中舉行兩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特別是舉行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粉碎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來保衛革命的勝利的歷史。

三、它是黨領導建設蘇維埃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新經濟政策、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向共產主義社會逐漸過渡）的歷史。

四、它是黨領導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科學——戰略與策略的無比豐富的歷史。

五、它是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蘇聯革命和建設的豐富經驗與偉大榜樣、蘇聯强大的道義力量來教育、鼓舞與支持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人民的歷史。

這一切，其意義的偉大在全人類歷史上都是空前的、無法估量的。在這一百年之中，還有什麼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經驗，還有什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沒有給綜合和總結進去呢？在這個時間範圍之內，應當說沒有什麼被遺漏的了。正因爲如此，所以在上面說到的蘇聯共產黨中央的決議裏指出：「由於『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之出現，於是黨就得到了布爾什維主義底新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得到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

這樣一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是怎樣被寫作成功的呢？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雅羅斯拉夫斯基同志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於列寧格勒黨組織活動分子會議的報告中，曾經叙述了這個寫作過程。他這樣說：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如何寫成的？

「工作的過程，進行得十分長久。黨中央委員會曾經連續地提出了該教科書的四個底稿。但所有這些底稿都落選了。斯大林同志說，必須使黨的歷史的各個要素與布爾什維克的理論結合起來，並且他自己應承了這個工作。他爲『簡要讀本』工作了四個月。斯大林同志融會了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極力地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底理論觀點來闡明我們黨生活中的每一個階段。

「在斯大林同志完成了『簡要讀本』的工作時，他發送該書的最後底稿給聯共（布）中央編輯委員會的委員。接着，編輯委員會的委員們，每天在斯大林同志的研究室內，連續幾小時地，有時遲至夜半地審閱『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在我自己從事黨的活動的期間，見過許多各種各類的編輯委員會，但從來還不曾看見過、從來還沒有遭遇過像斯大林同志所表示的這樣深刻的、嚴格的、愼重的對待事情的態度。

「十二個晚上，編輯委員會逐章地審閱『簡要讀本』，我們中的每一個，都沉醉於全部生活的回憶裏，斯大林同志用特別的注意來關心於每一個

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二三頁。

評述。他耗費了巨大的心思，爲的是使『簡要讀本』甚至於連細小的錯誤和不正確之點也沒有。」㈦

我們既然能够瞭解「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確實是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那麼，我們學習這一偉大著作的根本方法，應該是怎樣的呢，下文提出一點意見，供讀者參考。

作爲根本方法來說，學習「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的方法，和學習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的方法相同，並沒有另外的一套方法。

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毛主席已經教給我們了。毛主席教導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就是要我們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就是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告誡人們的「理論和實際統一」的方法；也就是「有的放矢」而不是「無的放矢」的方法，也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亦即站穩無產階級立場、運用唯物主義的觀點、辯證法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的方法。

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指出：「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因此，毛主席教導我們，「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爲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爲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又應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爲中心的材料」。而學習這一著作的時候，頂重要的一點，還是學習列寧、斯大林是如何神妙地以馬克思主義這根「矢」射中蘇聯革命的這個「的」的。毛主席說：「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眞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㈧毛主席的這些指示，既教導我們以學習的方法，又指出了學習的目的或任務。

根據上面我們所見到的聯共中央的決議，我們業已知道，『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以根據歷史事實來講授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學說的任務爲出發點」，是「根據歷史事實來說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根本思想」的，因此，我們掌握上述學習方法來進行學習時，就要防止兩種不好的傾向：

第一種不好的傾向，是繁徵博引，堆集許多對「講授」和「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幫助的歷史材料，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不是因此而愈益明確有力，反而因此有了被淹沒在不必要的史料中的危險。堆集歷史材料不知道是爲了什麼，打算說明什麼道理。

另一種不好的傾向，是完全脫離了和撇開了歷史事實，滿足於搬運幾個公式和結論，而這幾個公式和結論都成了掛在半天空中的東西，使人不易明白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不知道他們在什麼樣的具體的歷史情況之下，當時要來解決什麼樣的革命實際問題，爲什麼他們必須是這樣來解決，而不可以那樣來解決。這種情形，就是既沒有看見「的」，也不可能弄清楚「矢」，當然談不上學「射」了。

學習中發生這些不好的傾向的主要原因，就由於不是按照「理論和實際統一」的方法來進行學習，而是違背了這一條原則，採用了「理論和實際分離」的學習方法。前一傾向並沒有「抓住了」實際，後一傾向也沒有「抓住了」理論。

學習中發生這樣不好的傾向的原因，還在於不理解事物矛盾的法則，更確切地說，就是不瞭解矛盾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關係。任何一個事物都是矛盾的特殊性與普遍性互相聯結的。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解決革命實際問題時，必須體會這個道理。毛主席在「矛盾論」中說：「由於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聯結的，由於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於特殊性之中，所以，當着我們研究一定事物的時候，就應當去發現這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內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許多事物的互相聯結。」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從人類歷史命運的問題直到某一地區某一時期無產階級鬥爭的問題，都須加以解決。所有這些問題和問題的解決，都是具體的、帶有特殊性的。同時，解決每一個問題的理論，都具體地表現着無產階級黨的世界觀，都是無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的具體運用或具體化。這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與立場、觀點、方法以及基本理論，却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是「普遍眞理」——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性的一面。而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解決一定的歷史時代、一定國度中的革命實踐問題，這又是用這一普遍眞理，結合於特殊的對象。總起來看，這樣一個運用和發展的過程，正是「矛盾論」中所指示的「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過程。

列寧指出一切民族都必然走向社會主義這一普遍眞理，同時又承認每一民族走向社會主義時有「自己的特殊性」。列寧寫道：「一切民族都走向社會主

㈦「斯大林同志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心清譯，延安「解放」週刊一九四一年第一二八期。

㈧「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二三頁。

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七八四——五頁。

義，這是必然的，但所有民族走向社會主義並不是完全一樣的，每一個民族對於這種或那種民主形式，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的不同樣式，對於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這種或那種的速度，都加上自己的特殊性」。(十)

列寧在「我們的綱領」中寫道：「我們認爲俄國社會主義者特別必須獨立闡發馬克思底理論，因爲它僅僅提供出一般的指導的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局部說來，在英國是與法國不同，在法國是與德國不同，在德國是與俄國不同的。」(一一)

盡人皆知：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眞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

上面所說學習「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須要防止發生的兩種不好的傾向，前一種堆集歷史材料淹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實質的傾向，好像要「抓住」馬克思列寧主義底特殊性的一面；後一種「懸空」地搬運幾個公式和結論的傾向，好像要「抓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性，其實，他們都沒有而且不可能「抓住」任何一面。他們這樣的學習，根本說不上「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眞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因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特殊性與普遍性以及這兩方面的結合，也是根本無從說起了。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這一思想武器，已經由它的著作者斯大林，交付給蘇聯和各國的無產階級以及無產階級政黨了。中國每一個具有一定條件的革命者，都在努力學習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

「走俄國人的路」使中國人民革命勝利了，革命勝利以後的偉大建設工作，仍然應當而且只能够「走俄國人的路」，我們必須繼續向蘇聯學習。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示我們：「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聯共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聯共學習。」(一二)他在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號召我們：「要學習蘇聯。我們要進行偉大的國家建設，我們面前的工作是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不够的，因此，要認眞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無論共產黨內、共產黨外、老幹部、新幹部、技術人員、知識分子以及工人羣衆和農民羣衆，都必須誠心誠意地向蘇聯學習。」(一三)

學習「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就是學習蘇聯革命與建設的先進經驗來建設我們的祖國，就是向蘇聯學習的門徑之一。學習蘇聯就是中國勝利的保證。

(十)「列寧全集」，俄文第三版，第十九卷，第二三〇頁。
(一一)「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解放社版，第一〇五頁。
(一二)「論人民民主專政」，人民出版社版，第二〇—一頁。
(一三)見「新華月報」，一九五三年第三號。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蘇聯出版情況

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在蘇聯大量出版。三十五年來，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五二年，馬克思、恩格斯作品在蘇聯出版了一六二五版，發行總數爲五九、六九五、〇〇〇册。在蘇聯出版次數最多的是「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用五十八種文字出版了三〇五次，發行總數達一千一百十六萬册。「資本論」用十種文字出版了一〇七次，發行總數達四百四十四萬六千册。「資本論」最早的外文譯本是一八七二年譯成的俄文譯本，也是在俄國秘密出版的馬克思的第一部著作。

馬克思的經典著作「哲學之貧困」，「僱傭勞動與資本」，「政治經濟學批判」，「法蘭西階級鬥爭（一八四八——一八五〇）」，「拿破崙第三政變記」，「論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都在蘇聯取得了廣泛的傳播。

在蘇聯出版了三十三卷的「馬恩全集」，兩卷的「馬克思選集」再版了好幾次，從一九四八年起又出版了「馬恩兩卷選集」，發行總數達三百七十一萬一千卷。

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介紹

蘇聯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是世界上收藏馬克思主義、國際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珍貴的歷史文獻最多的一個機關。它的圖書館現在共保存有一百萬部最早出版或絕版了的珍本書籍、報紙和雜誌的合訂本。

馬——恩——列學院建立於一九三一年，由原來的卡・馬克思——弗・恩格斯學院和烏・伊・列寧學院合併而成。這個學院是共產黨的科學研究機關。它的任務是收集和保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文獻，出版他們的著作，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人的生平及活動。學院的圖書館中藏有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世時出版的著作珍本、用世界各國文字出版的他們的各種著作的譯本，以及他們親自主辦的報紙和雜誌的合訂本，還藏有最齊全的「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德文本及其他文學的譯本。圖書館幾乎藏有全部革命前在俄羅斯秘密出版的書籍，各種布爾什維克地下報紙的合訂本，以及列寧和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他們所編輯和撰寫的報紙、傳單和小册子。在學院的文件庫中還藏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手稿，有關蘇聯共產黨黨史的全部主要文件和材料，以及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國際和巴黎公社的歷史文件。在圖書館的閱覽室中學習的有蘇聯科學院、各加盟共和國科學院、各研究所的科學工作人員、博士、研究生，「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課程的講師，和各地專門派來的科學工作人員。

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

——紀念毛主席的「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發表十週年

關夢覺

一

今天六月一日，是毛主席的「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這一偉大文件發表的十週年。十年來，中國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之下，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以蔣介石匪幫爲代表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罪惡統治，建立了光輝燦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我們的國家經過了三年多的恢復和建設，在繼續加强抗美援朝的勝利鬥爭中，已經進入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新時期。十年來，保證了我們不斷勝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式的領導方法，如同毛主席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所明確指示的，今天正在繼續照耀着我們勝利前進的道路。毛主席的這一歷史性的文件，是永遠新鮮、永遠生動的，它是智慧和力量的不竭的源泉。我們爲了紀念這一文件發表十週年，應該結合着當前的經濟建設和一切其他工作，認眞地去學習它，認眞地遵照着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毛主席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指示我們，無論進行什麼工作，都必須採用兩個方法：「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羣衆相結合。」

領導與羣衆相結合，包含着兩層意思。首先，領導骨幹必須與羣衆相結合。「只有領導骨幹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羣衆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爲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羣衆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幹去恰當地組織羣衆的積極性，則羣衆的積極性旣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領導骨幹的積極性和羣衆的積極性是相依爲命的。脫離了羣衆的領導骨幹，根本就不成其爲領導骨幹；脫離了領導骨幹的羣衆，其積極性旣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面，也不可能持久和提高。因此，領導骨幹的積極性必須與羣衆的積極性密切地結合起來。但在這種結合當中，主要的方面是領導骨幹必須善於團結和教育羣衆，善於組織和發揮羣衆的積極性，善於依靠並引導羣衆前進。由此更進一步，毛主席又提出了關於羣衆路綫的原理。「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就是說，將羣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爲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羣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爲羣衆的意見，使羣衆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羣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再到羣衆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又到羣衆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經驗證明，毛主席關於羣衆路綫的原理，是做好領導工作的鑰匙。

作爲羣衆路綫這個基本領導方法的組成部分，毛主席又指示我們必須採取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羣衆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於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於落空的危險。」「這又是領導人員指導和學習相結合的方法。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從下級個別單位的個別人員、個別事件取得具體經驗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㈠

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具體指導相結合——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與此相對立的是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主觀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第一、不遵從領導與羣衆相結合的原則，第二、不遵從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原則。由於不遵從領導與羣衆相結合的原則，所以他們不注重和不善於團結積極分子組成領導核心，不注重和不善於使這種領導核心同廣大羣衆密切結合起來，因而使自己的領導變成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的領導；同時，他們也不注重和不善於總結羣衆鬥爭的經驗，而喜歡主觀主義地自作聰明地發表許多意見，因而使自己的意見變成不切實際的空論。由於不遵從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原則，所以他們僅滿足於工作任務的一般號召，不注重和不善於在作

㈠ 以上所引，均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九一九—九二二頁。

了一般號召之後，緊跟着就從事於個別的具體的指導，因而使自己的號召停止在嘴上，紙上或會議上，而變爲官僚主義的領導。所以「爲了反對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必須廣泛地深入地提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㊁。

二

十年前，毛主席關於領導方法問題的指示，教育和培養了各級領導幹部，大大地提高了我們領導工作的水平，保證了革命鬥爭的勝利。然而由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小商品經濟的土壤裏生長出來的官僚主義的毒草，以及由官僚主義所滋生的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現象，在全國勝利的新形勢下，在國家進入大規模建設的新時期中，却又成爲我們前進的障碍了。因此，在今年二月七日，毛主席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發出了關於反官僚主義的指示。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目前我們正在全國範圍內和各級機關中展開了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現象的堅決鬥爭。今天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的官僚主義的基本特點，一個是領導脫離羣衆、脫離實際；一個是一般號召脫離具體指導。這也就是直接違背了毛主席關於「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領導和羣衆相結合」的兩條基本原則。更具體說，這種官僚主義的領導者不瞭解下邊的眞實情況，不瞭解和不關心羣衆的疾苦，不是切實地從客觀的實際條件出發，去考慮和決定他們的工作，而往往是從不眞實的情況出發，不分工作的緩急輕重，而只憑主觀的願望，去考慮和決定他們的工作。因此，提出的工作任務往往過多、過重，而且要求過急，使下邊十分緊張、忙碌，到處「疲於奔命」，而不能做好工作，加以在佈置工作的時候，只是簡單地强調要「完成任務」，不明確具體地向下級交代政策界限，不明確具體地交代工作作風與工作方法；在佈置工作之後又很少進行檢査，只滿足於下級所報告的工作的表面成績，而不注意工作的實際效果；只看到工作中好的方面，看不到工作中壞的方面；只追求數量，不講究質量；這樣，就助長了下層組織和下層幹部的「單純任務觀點」和强迫命令作風，把很多好事辦壞，使人民羣衆的利益遭到損失。㊂

官僚主義、主觀主義領導的基本特點之一，既然是脫離羣衆、脫離實際，所以發動羣衆、依靠羣衆，乃是克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領導的基本辦法。早在一九一九年時，列寧就指示我們說：「只有當全體居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徹底進行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才能完全戰勝官僚主義。」㊃可是，怎樣才能發動羣衆參加管理、怎樣才能發揮羣衆的積極性呢？最重要的就是領導者要開展自我批評，特別是要發動自下而上的批評——這是發動羣衆、貫徹羣衆路綫的法寶，是官僚主義最有效的消毒劑。關於這一點，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時就指示得非常深刻，非常透徹。他說：我們前進中最厲害的敵人，就是官僚主義。怎樣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毒害呢？「爲此而僅僅有唯一的一個途徑——組織自下而上的監督，組織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對我們機關的官僚主義，對其缺點、對其錯誤的批評。……現在主要的是在於掀起自下而上的一般反對官僚主義、特別反對我們工作缺點的最廣泛的批評浪潮。只有組織兩面的壓力——自上而下的與自下而上的壓力，只有把重點移到自下而上的批評，才能期望順利地鬥爭及剷除官僚主義。」㊄馬林科夫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也說過：「自下而上的批評是千百萬勞動者的自發創造性和主動性的表現，是他們關心鞏固蘇維埃國家的表現。我們越廣泛地展開自我批評和自下而上的批評，我們就越能充分發掘我們人民的創造力與精力，羣衆的國家主人翁感覺也就愈加發展和加强。」「目前特別重要的，是保證展開自我批評與自下而上的批評，把那些阻碍對我們的缺點展開批評、壓制批評及對批評者實行迫害與報復的人，當作黨的死敵，與之進行無情的鬥爭。」㊅同時，他更指出，以爲自下而上的批評能够以自流的方式自動展開的看法，是錯誤的，只有在每一個提出健康的批評的人能够確實知道他可以得到領導上的支持，確實知道他所指出的缺點會眞正予以消除的時候，自下而上的批評才能展開和擴大。因此，作爲一個領導者，應該深切地認識到，歡迎並支持來自羣衆方面的批評和意見，乃是克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領導的根本辦法，乃是聯繫羣衆、貫徹羣衆路綫、使領導與羣衆相結合的關鍵。

三

克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領導的另一個基本方法，就是切實執行毛主席關於一般號召與具體指導相結合的指示。特別是在我國進入了大規模建設的新時期，光靠一般號召是絕對不行的，除了一般號召以外，更需要越來越細緻深入的具體領導。只有一般號召而無具體領導，那實際上等於放棄了領導。斯大林

㊁「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九二四頁。

㊂參看安子文：「爲消除黨組織內的消極的和不健康的現象而鬥爭」（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㊃「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册，第一九三頁。

㊄斯大林：「論批評與自我批評」，新華書店版，第五五—六〇頁。

㊅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版，第八四—八五頁。

指示我們說，必須「使領導機關更接近於下層工作，把它們的領導工作變成更加是切實和具體的，而不是專門開會和例行公事式的」⑦。爲了領導，開會當然是必要的；然而如果只是「專門開會」，以開會來代替具體領導，那就錯了。開會本身也有兩種：一種是無準備的、空洞的、一般化的會，這種忙忙碌碌的開會，與切實有效的領導方法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另一種是有準備的、細緻深入的、解決問題的會，只有這樣的會，才是我們所需要的。同時，領導工作也決不等於「例行公事式的」簽署文件或寫決議、發指示。斯大林在談到領導生產時曾指示我們說：「什麼是領導生產呢？……要我們自己變成專門家，變成工作內行，要我們自己轉而努力學習技術知識，——這就是實際生活推動我們來幹的事情。」⑧「爲了實現新式領導，就要怎麼辦呢？……就要我們經濟工作領導者不是『一般地』領導企業，不是『從空中』領導企業，而是具體切實地領導企業；就要他們不是根據一般空談，而是以嚴格求實態度來對待每一個問題；就要他們不限於紙上敷衍搪塞或一般辭藻和口號，而要精通工作技術，熟悉工作詳情，熟悉『小事情』，因爲現在大事情是由『小事情』積成的。」⑨斯大林的指示，完全適合於我們今天的情況——我們也同樣要求一切建設事業的領導者，不要專依靠簽署文件來進行「一般的」領導，而要具體地、切實地領導企業，要變成專門家和工作內行。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國家的建設事業正確地進行。

要實行具體的、切實有效的領導，就需要經常地細緻深入地檢查工作。毛主席在十二年前就指示我們說：「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裏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⑩今天，他更具體地指示我們：「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幹部都應該經常地深入下層，檢查工作。」⑪斯大林說：「正確組織審查執行情形的工作，這在反對官僚主義和反對形式主義的鬥爭中是有決定意義的。」⑫在檢查工作當中也要防止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工作檢查，看樣子好像也很「熱鬧」，也「深入下層」，但實質上卻浮在水面上，抓不住問題的中心、問題的本質，因而全然不能夠解決問題，甚至歪曲了事情的眞相，反而造成混亂。只有正確的、深入的工作檢查，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爲了使一般號召和具體指導相結合，毛主席指示我們要「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這種培養典型，取得經驗，指導全局的方法，乃是點與面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科學方法。這種方法要求領導者集中地而不是平均地使用力量，深入地摸經驗，用以指導全局。只要領導者能夠經常地抓住幾個「點」摸出來一套經驗，於是他們在整個的領導工作中就會心中有數，就會處於主動地位。因此培養典型、指導全局的方法，乃是領導方法上的一個竅門。列寧在一九二一年時曾下決心要抽調某些中央領導幹部到下層去建立「模範工作」。他說：「能夠並且必須把某些工作人員從中央工作中調到地方工作中去：使他們以縣和區領導人資格，在那裏從各方面把整個經濟工作模範地佈置起來，這樣，他們會有極大的貢獻，並能比某個中央機構作出更重要的全國性的事業。因爲模範工作，將成爲工作人員的養成所和被人效法的榜樣，有了這種榜樣再來加以效法，就相當不困難了，而我們又能從中央這裏來加以幫助，使這種模範例子務必在到處廣泛『採用』。」⑬由此可見，列寧對於培養典型（「模範工作」）的工作是何等重視：第一、他要調中央的工作人員到縣區去進行模範工作；第二、他認爲這種模範工作有全國的意義（「全國性的事業」）；第三、他要從中央方面大力幫助把這種模範工作的經驗推廣到全國去；第四、他認爲模範工作本身就是培養幹部的有效方法（「工作人員的養成所」）。列寧的指示和毛主席的指示是完全一致的。今天在這方面我們還需要大大地努力。

四

毛主席指示我們在運用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這些原則時，「在任何一個地區內，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個中心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並把這種決定堅持地貫徹下去，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⑭官僚主義者（特別是事務主義型的官僚主義者）不懂這個道理，他們把許多工作平列起來，抓不住關鍵，費力多而收效少，工作上陷於忙亂和被動。就我們國家當前的三大任務來說，中心的環節就是國家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其他兩個任務，即繼續加強抗美援朝鬥爭和召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是

---

⑦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七九六頁。
⑧ 同前引書，第四四一—四四三頁。
⑨ 同前引書，第四六七—四六八頁。
⑩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〇九頁。
⑪ 毛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的指示。
⑫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六三九頁。
⑬ 「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册，第三七二頁。
⑭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九二三—九二四頁。

環繞着建設工作來進行的。在國家的建設工作中，又包括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文化建設，而以經濟建設爲其礎。經濟建設的總任務就是要變農業國爲工業國，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首先着重發展冶金燃料、電力、機械製造、化學等項重工業，因此，發展重工業又是經濟建設的中心。這是就全國而論。至於各個地區，根據國家的三大任務和當地的具體情況，在一定的時間內，又有共一定的中心工作。這種「在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個中心工作」的領導方法，保證了我們能够集中力量，抓住中心環節，推動全局。

關於抓中心環節的領導方法，也是列寧和斯大林所特別注意的。列寧指示我們說：「僅僅一般地做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共產主義者，還是不够的。必須善於在每個時機裏找出鏈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這個環節是爲了把握住整個鏈條並穩穩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所必須用全力抓住的。」(一五)斯大林更具體地指示說：「問題是要從黨面前許多任務中間挑出一個當前任務，解決這個任務是當時工作底中心點，實行這個任務，就能保證順利解決其他一切當前任務。」(一六)

新事物和舊事物的鬥爭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在辯證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那怕它現時似乎還不堅固，因爲在辯證法看來，只有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才是不可戰勝的。」(一七)所以作爲一個領導者，必須對新鮮事物有敏銳的感覺，善於發現、善於培養和照顧新事物的萌芽。領導者必須善於「見微知著」。善於發現、培養和照顧新事物的萌芽，也就牽涉到領導上的預見問題。爲要領導，就要有預見。只有這樣，才能防患於未然，才不致使工作遭到失敗，而保證國家計劃的完成。但要有預見，就得掌握客觀的科學法則，根據客觀的科學法則辦事。這樣，領導者就清明、主動、胸有成竹了。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應當從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爲我們行動的嚮導。」(一八)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也指示我們說：「政治經濟學的法則是反映不以我們的意志爲轉移的經濟生活過程的規律性的客觀法則。否認這個原理的人，事實上就是否認科學，而否認科學，也就是否認任何預見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認領導經濟生活的可能性。」(一九)由此可見，要領導，要有預見，就得承認並掌握客觀的科學法則，就得根據客觀的科學法則辦事。

五

爲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首先，領導者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論水平，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領導方法是由思想方法來決定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產生了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產生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爲了用後一種領導方法去克服前一種領導方法，就必須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眞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於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二〇)這些話，對於領導同志來說，是特別重要的。我們每一個領導幹部，必須加强理論學習，祗有這樣，才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國家建設。

同時，作爲一個領導者，不僅要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論水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同時也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在我們國家進入大規模計劃建設的新時期，越是要求我們除一般號召外更要着重於實行具體的領導，也就越要求一切領導者要懂得業務，精通業務。「外行」是不能領導「內行」的。斯大林在嚴厲批判以「簽署文件」來代替領導的時候，曾要求蘇聯的經濟工作人員要自己「變成專門家，變成工作內行」。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也曾對我們作過同樣的指示，要我們向一切內行的人們學經濟工作，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今天，我們更要特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認眞地、誠心誠意地向蘇聯學習—我們不僅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而且要學習蘇聯先進的科學技術，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我們要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新國家。

最後，應該特別指出，爲了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指示，爲了克服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一切領導者必須認眞地、誠心誠意地向羣衆學習，向被領導者學習。羣衆是智慧的源泉，是歷史的創造者。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就是領導與學習互相結合的過程。斯大林指示我們說：「只有不僅善於教導工農，而且還善於向工農學習的領導者，才能是眞正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者。」(二一)這句話對每一個領導幹部也是完全適用的。

(一五)「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册，第一四四頁。
(一六)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九八頁。
(一七)同前引書，第七〇五頁。
(一八)「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二〇頁。
(一九)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八頁。
(二〇)「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四九六頁。
(二一)「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下册，第六九九頁。

讀「學習和時局」的一些體會

梁純夫

一 關於時局的發展

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發表的「學習和時局」的講演，總結了抗日戰爭七年的形勢，指出時局發展的兩個特點，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把日寇趕出去」和「解放全中國」的明確任務以及爲實現這個任務所必要的兩種「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

「目前時局有兩個特點，一是反法西斯陣綫的增强和法西斯陣綫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陣綫內部人民勢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勢力的衰落。前一個特點是很明顯的，容易被人們看見。希特勒不久就會被打敗，日寇也已處在衰敗過程中。後一個特點，比較地還不明顯，還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見，但是它已在歐洲、在英美、在中國一天一天顯露出來。」

早在一九四二年十月，當斯大林格勒之戰的初步勝利消息傳出之後，毛主席便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一文，明白指出：「這一戰，不但是蘇德戰爭的轉折點，甚至也不但是這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轉折點，而且是整個人類歷史的轉折點。」但是，在當時，在這個歷史轉折點的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綫內的人們也有許多被法西斯的兇惡而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實質」㊀。

對於時局的發展，毛主席爲什麼總是能比別人看得更遠、更清楚呢？現在大家都在學習「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論文是毛澤東思想的結晶，是毛主席結合中國革命實踐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唯物辯證法的天才的發揮，也只有從這裏，我們才能得到這個問題的眞正答案。

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指出：

「在辯證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那怕它現時似乎還不堅固，因爲在辯證法看來，只有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才是不可戰勝的。」㊁

一九四四年上半年，在毛主席發表這篇講演的時候，就整個世界情勢來說，反法西斯陣綫的增强和法西斯陣線的衰落，的確相當明顯了。當時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已經垮台，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也開始敗退，而最重要的是，經過斯大林格勒之戰的決定性勝利之後，到一九四四年初，蘇軍不單基本上肅清了本國境內的殘餘德軍，並且分三路向西推進，一路渡普魯特河進入羅馬尼亞，一路越喀爾巴阡山脈進入捷克，一路渡維斯杜拉河向華沙推進。在歐洲戰場的西綫，正如毛主席所預見的，英美已「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時候」，正積極準備在法國海岸登陸，開闢第二戰場。但是在另一方面，從西方帝國主義來的政治逆流，正與從東方蘇聯解放者來的軍事攻勢相向並進。英美在準備在西綫打死老虎的同時，還準備把東歐國家的大批法西斯逃亡者送回到這些國家去，以重建依附英美帝國主義的法西斯政權。在這個時候，像東歐國家發展到今天這樣光明的局面，的確是一般人不容易看得出來的。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說了。

就中國來說，當時大部分土地還在日軍佔領和國民黨統治之下，蔣介石還擁有幾百萬反動軍隊，蔣政權不單有美帝國主義爲靠山，並且與日寇互相勾結來夾攻八路軍和迫害人民。在這個時候，像中國發展到今天這樣光明的局面，的確也是一般人不容易看得出來的。但毛主席不單能够看見這個發展的趨勢，並且正確掌握了這個發展的規律，因而能够領導中國革命向前迅速推進，不數年而實現「解放全中國」的偉大任務。

秘密在什麼地方呢？秘密就在於，如毛主席在這個講演中所指出的：「中國人民勢力的增强，要以我黨爲中心來說明。」

毛主席把中國共產黨及共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力量在抗日時期的發展分爲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我們曾經克服了黨內的右傾偏向，執行了獨立政策，不但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創立了根據地，發展了八路軍新四軍，而且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第二階段（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我們雖然受了很大的損失，但是我們站住脚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進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第三階段（一九四三年以後），「我們的各項政策更爲見效，特別是整頓三風和發展生產這樣兩項工作，發生了根本性質的效果，使我黨在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兩

㊀ 「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九〇六頁。

㊁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三七——一三八頁。

方面，立於不敗之地。」

毛主席在這裏指出：「國民黨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觀，得到了喪失戰鬥力的結果。共產黨以五年半的苦戰奮鬥，得到了增强戰鬥力的結果。這一種情況，將決定今後中國的命運。」

這就是以共產黨爲代表的中國進步勢力和以國民黨爲代表的中國反動勢力在抗日戰爭時期互相消長的一般情況。這種新舊力量的互相消長是有其一定規律的，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所指出的：

「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爲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爲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爲新事物的性質。」㊂

毛主席根據事物發展的這個一般規律，早在一九三七年便看出中國的光明遠景：「舊的封建地主階級將被打倒，由統治者變爲被統治者，這個階級也就會要逐步歸於消滅。人民則將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由被統治者變爲統治者。這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會起變化，由舊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變爲新的民主的社會。」㊃

經過北伐時期、土地革命時期，以及抗日戰爭中七年的艱苦奮鬥，代表中國人民力量的共產黨已經日漸成長、壯大，變爲一種足以「決定今後中國的命運」的力量了。

但是單單認識這個規律，單單看到這個發展前途，仍然是不够的。重要的問題是能否加緊努力，準備條件，在內外情勢的適當配合下，爭取這個前途由可能性變爲現實性，正如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所教導我們的：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爲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够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㊄

毛主席之所以偉大，他之所以能够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勝利，實現「解放全中國」和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偉大任務，關鍵就在這裏。在「學習和時局」的講演中，毛主席在指出和分析了當前時局的兩個特點之後，立即向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了「我們要準備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和「解放全中國」的重大任務，並要求大家「爲着將來担負巨大工作」而加緊作出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

「爲使我黨能够担負這種責任，就要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起來，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據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一九四四年上半年，就要求大家「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當時也許有人覺得言之過早。但是當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全國各大城市相繼解放，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分子揚言共產黨只會治理鄉村不會治理城市，以爲還有機會可乘的時候，大家就深深認識到這個準備的十分必要了。

無疑的，「爲着將來担負巨大工作」，爲着解放全中國和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毛主席及其領導下的共產黨所要做的準備工作不僅僅是上面所提到的兩點。就在這篇講演中，毛主席已經說到，「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不久就可能開會，這次代表大會將要討論加强城市工作和爭取全國勝利的問題。」

大家知道，一年之後，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了，毛主席在大會提出了長達數萬言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不單全面地和具體地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和國內形勢，明確指出：「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打敗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信心，現在是極大地增强了。中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實現其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基本要求的時機，已經到來了。」並且全面地和十分具體地擬出了爲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努力的「一般綱領」及「具體綱領」。

大家也必定知道，今天中國人民爲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並爲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創造條件所遵循的行動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基本上是以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所提出的「一般綱領」及「具體綱領」爲依據的。

因此，我們今天讀了「學習和時局」這篇講演，就更深切地體會到毛主席的英明、正確和偉大領導的眞實意義了。

二　關於開動腦筋

但是，單單毛主席一個人，或只有共產黨上層的少數領導者認識了這個規律，看出了中國革命的這個發展前途，顯然是不够的。斯大林在「在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指出：

「……如果用馬列主義教育我們幹部的事業衰弱下去，如果我們提高這些幹部的政治和理論水平的工作倒弱下去，而這些幹部本身又因此而不復關

㊂「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七八九頁。
㊃「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七九〇頁。
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九一頁。

心我們向前進展的前途，不復瞭解我們事業的正確性，而變成一些茫無前途，盲目式和機械式執行上級指示的事務主義者，那末我們全部國家的和黨的工作，也就一定會衰弱下去。」

毛主席在這個講演中，也正如他在許多其他的報告和論文中一樣，在指出時局的特點和我們的任務之後，接着便要求大家加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來迎接新的任務。在「學習和時局」中，他特別指出開動腦筋這個機器的重要性：「爲了爭取新的勝利，要在黨的幹部中間提倡放下包袱和開動機器。」

所謂開動機器，就是「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列寧語）。毛主席在這裏着重指出：「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頭腦，對於複雜事物，不願作反覆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

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都是由於主觀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問題的結果。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特別容易犯這種毛病，要克服這個毛病，就必須認眞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在「實踐論」中，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存精、去僞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只有那些主觀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跑到一個地方，不問環境的情況，不看事情的全體（事情的歷史和全部現狀），也不觸到事情的本質（事情的性質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內部聯繫），就自以爲是地發號施令起來，這樣的人是沒有不跌交子的。」㈥

在「矛盾論」中，毛主席更進一步指出：

「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主觀性，就是不知道客觀地看問題，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觀點去看問題。這一點，我在『實踐論』一文中已經說過了。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問題。……或者叫做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這樣，是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務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表面性，是對矛盾總體和矛盾各方的特點都不去看，否認深入事物裏面精細地研究矛盾特點的必要，僅僅站在那裏遠遠地望一望，粗枝大葉地看到一點矛盾的形相，就想動手去解決矛盾（答覆問題、解決糾紛、處理工作、指揮戰爭）。這樣的做法，沒有不出亂子的。中國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同志們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爲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和表面的。」㈦

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是我們工作中的大敵，而這兩者的根源都是主觀主義。要做好工作，要認識事物的客觀規律及事物的發展前途，就必須克服我們的主觀主義，對於具體的情況作具體的分析。也正如毛主席在「學習和時局」中所教導的：「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

檢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來，使自己的精神獲得解放，也是開動腦筋的重要條件。這些包袱是多種多樣的，常常成爲我們進步的障礙。毛主席在這裏指出：

「犯過錯誤，可以使人覺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錯誤的，從此萎靡不振；未犯錯誤，也可以使人覺得自己是未犯過錯誤的，從此驕傲起來。工作無成績，可以使人悲觀喪氣；工作有成績，又可以使人趾高氣揚。鬥爭歷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負責任；鬥爭歷史長的，可以因其長而自以爲是。工農分子，可以自己的光榮出身傲視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識傲視工農分子。各種業務專長，都可以成爲高傲自大輕視旁人的資本。甚至年齡也可以成爲驕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爲自己聰明能幹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爲自己富有經驗而看不起青年人。對於諸如此類的東西，如果沒有自覺性，那它們就會成爲負担或包袱。」

這些東西之所以成爲包袱，主要也是由於主觀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問題的結果。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加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放下包袱，開動腦筋，才能夠做好工作，少犯錯誤。

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八九頁。
㈦「毛澤東選選」，第二卷，第七九九—七八〇頁。

波蘭科學院舉行會議

討論斯大林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波蘭科學院於四月十七日在華沙舉行會議，討論斯大林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參加這一會議的有波蘭科學家以及著名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界的人士。

會議上宣讀了幾件報告後舉行了討論。科學院院長第姆鮑夫斯基教授總結討論時指出：偉大的斯大林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的指示是波蘭科學家爲建設社會主義而發展創造性研究的可靠指南。

評對於語言文字的一些保守觀點

鄭林曦

中國現代歷史上，有兩個有關語言、文字的偉大的運動：一個是白話文運動，也就是爭取寫文章跟說話一致，提倡語言必須接近民衆的運動；另一個是文字拼音化運動，就是要採用一套字母來拼寫現代中國人的語言，用拼音的中國新文字來代替形意體系的老漢字。前一個運動在宋代、元代以來的白話小說跟戲曲中已經開始了，經過幾百年的鬥爭，從荊棘叢中開放出幾棵鮮艷奪目的文藝的花朵，在「五四」運動中基本上取得了勝利。這個運動留下來的問題是如何使通行的白話文更加接近現代民衆的口語，如何爲祖國的語言更加純潔和健康而鬥爭；在進行這些工作的時候，還得注意掃清文言文體的殘餘勢力。文字拼音化運動，也提倡了六十多年；可是碰到的阻礙卻意外地多，經歷過幾次奮戰，到今天還沒有成功。只是在全國解放以後，中央人民政府來有計劃地領導進行，文字改革運動才有了接近成功的希望。

這兩個運動，都遇到相當嚴重的反對。這些反對來自對於語言文字的保守觀點。這種觀點認爲語言、文字都是約定成俗，一成不變的；它反對任何在語言中出現的新的東西，也反對用簡單便利的新的文字來代替舊有的文字工具。有時候持有保守觀點的人還喜歡運用愛國主義的詞句，把主張文體改革和文字改革的人說成離經叛道、拋棄祖先遺產的不愛國者。對於漢字，抱着保守主義觀點的尤其多。有些知識分子，在政治思想上儘可以是很進步的；但是一碰到他自己用習慣了的漢字，卻總有幾分戀戀不捨的心情，對改革抱懷疑以至於反對的態度。懷疑跟反對文字改革工作的人，自然也可以提出種種反對理由，可是那些理由多半是片面的，枝節的，不難於解釋清楚；過去提倡文字改革的同志們也都一一解釋了。可是，對於種種反對文字改革的意見，與其從技術上枝枝節節地來答辯，不如從對於語言文字的根本認識上來討論。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發表，大大地幫助了我們來理解和說明中國語言文字上的一些根本問題：對於文字改革工作者向語言文字上的保守主義的以至於國粹主義觀念作鬥爭，供給了極爲銳利有力的武器。

反對文字改革的最常見的一種說法，是說漢字是最適合來書寫單音節的漢語的，而他們心目中的漢語是永久不變的。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發表以後，抱有這種國粹主義思想的人，不是首先來檢討自己的對於語言的錯誤觀點，而是利用斯大林文章中的某些片段字句，來掩蓋他們的語言不變論和漢字適合漢語論的保守觀點㈠。

可是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不僅沒有在任何地方說過語言不變的話；而且恰恰相反，斯大林在許多章節中說出「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這一些明確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斯大林把語言學的主要任務規定爲「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因此，我們可以說，任何人想從斯大林的著作中找出話來支持漢語不變論，都肯定地是會落空的。斯大林曾經說過：「基本詞彙是比語言的詞彙窄小得多的，可是它的生命卻長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長時期中生存着並給語言構成新詞的基礎」；又說：「文法構造是千百年來形成的，它在語言中已是根深蒂固，所以它的變化要比基本詞彙更慢。」這好像是說語言不變了吧？其實不然，這只是說語言中有一部分主要的東西變化得比較慢，然而慢慢地變卻不等於不變。斯大林只是正確地指出語言的變化發展的眞實情況，他說：「馬克思主義認爲語言從舊的質到新的質的轉變不是經過爆發，不是經過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

㈠ 斯大林的語言學論著發表以後，中國語文研究者絕大多數虛心學習，認眞地理解和闡釋這個重要的理論，並且努力拿它來跟中國語言文字的實際相結合。可是有少數人不是好好地學習這一理論，檢查自己，而是輕率地拿斯大林的理論來做自己的陳腐錯誤的言論的註腳。如張銳光先生在一九四三年左右曾在重慶「時事新報」上署名張公輝發表文章反對文字改革，擁護戴季陶、陳果夫等對於文字的反動保守主張，主張用漢字來表音，連注音字母都要反對掉。解放以後他仍然堅持這種主張，一九五二年秋又在上海「大公報」祖國語文專刊連續發表文章，曲解斯大林的語言學理論，錯引唯物辯證法的詞句，來給自己的漢字最爲適合漢語因而不需要根本改革的謬說辯護。

而是經過新質的要素的逐漸積累，也就是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這種變化在社會發生變革時期更大一些。斯大林曾經說：「往後，出現了民族語言和國家，發生了革命，發生了舊社會制度與新社會制度的交替，所有這一切使語言及其發展，發生了更大的變化。」這種更大的變化，主要發生在詞彙方面。至於語言的顯著可見的更替，新的民族語言的創立，那却是「需要有幾百年的時間」㊀。

白話文運動，正是把將近一千年來漢語的新的發展成果，在書面上鞏固下來；並且按照漢語內部的發展法則，繼續發展下去，把它的應用範圍擴大到文化生活的一切方面。在這近一千年的時期中佔統治地位的文言文，大多是一種貴族跟士大夫階級利用漢字的某些特性創造出來的一種同行間書面上的「雅言」。文言文的基本詞彙和文法構造來自古代的全民的漢語，由於貴族士大夫的長期把持和利用，加進來了不少他們的特別的詞彙、術語和用語。縱然如此，文言文本身也不是不變的。現代報章上的文言文，已經跟着語言變化達到這樣程度，就是有些句子如果換上幾個白話虛字眼，就可以成爲白話。因此我們可以說，無論是白話以至於文言，都在經歷着變化，書面的語言跟隨着全民的語言一同發展；凝固不變，生來就比別個民族的語言發達和進步的語言是不存在的。

一般對漢語有保守觀點的人，常常並不公開反對漢語的發展的理論。可是他們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特別强調漢語的特殊性。强調的結果，不是把某些漢語的「特點」說成永久不變的東西；就是把漢語中落後的衰朽的因素反而說成進步的、發展的東西。最典型的一種「理論」，就是說漢語始終是單音節的孤立語，反對漢語詞彙逐漸多音節化的說法。漢語是單音節語或單音節佔優勢的語言這種說法，來自若干資本主義國家的沒有學通中國語言的漢學家。對於這些漢學家的批判，蘇聯康拉德教授的「論漢語」一文作得很正確。（這篇文章的這一部分，登在「中國語文」雜誌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號上）。奇怪的是，縱然有這樣一些批評，而且有具體的統計數字可以證實漢語並不是單音節語或單音節佔優勢的語言，然而，直到如今有一些語文研究者和反對文字改革的人，還在堅持這種漢語是單音節語的理論。他們的主要推論方法是把現代漢語的大量多音節詞先分一分類，把其中從構成它的漢字字面看來還有一定意義的一大部分詞，統統叫做「複合詞」；然後又用英文、法文一類文法中的複合詞的格式套在漢語的這些所謂複合詞上，最後證明它們並不是多音節詞，而仍然是一些單音節詞的湊合物。於是他們就說單音節詞在漢語中仍佔優勢，漢語是由許多單音節的漢字作爲建築材料構成的，而不是由許多多音節的詞和少數單音節的詞作爲建築材料來構成的。說來說去，總想證明漢語是單音節語，而最適合這種單音節語的文字當然就是單音節的漢字了。有人把這種意思說得很露骨：「這種方塊形單音節文字的特色就是我中國文字的精華，中國文字中字形衆多而同音字多到幾十個字的缺點固然要加以改革而淘汰，但是這種單音節文字的精華是在我單音節語言和方言複雜、方言人口衆多等因素上成長起來而血肉相連的，決不可輕易的一筆抹煞。」㊂這位先生也提到「改革」，想去掉衆多的字形和同音字。可是他和其他單音語說的贊同者忘了一點：那些衆多的字形和同音字大多數是把漢語的每個單音節都認爲是意義單位而竭力在字形上加以區別的結果。

漢代的辭賦家和講陰陽五行的人們，六朝的駢體文能手和作「千字文」的員外，唐朝的對仗工穩的律詩大家和織迴文錦的才女，以及後來的靠做八股制藝陞官發財的士大夫等等，正是漢文單音節說的實行家。可是他們實行的結果就是讓普通民衆不懂他們的話。二三千年來，古代的幾千個漢字逐漸被添寫到五六萬之多。這正是把漢語看作單音節語，把詞彙拆成單音的意義單位，認爲有必要無限制地添寫漢字的結果。造字者們的目的在於方便他們任意地刪簡配合辭語，製造跟人民語言發展趨勢相背反的、歪曲了漢族語言的駢四驪六的文章，和長賦排律一類的詩歌。許多多音節的連綿字，原先本來是假借些別的字寫寫就可以的，後來也都按着類推的原則造了一些新的形聲字。這樣本來絕不可以拆開的詞兒也就可以拆開或省略成爲單音字用在文言文中間了。（例如：「千字文」中有「金生麗水、玉出崑崗」一句，硬把「崑崙山」的「崑崙」縮改爲「崑」字，「山」字也爲了湊韻的緣故改爲「崗」）魯迅曾指出做文言文的秘訣就是把比較明白和接近民衆語言的文句改爲更加不好懂的文句。例如把「秦始皇乃始燒書」改爲隱晦含混的「政俶燔典」㊃藉以嚇唬老百姓。說實在的，我倒覺得這樣「妙文」的作者才眞是漢語單音節說和漢字民族精華論的擁護者和實行者。至於那些不得不用多音節的現代白話寫反對文字改革文章的人們，是並不能把單音語加漢字的「優點」發揮到如此徹底的。可惜的是，如果誰願意保持這些「優點」並且發揮下去，像他們的能寫「政俶燔典」一類文言文的先輩一樣，他必然脫離羣衆。

* * *

可是，又有人說啦：我們雖然認爲單音節是漢語的特性，可是並不反對文字改革和詞兒連寫；我們只是不同意漢語詞彙已經多音節化了的說法罷了；我

㊁ 這一段所引用斯大林的話，見「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第三版，第二〇—二九頁。

㊂ 張銳光：「從唯物辯證法來看中國文字跟語言的關係」，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上海「大公報」。

㊃ 魯迅：「作文秘訣」，「南腔北調集」。

們反對把複合詞的增多作爲漢語詞彙多音節化的證據。很好，不反對文字改革和詞兒連寫的態度是值得歡迎的；然而反對漢語詞彙多音節化的說法，却仍舊值得討論。所謂漢語詞彙的多音節化，主要是說漢語詞彙中開多音節詞兒的顯著地大量地增加，並不是說某些個別單音節詞兒增多了音節變成多音節詞。我在「新建設」一九五二年三月號上「中國文字爲什麼必須走向拼音化？」一文中所說的正是「詞彙的多音節化」而不是「詞兒的多音節化」。某些詞兒古代是單音節，後來變成多音節了，漢語裏有沒有呢？也是有的。不過並不是這些個別變化形成漢語發展的主要趨勢之一；而是採取多種方式、經由各種道路，發展變化，最後達到現代漢語詞彙中多音節詞在數量上顯著地增加，在質量上出現了新的構詞規則，這才是客觀存在的，人們無法加以否認的詞彙多音節化的趨勢。有人認爲世界各國許多種文字在演變中音節的趨向簡化，是語言發展的主要趨勢，因此否認漢語詞彙的多音節化。這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就語言中較常用的一些詞兒看來，確有如此現象。不僅一個頻繁應用的詞的音節可以縮短減少，甚至於兩個詞也可以縮合成一個詞（例如北京話的「不用」縮合爲「甭」（ㄅㄥ），英語的 do not 縮合爲 don't）。可是就整個詞彙增長豐富的過程看起來，總是拿音節比較簡短的基本詞彙作爲基礎，或者採取音節重疊的辦法，或者採取在詞根上添加詞頭、詞尾等的辦法，或者採取詞素的並列或結合的辦法……來產生新詞。這樣一來在詞彙的語音構成形式上，必然是音節的增多，不然新詞就沒法跟舊詞有所區別；反過來說，就是一般地不可能是詞彙中許多詞兒的音節更加減少，使說話時混淆的可能增大。只有這樣，才能達到語言的「詞彙越豐富、越紛繁，那末語言也就越豐富、越發展」㊄的前途。把語言中部分較常用詞彙的音節簡化的趨向一般化起來，誇大成幾千年來人類語言發展的一個主要趨勢，那就只有贊同語言走向貧乏和停滯不前的一條道路了。

拿漢語的實際情況來說也是如此。如果認爲漢語自古以來就是單音節語，而又不能不遵照詞兒中的音節趨向簡化的人類語言發展的主要趨勢發展下去；那結果是什麼呢？結果不是說漢語是簡化的峯頂，無須再發展了；就是說單音節語可能再發展成半音節語。實際上，中國人既不會用半個音節的詞兒說話，也不可能老是用有很多同音詞的單音節詞來說話；聰明的中國人民大衆在近幾百年來已經自然而然地採用了大量的表示意義更加清楚明確的多音節詞來說話了，也不管少數持有保守觀點的人如何想用「複合詞不算複音詞」一類的話來否認掉它。很多原來可以獨立作詞用的單音詞不再被認爲是詞了（例如：言、語、民、義等）㊅；很多就漢字字面看來仍有意義的多音節詞的詞素已經逐漸喪失其獨立的意義（例如：先生、風流、漂亮、丈夫等）；有些多音節詞，如果硬要强調其構成部分的意義反而會造成觀念的混亂而鬧出笑話（例如某地一些小學教師經過討論認爲「殖民地」就是「繁殖人民的地方」）；有些漢語「複合詞」就形式看和英語等的複合詞相似，而實質上在英語等的複合詞中却少見這種結構，嚴格說起來只是重音不重義的東西，一定要去分析它的意義單位，反而好像是想證明現代漢語的累贅了。（例如：思想、道路、掉換、意義、兄弟（自稱，不是哥哥和弟弟）等，而英語中却沒有 Wayroad 一類詞）。我們覺得，研究中國語言，最好是從它本身的具體情況來找出它的內部發展規律；套用別的民族的語言的關於「複合詞」的格式來否定漢語的多音節化，是容易跳進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漢學家曾經陷入的泥坑的。

* * *

像上面所說的，漢語既然不是單音節語或者單音節佔優勢的語言，它的詞彙也不是更加單音節化而確實是更加多音節化了。這樣一來，單音節的漢字最適合單音節的漢語的說法根本就已經失掉了前提。可是，我們仍然願意對於這種「適合論」作進一步的分析。這種論調的主唱者，一般是多憑直觀；可是發展到峯頂，也就有人試圖找尋哲學理論做基礎。我們可以仍以前面引用過那篇文章爲例，該文作者是這麼說的：「根據唯物辯證法來看，文字是語言書面化的形式，而語言是文字的內容，所以文字和語言的關係正是形式和內容的關係。」隨後又說「又按唯物辯證法的規律來說，形式爲內容的重要原素，它反過來積極的作用於內容的發展過程和內容的變化。這是形式對於內容的反作用，文字對於語言也一定會發生反作用，積極促進語言的發展過程和變化。」最後斷定：「所以中國文字可以說是中國人民幾千年來摸索的適應於中國語言社會（？）的一種民族紀音法。而拼音文字就不能有這種涵蓋我國方言的功效，要把方言差別顯現出來而導向分裂。」㊆關於唯物辯證法以及形式和內容的關係，恩格斯早就說過：「全部有機體的自然界就是形式與內容底統一或不可分裂性之堅實的證明。」㊇這就是說，形式和內容是像動物或者植物的形態和生理的機能那樣具有內在的不可分割的關係。列寧說：「形式是本質的，本質是這樣或那樣形式着……」㊈「……內容與形式及形式與內容的鬥爭，形式的

㊄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二一頁。

㊅ 例子見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第一講，第八頁。

㊆ 上兩段都引自張銳光：「從唯物辯證法來看中國文字跟語言的關係」。

㊇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見博古編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問題」東北書店版，第二分冊，第二六〇頁。

㊈ 列寧：「哲學筆記」，引自同上書，第二六〇頁。

拋棄，內容的改造。」㈩大家讀了這些話，請來想一想，語言和文字，漢語和漢字中間的關係，是不是這種誰離開誰也不能存在的內在的必然依存關係呢？在文字出現以前幾千幾萬年就有了人類的語言，怎麼可以說文字是語言的不可分裂的形式？在象形文字階段，同樣畫一個太陽，埃及人有埃及人的說法，中國人有中國人的說法；同一套拉丁字母各國讀法拼法不同，怎麼可以說語言是文字的必然的命定的內容？漢民族的語言，一個階段用象形會意爲主的文字來寫，一個階段用形聲爲主的文字來寫，不久的將來又可以用拼音的文字來寫。有些民族更換過幾次字母形式（例如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文字由老蒙文而拉丁化，現在是斯拉夫化了）。這種關係又怎麼能和那具有互相聯繫、互相滲透、互相過渡等性質的內容與形式的關係相比？由此可見，硬把語言和文字的關係說成內容和形式的關係，是套錯了公式，不合事物的本來面目的。那麼語言和文字中間究竟是什麼關係？我們大家知道，文字是書寫語言的一套記號體系。語言的內容是思想，「語言是思想底直接現實」（馬克思）。「思想底眞實性表現在語言之中。只有唯心主義者才能談到與語言底『自然物質』不相聯繫的思惟，才能談到沒有語言的思惟」㈩㈠。有聲的語言又能幫助人類發展自己的思惟。要講形式和內容，語言和思惟中間這才有形式和內容的關係。至於文字和語言，不過是書面形態和口頭形態的分別，語言用分音節的聲音作信號引起大腦的條件反射；文字用字母或筆劃的組合形式作信號代表一定的語言來引起大腦的條件反射。用什麼形態的文字寫什麼樣子的語言，是一個歷史上的事實關係，而不是內在的必然的關係。用一種文字寫一種語言，合適了就寫下去，不合適就改革，就掉換，使它更加適合於書寫發展了的語言，更加便利廣大的人民來使用；在這裏，完全沒有利用形式必然要適合其原有的內容的哲學範疇來加以阻礙的必要。用什麼文字才能更好地書寫語言，在各個民族所經歷的道路是不同的。可是，大體說來，都經過類似的發展階段——從象形會意，假借、形聲等到用字母來拼音。拿中國來說，三、四千年以前咱們的祖先發明了畫畫兒的辦法。費很大力氣畫一隻老虎或者象什麼的，用來和語言中「虎」或者「象」的古音結合起來，作爲書寫它們的記號。後來畫起來嫌麻煩，就加以簡單化，進行了改革，由篆而隸，由隸而楷，還隨時有所減略變成各個時期的草書。最後這兩個字變成跟老虎和象兩種動物各無相似之處的一堆筆劃結構。你說「虎」「象」二字是形式，ㄏㄨˇ，ㄒㄧㄤ二詞是內容，這兩個「民族精華」的「單音節的文字」就是那兩個「單音節的語言」的不可分割、不可改換的形式，天然地十分適合；可是我們看了又看，從字形找語音，從語音找字形，可都找不出一個絕對的必然的關係來。而且恰好相反，兒童和民衆，少數民族的弟兄和外國的朋友，雖然都滿懷熱心想學它們，可都感到形體和語音中間沒有連繫，筆劃却又繁多，記、認、寫、用，樣樣都很困難。請問，在這樣的情形下，還是按照「漢字最爲適合漢語論」堅持不改以滿足少數人的保存「民族精華」的願望呢？還是按照「中國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的指示來滿足廣大的兒童、民衆、民族弟兄、外國朋友等等大家共同的渴望，把它改成容易讀音，便於記憶、寫用的拼音文字呢？我想，凡是稍爲攷慮到人民大衆的遠大利益的人，都會很容易地選擇後者的。

至於把整套漢字當作「民族的紀音法」，強調它的「涵蓋我國方言的功效」，更是沒有根據的說法。漢字不是標音制的文字，這已經是普通人對於語言文字學應有的常識了。例如前面舉的「象」、「虎」二字，其讀音各地方言之間不同，現在和古代也不同。單憑這兩個符號本身，不加反切和注音符號，我們沒法知道他們在任何一個方言區的讀音，我們也沒法告訴別人它一定只讀這個音、不讀別的音，至於它們的古音更是不能憑字形來推知。可是，任何一種標音的字母，甚至於不分析音素的音節字母（例如日本的假名），他們的讀音對於一個使用他的民族來說都是固定的，它們的古音也是可以推知的。明明知道漢字對各地方音的關係有如一個未知數的X，反而把X認爲是記音的音標，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形聲字的聲旁，雖然表現了古人用漢字來記音的企圖，可是弄到最後一個聲音有幾十個聲旁來表示，一個聲旁在這個字是讀這個音，在那個字裏又讀那個音，結果認字還是得注重全形，「形聲」不能算是純粹的記音方法。再說用漢字來記音、譯音，已經發生很大的毛病了。例如上海人把 Washington 譯成「華盛頓」，北京人讀起來不對頭；北京人把 Stalin 譯作斯大林，廣州人把它唸成Sidailem，福州人唸成Syrtaling，上海人唸成Sdhalin，厦門人唸成 Sutailim……，一個人的名字變成了好幾個不同的聲音，這漢字還能算一種「紀音方法」嗎？漢字和方音間的矛盾還能「涵蓋」得下去嗎？我們豈不可以據此以證明，保存漢字正好是保存了甚或助長了方言間的分歧；如果按照眞正可以叫做「紀音方法」的注音字母（雖然尚待改進）來把 Stalin 譯作ㄙㄊㄚㄌㄧㄣ，那就可使各方言地區人民都會來學習這個和原音最相近的正確讀法，全國就能趨於一致。因此，我們可以說，宣稱漢字繼續保存下去是「適合方言複雜人口衆多的音素」甚至於能促成語言的統一，實在是在散播一種有害的幻想。漢字使用了三、四千年，又那裏會消除了各地方言間的分歧呢？方言的紛歧是由一個民族經濟、政治、文化等發展的情況決定的；方言紛歧的消除也要像馬克思所說「由經濟和政治的集中來決定」。適當的文字形式的採用，可以

㈩ 同㈨。

㈩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三九頁。

促進這個客觀的集中過程。但是可以肯定的說，能起更大作用的，一定是那種能明確不變地寫出三萬萬五千萬人說着的普通話的規定語音的拼音文字，而不會是那種任憑各地人民按照方言隨便來唸，唸得各自不同的漢字。歷史將會最後證實這樣的斷定！

* * *

最後，讓我們來談談文字改革和愛國主義的關係。爲什麼要談呢？前面已經說過，有些保守主義者在反對文字改革的言論中，常常喜歡運用些愛國主義的詞句。而且事實上有些地方的有些人，也會發生過任意按照自己的解釋，反對別人談論文字改革，認爲和熱愛祖國語言文字的思想不相容。有的學校個別負責人竟然干涉語文教員不准他在課堂上講到文字改革問題。中國人對於中國文字（其中主要是漢字，有些兄弟民族也有自己的歷史較久的文字）要不要熱愛呢？要熱愛的。劉少奇同志在「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論中說：「眞正愛國主義乃是對於數千年來世代相傳的自己祖國、自己人民、自己語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之熱愛，這種愛國主義是和那種自大自私的、排外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及反映那種落後的家長制的、小農的狹隘閉關主義、孤立思想、宗派主義、地方主義等民族偏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中國文字要不要改革呢？要改革的。拒絕改革就不免要陷入劉少奇同志所說的那種落後的狹隘的閉關主義的錯誤中；把艱難的漢字誇張爲民族精華甚至於比別的民族的文字更優美，也正是孤立、自大的偏見。熱愛祖國跟改革漢字兩方面有沒有矛盾呢？沒有矛盾。文字改革正是一種愛國主義的事業。文字是造來給人用的。漢字曾經在歷史上盡過很大的作用，現在也還是我們應用着的書面上的社會交際工具。可是，我們越是爲了愛祖國，就越覺得應當予以改革，因爲它已經證明不能很有效率地供我們人民來使用了。我們熱愛祖國，可是我們祖國的經濟是落後的，在初解放時工業生產只佔百分之十左右；爲了建設一個比今天更可愛的國家，我們必須實行工業化。舊日的生產工具（包括交通工具），例如耕犁、鐮刀、牛車、帆船，過去以至於現在仍在幫助我們進行生產，建設了祖國，創造了生活，我們不能不用它。可是它們是落後的，生產效力是很小的，我們決不能死守住它們，反對任何改革和改進。不，我們要爭取用拖拉機、收割機、火車、輪船來代替它。在國內恐怕很少人會利用熱愛祖國事物的感情作藉口，反對改進和改革，反對使用新的機器，新的工具吧？文字正是書寫語言的社會交際工具。知識分子天天看漢字、寫漢字，正像老農民對於他的耕犁、鐮刀一樣有感情。解放後的農民，親眼看見了拖拉機、收割機的優越效果，也不會拒絕使用這些進步工具，倒是渴望自己也有能用上的一天的。進步的知識分子對於自己用慣了的文字工具怎麼可以反而比老農民更保守？站在人民大衆的立場上，熱愛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認眞地分辨出：哪是進步的適合人民大衆的長遠利益的東西，哪是落後的東西必須加以改造或者創造新的來代替，眼睛向前看而不向後看，這是眞正的愛國主義，應該提倡。專從個人的或者某一階層的狹隘利益出發，把便於少數人應用而給廣大人民造成困難和痛苦的、落後於社會生活的發展的東西，當做民族的精粹的東西保持下去，不准人家動一動，改一改；改了就說人家拋棄祖先的遺產，是罪過，是不愛國。這不是什麼愛國主義，而是保守主義，應該堅決反對。毛主席對於如何對待歷史上留存下來的東西，有着極爲正確的指示，讓我抄在下面，作爲本文的結語。

「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於人民羣衆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引導他們向後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㈠㈡

㈠㈡「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六七九頁。

斯大林文集第九卷希臘文譯本出版

希臘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出版局已經出版了斯大林文集第九卷希臘文譯本。

朝鮮出版列寧斯大林關於經濟問題的著作

朝鮮勞動黨出版社出版了列寧和斯大林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的文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第一卷。「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文集共有四卷。「勞動新聞」寫道，這部書對朝鮮的黨的幹部、經濟學家、經濟工作者有很大的幫助。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大量印行斯大林的著作

羅馬尼亞勞動人民熱愛斯大林的著作。截至目前爲止，政治書籍出版局已經以羅馬尼亞文和少數民族的文字印行了斯大林的著作一百二十四種，總發行量將近七百五十餘萬册。

關於學習祖國語文的幾個問題

汪金丁

斯大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給語言學奠定了堅固的基礎，確立了這一門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對於我國的語文工作者說來，這部著作是取之不盡的寶庫。而它的指導意義，我以爲是通過語言科學上的一些具體問題，使我們進一步地理解到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的偉大力量。

一

在這部著作中，斯大林首先對什麽是語言的問題，給我們下了經典式的定義。他確切地指出，語言是特殊的社會現象。也就是說，語言雖然具備「一切社會現象所固有的共同的東西」，却還「有着自己專門的特點」。語言和一切社會現象共同的地方，是它們都替社會服務；而語言與其他現象相區別的特點，則在於「語言之替社會服務，乃是作爲人們交際的工具，作爲社會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作爲使人們相互了解並使人們在其一切活動範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

語言的這個特點，決定了馬爾所採取的「語言的階級性的公式，是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因爲語言之作爲人們的交際工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是爲了滿足全社會的需要，滿足社會各個階級的需要，是一視同仁地替全社會服務的。它「對社會的所有組成員是共同的」，因而「對社會是統一的東西」。

語言的這個特點，同時又決定了語言不是一個時代的產物，而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在這許多時代中，它形成起來、豐富起來、發展起來、精鍊起來」。語言是千百年來的歷史產物。

爲什麽語言能成爲人們的交際工具和社會中交流思想的工具呢？這主要是因爲語言直接與思想相聯繫。思惟是人在勞動過程中對外部世界的反映；語言則「把人的思惟活動和認識活動的成果，用詞和句記載下來，鞏固下來」。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沒有語言外衣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不表達任何思想的語言，也是沒有的。

人的思想的產生，正如斯大林所說：「只能是根據他們日常生活中由於視覺、觸覺、味覺、嗅覺而形成的對於外在世界對象及其相互關係的形象、知覺和觀念。在這些形象、知覺、觀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沒有任何內容，就是說，它是不存在的。」因此，人的生活經驗豐富了，首先是人們對客觀事物所認識的感性的材料豐富了，例如由於工商業以至技術和科學的不斷發展，就要求語言用新詞新語來充實它的詞彙。但是感性的材料，它「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眞實性的反映，但他們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㈠。也就是說，必須通過概念、判斷和推理等等思惟活動。而這種思惟活動，「是在語言的材料的基礎上、在語言的術語和詞句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存在」。

沒有詞，概念就無法存在；沒有概念，詞也就失掉它應有的意義。思惟中的概念與語言當中的詞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所以，作爲語言的建築材料的詞彙，它必然「是處在差不多不斷改變的狀態中」，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語法構造的改進，一方面說明了人在通過社會實踐，一定會使感性認識豐富起來，一方面也說明了詞和語言在人的思惟活動中所起的概括的與抽象的作用。

語言因思惟而豐富發展，思惟因語言而精確嚴密。由於「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㈡，我們的思惟活動，是無止境的，因而，我們的語言，也是日趨優美與完善的。

由此可見，思惟的發展是以人的實踐爲基礎的；語言的發展是與人的實踐、與人在實踐當中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和思惟分不開的。「人的實踐重複了不止億萬次，於是在人的意識中以邏輯形式固定下來。」㈢語言，也是以其逐漸

㈠「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九〇頁

㈡同前引書，第二九四頁。

㈢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解放社版，第一八四頁。

豐富的詞彙，在接受語法的支配下，才有其極大的意義。因此思惟和語言是都有其各自的規律的。

以思惟形式的結構爲對象的是邏輯，以語言的結構爲對象的是語法。作爲表達思想使人們達到相互瞭解的這一點上，邏輯與語言的功用是共同的。在思惟過程當中，必須不違背邏輯，在表達思想的時候，必須遵循語法。邏輯和語法，如我們所知，都是體現了科學的概括力量與抽象作用的。但應當指出，把語法和思惟混同起來，正如用詞來頂替概念一樣，都是不對的，是歪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映論的。很顯然，同一的概念，在不同民族的語言中，是以不同的詞來表現的；一個詞表達兩個或甚至兩個以上的概念，也是可能的。至於不同民族的人，儘管其所遵循的思惟的規律是一致的，他們所藉以表達思想的語言結構的法則，却顯然有所不同。

語言同思惟的關係，一般地說來，大體如此。

二

那麼，什麼是語法呢？斯大林在他的語言學著作裏，也同樣給我們下了經典式的定義：「語法是詞的變化規則及用詞造句的規則的綜合。」這個定義首先使我們理解到詞彙與語法的關係，即一方面詞彙是語言中的建築材料，詞彙不接受語法的支配則不能構成語言；一方面因爲社會的發展，詞彙逐漸充實，語法的構造也同時逐漸改進。其次這個定義，使我們認識到語言「具有一種有條理的可理解的性質」。我們懂得別人所說的話和別人懂得我們所說的話，主要的是我們在運用語言的時候，不管注意也好，不注意也好，誰都不能脫離一定的語言結構的規律。脫離了規律以及違背規律，就會使語言變成無法理解的東西。

既然人們能够利用語言，互相交際，交流思想，達到相互了解，主要是由於語言有其一定的法則，既然這個法則又是人類思惟長期抽象化的成果，那麼對於這個法則——語言的法則，也正如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一切科學法則所理解的一樣，它是語言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們是能够認識它，掌握它，並且應當運用它的。如果以爲自已從來寫文章都不會學語法，從而否定或忽視學習語法的重要性；如果以爲漢語的規律，什麼人都可以各行其是地任意去做主觀的解釋或闡明，從而給語法罩上神秘的外套；那末，我以爲這兩種對待語法的態度，都是與毛主席所諄諄教導我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毫無共同之處的。

我國的漢語是有它自己的規律的，因爲我們的漢語是經歷過長期的考驗的。我們的詞彙是豐富的。我們完全能用自己的語言表達精確的思想和深厚的感情。我們把詞聯結在一起而組成的語言的結構、形式，也是非常多樣的。在我們的歷史上，「產生過許多善於使用語言的巨匠」，而「毛澤東同志和魯迅先生」，更「是使用這種活潑、豐富、優美的語言的模範」㈣。

三

我國的漢語是有它自己的規律的。漢語的規律和別國的語法有區別，因而學習漢語語法，首先是要掌握它的特點，不是那些非常生僻的在個別枝節問題上所找到的特點，而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特點。漢語語法的基本特點，就在於我們的語言，主要是通過語序來顯示語法的關係。

要了解語序在漢語語法中的特點和它的重要，必須認清句子的成分，特別是句子裏面的基本成分。是句子或不是句子，也主要是以聯結到一起的那些語詞，能不能發生「主」「謂」關係，即有無基本成分的主語和謂語來決定。主語或謂語都可以是各由一個詞，或短語以至句子形式所組成。也就是說，句的基本成分可以用各式各樣的結構（形式）表現出來。「鳥鳴。」「花開。」都是句子，「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違背美國人民愛好和平的意志。」也是句子。前兩句「鳥」和「花」，以一個詞做主語，「鳴」和「開」以一個詞做謂語；後者「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是主語，「違背美國人民愛好和平的意志」是謂語。主語是個句子形式，謂語是由動賓結構所組成，即動詞「違背」及賓語「美國人民愛好和平的意志。」但這個賓語，又是用「美國人民愛好和平」這個句子形式做「意志」的附加語。這一句的結構，比較複雜，可是全句基本上也只是一個主語和謂語。複雜的是結構，不複雜的是它的成分。先看成分，後看結構。成分體現爲結構，結構又由成分所組成。成分除基本成分之外，雖然還有賓語、表語、附加語和補足語，雖然它們也都可由不同的結構所組成，但全句的結構總是一層套一層。而重要的是它的套法，是根據一定的次序。一般地說，主語在前，謂語在後，賓語在謂語中的動詞之後，表語在謂語中的繫詞之後，附加語在被附加的語詞之前，補足語在被補足的語詞之後，各個成分在句子裏有其一定的位置，位置變了，次序變了，成分也就不同。寫成「我記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是補足語；寫成「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清清楚楚」就變成附加語了。

句的結構可以千變萬化，但是我們所要表達的語言却必須根據一定的語序。例如「斯大林同志在戰爭中親自指揮軍隊」這樣一句話，我們不能根據俄語在這個句子所排列的語序那麼寫，如寫成「在戰爭中軍隊指揮親自同志斯大林。」這說明了俄語雖有它本身的語序，但它主要不是完全靠語序來表現語法

㈣「人民日報」社論，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

的關係的；俄語的語序是根據詞的形體和詞的發音的變化規則來體現的。

語序在我們的語法中是特別重要的，即使不曾學過語法的人，也不是不會運用語序的規則來說話的，這特別是表現在我們接觸到外國語的時候，就顯出我們語序觀念的強烈。例如「此處賣糖」，印尼語寫成「糖賣此處」或「此處糖賣」。我們最初看到聽到時也許很不習慣，但印尼人卻不會弄錯「誰賣誰」的關係。因為在「賣」這個詞上它加了個詞頭「Di」。無論是說是寫，多麼複雜的句子，詞的彼此間的關係不會亂，這說明了印尼語固然也有一定的語序，但它主要不是通過語序顯示語法關係，而漢語中的語序卻構成我們語法的特點。

四

句式的變化，句的結構如何組成，是決定於我們要表達的思想感情，即我們所要表達的內容的。內容決定形式，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這個「決定」，卻不允許我們輕率地對形式的法則予以「創造」或「改造」，我們只能根據語言發展的客觀規律本身，去認識它們，掌握它們，然後才能很好地使形式為內容服務。把火災的火變成為供人使用的火，把雷電中帶破壞性的電力變成為電報機上和弧光燈中馴服的電力，其間的關鍵問題，只在於我們是不是發現、認識、掌握以至利用了自然的規律。語言規律的重要也是如此。

否定了語言結構的規律，抹煞語言結構（形式）的重要性，其結果就使我們沒有辦法精確地表達我們的思想感情。只有善於運用語言結構的法則，通過多樣的語言的表現形式，才更能發揮語言應有的作用。

我們目前所讀到的一些文章，往往很容易給我們留下這麼一個印象，那就是作者太喜歡用結構比較複雜的附加語。還有些作者很喜歡用一種並列的結構。例如，我們說：「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是中國國民的公德。」或說：「人們能夠發現法則，認識它們，依靠它們，利用它們。」都是運用並列結構來表現主語或謂語的。這種並列結構不用說是很有用的，因為它可以把彼此有關聯的東西聯接起來，讓語詞的組織顯得有條理，而語勢也可以加強起來。

但是我們也還讀到下列這樣的句子：

「由於我黨的正確領導，由於行政上的具體協助，由於全體同志的積極努力，這一年來我們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還存在着某些缺點……」

這個句子，主語謂語俱全，同時又有附加語，又有並列結構，拿語法來衡量，我們還說不上它有什麼不妥當，並且表面看來，其內容也是未可厚非的。但我們總感到這樣的句子「好像是曬不了人的月亮」。這句子使我們回想到抗戰時期，曾有人寫起文章來，第一句總是什麼「自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一類的話，當時是稱之為「抗戰八股」的。其所以是「抗戰八股」，就因為作者寫那句話的時候，並不是自己想出來的，並不是在實踐當中有什麼非表達不可的自己所思所感的東西。他只是搬用了現成的語言，現成的句式。句子的內容和形式，沒有血肉相聯的東西把它們結合起來。內容言之無物且不用說，形式也隨之顯得毫無生氣。加里寧在「論共產主義教育」一書裏，曾提到十月革命以前，俄國有一些唸經婆，他說：「祇要你聽到一個唸經婆的話，那麼第二個咕噥的也完全是這一套：『靠聖母的恩德，我能瞻仰聖光。』」㈤這說明沒有自己的思想，是一定不會有自己的語言的。勉強搭起來的語言結構，只能是空架子；「形式」是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才會變得殭化的。

據說十九世紀法國有個作家，他初學寫作的時候，老師給他出的題目每篇都是「歸途所見」，他開始很感到驚異，但後來卻發覺在同樣題目下所寫的那些文章，顯然有所不同。因為他在歸途上看到的一切既不盡同，一方面又有了更深入的領會和理解。所以實踐是首要的，而怎樣更深入地去認識、理解、體會我們的生活，更應當努力去學習。我們不能在生活當中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只有我們多感受，多思索，我們的語言才能受到鍛鍊，我們才能創造自己語言的活潑清新的風格和特色。和尚唸經的文風是學不得的，也是必須糾正的，因為那最多只能教會我們用死板的形式去套內容。我們要學習的是如何根據我們掌握的語言法則，去支配語言。死記一些詞句的格式，是完全失掉學習語法的意義的，我們得糾正那種只知八兩不知半斤的作繭自縛的學習方法。

漢語除掉語序所表現出來的語法的特點之外，詞的形體受着漢字的限制，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詞，如我們所知，它首先是概念的表現，是概念的外部形式，但同時它必須是「形」「音」「義」三者俱備。在我們漢語中，第一，詞是通過方塊字的「形」來表現的。第二，方塊字是和語音脫節的，就是說，一個字為什麼讀出這樣或那樣的音，很難像俄語、英語似的能從詞的形體的構造上找到規律。第三，漢字雖有一部分是一個字就表達一個概念，而成為單音詞，但另外也還有不少字，它是肯定地不能由一個字表達一個明確完整的概念的。因為一般學習語文的人，對詞缺乏應有的認識，把詞和字往往混為一談，而「有些語言學家」如李向真先生所說：「總不願把漢語的詞固定起來看，而喜歡把詞拆成碎片兒的『字』來研究。」㈥他們認為「能以小量的基本字配成無數的詞兒」（周子貞），從而「錯綜變化，就可以無窮」（唐蘭）。這結果使人

㈤　加里寧：「論共產主義教育」，莫斯科中文版，第六一頁。

㈥　「中國語文」，一九五三年四月號。

誤認爲只要綴字即可成詞。其實詞不是由基本字配成的。例如我們說「接受」、說「整理」，因爲這兩個詞都各表現了一定的概念。但如果我們把「接」和「理」連起來或把「整」與「受」連起來，都不能配成詞。我們說「女兒」或「兒女」，這兩個詞同樣也是在表現概念這個要求下產生的，並不是什麼錯綜變化的字的配合產生的。不過應當指出，我們在綴字成詞的頑固的觀念之下，抹煞了詞，以至形成字的任意的堆砌，而魯迅先生所說的「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得的形容詞之類」的詞，也就在這種情況之下發展起來了。

我們的詞彙是豐富的，因爲「語言的詞彙」正如斯大林所說：「對於各種變化是最敏感的，它幾乎處在經常變動中。」但是漢字的形體，多年以來，很少變動。並且我們現在還有一些上了口的詞是寫不出來的。一方面是「生產往前發展，出現了階級，出現了文字……出現了印刷機，出現了出版物——所有這一切都使語言發展起着重大的變化」。也就是說文字不能不影響語言，一方面語言中的詞，歸根到底，它是人在實踐當中通過認識與思惟，在表現概念這個要求下產生的。所以，對於漢語中詞的形體受着方塊字的限制這個現象，除掉通過文字的改革，從根本上使我們的文字穩步地走向拼音化的道路，打破「音」「形」「義」彼此間的脫節的現象，掃除因漢字限制詞形橫在學習語文道路上的很多障碍，建立詞的觀念，以及有計劃，有步驟地通過語文的教材，培養、鞏固初學者的詞的觀念，都是當前迫切的任務。

五

學習語文的重要，從語言之作爲人們的交流思想的工具看來是很明顯的，「因爲沒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使人們在與自然力的鬥爭中，在爲生產必需的物質財富的鬥爭中調協其共同活動，便不可能在社會生產的行爲中獲得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會生產本身的存在。」根據這樣的理解，斯大林指出語言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但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如既沒有資產階級的語法，也沒有無產階級的語法。但語言之沒有階級性，不等於說語言所表達的思想感情內容，就不該體現那運用語言的人的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等等。因而把語言同文學作品——上層建築對立起來，甚至學習文學作品的時候，也要求教師通過作品只講語法，是把語言的特質從其對於上層建築的關係上孤立出來的一種看法。而學習文學作品，特別是學習文學創作，更足以提高思想水平，提高思惟能力，從而提高運用語言的能力，這是再明白不過的。沒有階級性的語言，能夠表達有階級性的思想感情，是通過人的認識與思惟的過程結合在一起的。

斯大林曾不止一次的提醒我們，「馬克思主義是一切教條主義的敵人」。我們學習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其主要的意義，我以爲也在我們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結合實際。斯大林還告訴我們：「如果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自由的批評，任何科學都是不可能發展、不可能進步的。」但是單以對於漢語的規律來說，我們有些著作還不都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加以解釋和闡明的。同時無論對語法的認識問題，無論是對語文教學問題，我們還很少展開熱烈的爭論。相安無事，互不關心以及彼此冷淡的現象，還不能說不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我們一方面同意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對實際的指導作用，一方面又停留在自己片面的經驗當中，不大懷疑自己研究的結果。因此，誰又能說我們是眞正地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呢？

我們的面前，是無數勤勞勇敢的人民，他們從驚天動地的革命運動中翻身起來，他們迫切的要求文化，要求高度的文化，而語文科學是學習一切科學的工具。我以爲斯大林在語言學上的光輝的著作，不但解決了我們語言科學上的問題，同時還教育了我們爲什麼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如何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照亮了學習祖國語文的道路，是教導我們從理論到行動的道路，是理論結合實際理論指導實踐的道路。

文中引文未註明出處的，均引自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預訂本刊辦法

一、讀者訂閱本刊，不分機關、團體或個人訂戶，均須按季預訂，原一九五二年新華書店、中圖公司訂閱的老訂戶，不在季底滿期者，仍可在收訂期內續訂至季底，以免中斷。

二、預訂本刊的期限，每年分爲四次，即每年的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爲預訂下一季度的期限，如五月份應預訂第三季（七、八、九月）出版的雜誌，不過各地郵局爲了照顧讀者，暫將每年二、五、八、十一月的各季預訂月份，延長到三、六、九、十二月份的一部分日期。截止期限由當地郵局根據雜誌出版日期、路程遠近及內部處理手續時間來決定，請讀者和當地郵局聯繫，注意收訂日期。

三、讀者訂閱本刊，如因當地郵局定額已滿，不能收訂時，可以先行登記預約，暫不付款，俟郵局通知可以供應時，再正式辦理訂閱手續。

四、預訂本刊請在預訂時付清刊款。

今年的端午（六月十五日）是我國大詩人屈原逝世的二千二百三十週年。本刊特發表下列三文，分別介紹屈原的時代、生平及其作品，以資紀念。

——編　者

屈原傳

鄭振鐸

屈原（公元前三四〇—二七八年）是古代楚國的大詩人，也是中國的一個不朽的大詩人。他的詩雖然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但他的影響是極大的；地域不限於楚，時代不限於戰國；整個中國，從兩漢到明、清，他的影響是一直深入於詩人們的心裏的。他們不僅同情於他的不幸的悲慘的生平，且也爲他的作品裏所包括的眞摯的感情，豐富的想像，弘偉的氣魄，汪洋無際而又美麗絕倫的詩語與音調所震撼，不由得不多多少少的都受到他的影響。楚國的歌是音調曼長，而又運轉自如，像荷葉上的朝露，玉盤裏的圓珠似的。所以漢代初年的人，最喜歡楚歌。劉邦、劉徹不僅喜愛楚歌，而且是都會創作楚歌的人。大政治家賈誼，則因爲自己的身世有點像屈原，所以，他的幾篇賦，便完全用的屈原的風格。情調也很相同。無疑的，楚歌是古代南方的最流行、最美麗的歌曲，而屈原則把它大大的提高了一步，使其更爲充實，更爲美麗，更爲弘偉，更有創造性與不朽的藝術性。詩經爲二千四百多年前孔子所編定，不能收進這些古代的南方歌詞，但我們祖先在二千二百多年前就保存下來的屈原、宋玉等楚國詩人們的作品，實際上是超過了詩經三百篇的。

屈原，他的名字又叫做屈平，是楚國國王的同姓貴族。他生於公元前三四〇年。他初期的生活，過的是一般貴族豪華生活，在政治上也有很高的地位。楚懷王（熊槐）叫他做「左徒」，這個官地位很高，僅次於令尹（丞相）。這時大約是在公元前三一五年左右，他大約是二十五歲左右。他的學問很好，知識很豐富，對於政治形勢的變遷，知道得明白，又很會外交辭令。楚懷王很信任他。叫他參預大政，編訂法律；有時也叫他接待各國來的使節，還常常派他出使各國。有一位同事的人，叫上官大夫的，和他爭權，又妒忌他的才能，老想把他排擠出去。有一次懷王叫他編定國家的法令，屈原正在起草，上官大夫看見了，就要搶奪了去，做爲他自己所寫定的東西。屈原當然不肯給他。上官大夫就向懷王說他壞話道：「王叫屈原做法令的事，是大家都曉得的。每一種法令公佈出來的時候，屈原就自己居功說，這法令要不是他做就沒法定得出來。」懷王很生氣，就此疏遠了他，不讓他再做左徒了。這時，他大約不過三十歲左右。屈原很傷心，覺得他自己一心爲國，盡了忠心，費盡智力的爲國家做事，却無端爲奸臣所排擠。國王却是非不明，聽信壞人的話而不相信他的忠直。他雖有很好的意見，再也不能向國王陳述了。心裏老是鬱鬱不樂，便寫了一篇偉大的詩，名爲「離騷」，來傾吐他自己的幽鬱的情緒與忠眞的抱負。從他離開了政府之後，楚國的政治便一天天的混亂下去。這時候，秦國的兵力是最强的，有計劃的要逐漸的消滅別的國家，統一整個的中國。楚國佔的地方最大，齊國最富，楚、齊兩國邦交很親密，這是秦國統一計劃中的最大的阻礙。秦惠王很怕他們兩國老是這樣聯合起來對付他，就想要離間齊、楚的聯合防禦的政策。他派了張儀到楚國來，送了一份重禮，懷王就叫張儀做官。張儀告訴懷王道：「秦國最不滿意的是齊國，但楚國現在却和齊國連盟。要是你王爺能够和齊國斷絕邦交，秦王願意送給你商於地方的六百里地。」懷王是個貪心的人，又輕信張儀的話，就立刻和齊國絕交，派人隨張儀到秦國要那六百里地，張儀騙那使臣道：「我和你王爺說的是送給你國六里地，不是六百里。」楚王使臣大怒回國，告訴懷王。懷王也大怒起來，在公元前三一二年，出兵攻打秦國。却吃了一個大敗仗，士兵死了八萬多人，大將屈匄也被俘虜去，楚國的漢中一帶地方也被秦人佔領去了。懷王不甘心失敗，便徵調了全國的軍隊，再去攻秦。秦楚兩國的兵正在藍田地方相持着，勝負未分的時候，魏國知道楚國空虛，便起兵來攻襲楚的後方。懷王恐怕國內有失，就把前方的兵調了回來。這時，齊國很生氣，不來救楚。懷王知道自己做錯了事，便又叫屈原出來，出使到齊國去恢復連盟。屈原這時是三十九歲。秦王知道了這事，怕齊、楚兩國又聯合起來，便派人到楚國求和，願意還給楚國他所侵佔的漢中地方。這是公元前三一一年的事。楚懷王一心怨恨張儀，就對秦使說，他不願得地，只願秦國把欺詐的張儀送來讓他報仇。張儀告訴秦王道：「以我一個人來換整個漢中地方，我爲什麼不去呢？」他就到了楚國，送了一份厚禮給當權的奸臣靳尚，又勾結了懷王的寵愛的妃子鄭袖。懷王聽信了他們的話，又輕輕易易的把張儀放回去。這時候，屈原剛從齊國出使回來，連忙進朝勸諫懷王道：「爲什麼不把張儀殺了呢？」懷王後悔起來，再派人去追趕張儀，已經追不上了。此後十多年，楚國的政治更昏亂了，兵力也衰弱下去。有一次，各國來攻楚，楚又大敗，大將

屈原像　　明代陳洪綬繪

僕夫悲余馬懷兮
蜷局顧而不行
(屈原: 離騷句)

蔣兆和作

暫時也被殺死了。屈原眼看着國家政治、軍事方面的種種的失敗與混亂；他自己又不做左徒的官，沒法上朝去進諫，心裏異常的憂愁、憤怒，便前前後後的又寫了好些詩篇，以抒寫心裏的悲憤與怨恨。他憤怨那些當權的奸臣們，矇蔽國王的耳目，顚倒黑白，貪汚亂法，而他自己一心爲國的人，明知祖國的前途異常的危險，人民的生活異常困苦，滿肚子的話却無法向國王說，一腔的忠貞的心，却不爲他所了解。他們在中間阻撓着、壓迫着他，不讓他有申述直言的一點機會，便只好把一切的悲憤都托之於詩篇裏了。這些詩篇，爲當時的人所傳誦，使他成爲一個人民所崇敬、所喜愛的詩人。他在政治上失敗了，但在文學事業上成功了。

公元前二九九年的時候，秦昭王和楚國王族的一個女兒結了婚，藉此緩和了楚國與秦國之間的仇恨。他想和懷王會面。懷王相信了秦王的和親政策，就想去秦國和昭王相見，這是一件大事。屈原這時已是五十歲了，他再也忍耐不住，只好不顧一切的入朝勸諫懷王道：「秦國是一個如虎似狼的國家，萬不能相信他們的甜言蜜語。還是不要去的好。」懷王的最小的兒子子蘭，却力勸他父親前去，說：不應該拒絕秦國的求和好的好意。懷王聽信了他的話，毅然的走了。一入秦國的武關，秦兵就把住了關口，留他住下去，强求懷王割讓國土給秦國。懷王又懊悔，又憤怒，好容易想辦法逃到了趙國。趙國却不肯收留他，他又被秦兵扣留住。過了三年（公元前二九六年），他死在秦國。屈原十分的悲傷！他的兒子熊横（頃襄王）繼他爲王。楚國的政治還是那麼昏亂，一點清明的氣象都沒有。熊横叫他的弟弟子蘭做令尹。他們採取的是一貫的和秦親善的政策。熊横又娶了秦王的女兒做妻子。對秦人全不作準備。子蘭是向來恨屈原的直言的，他當了政，當然屈原更被疏遠了。他在朝廷上是一點說話的力量和機會都沒有。他又把他的一腔悲憤，傾吐在他的詩篇裏了。這些詩篇，未免語中帶刺，諷戒朝政的不明。子蘭聽人讀了那些詩，非常的不痛快，就叫上官大夫在熊横面前說了屈原不少壞話。熊横大怒，就把屈原趕逐出郢都，流放他到南方的汨羅江邊去，省得他在郢都裏多言多語。這時候大約是公元前二八六年，屈原已經五十四歲。他從此離開了他所親愛的楚都，不再能够見到它了。他的心沉下去。政治上的生涯是完全結束了。他失望，他悲傷，他憤恨當權者的爲非作歹，只圖自己的享受，全不以國事民生爲意，他更憂愁楚國的力量的削弱，生怕一旦秦兵侵入，無法抵抗得住。所有這些幽憤隱憂的心情，他也都在幾篇美麗而鏗鏘的詩歌裏表白出來。他在汨羅江邊，一住九年，因爲憂愁，身體一天天的壞下去，氣色十分的憔悴，常常披散了頭髮，在江邊散步，口裏吟誦着詩句。當地的人民是很敬愛他的。他們祭神所用的新歌，好些都是由他改編出來的。公元前二七九年，大禍果然來了。秦國的猛將白起，帶兵攻楚，佔領了鄢郢西陵。第二年（公元前二七八年）春天二月的時候，白起又一舉而攻下楚國的都城郢都，縱兵燒了楚國的王陵。屈原知道了這消息，悲傷不已，覺得國家前途是絕望了。這時他是六十二歲，精神和身體都實在受不住這個太沉重的打擊。他寫了一篇「哀郢」，又寫了一篇「懷沙」，就在這一年夏天，五月初五日那一天，抱了石塊，投到汨羅江裏自殺了。離開郢都的陷落，不到三個月。他留下二十五篇弘偉而美麗的歌辭，楚國的人民都能够歌唱它們。他們哀痛這個偉大詩人的悲劇的死亡，據傳說，曾紛紛的競划着船到江上去救他。從此傳下一個風俗，每到五月初五日那一天，全國的人民便都在江上划龍船，還投下糉子，說是給蛟龍吃，叫牠不要吞食屈原的屍體。已經是經過了二千二百三十年了，這風俗還存在着。我們偉大的詩人屈原是這樣爲人民所喜愛，所崇敬！他不僅是屬於古代的，也不僅是屬於楚國的，他乃是中國的一個不朽的偉大詩人！

（根據「史記」「屈原列傳」及郭沫若先生的考據寫出。其他各種不同關於屈原生卒年月的考證，都不一一的舉出了。）

「屈原集」前言*

文懷沙

紀元前三七六年，位於黃河流域中部的晉國分裂爲韓、趙、魏三個國家，歷史上即進入了史學所謂的「戰國時代」。當時的黃河流域除韓、趙、魏以外，還有雄峙關西的秦國，以及位居東北部的燕國，位居山東半島的齊國；在南方的長江流域便只有幅員最爲廣闊的楚國。這七個國家連年爭戰，企圖統一中國，竟綿亙了一百五十餘年之久，一直到紀元前二二一年秦帝國始統一中國。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生於紀元前三四〇年，死於紀元前二七八年。他所生活的六十二年，上距戰國時代的開始僅三十六年，下距嬴秦的統一不過五十七年。他出身於楚王同姓的貴族家庭，楚懷王在位（紀元前三二八—二九八年）時，曾任左徒（次於丞相之職）。他不僅具有淹博的學問，而且對於時勢和國家的前途也有深遠的見識。當時的國際情勢，雖號稱七雄並峙，事實上

* 編者按：「屈原集」將於本月內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爲文懷沙先生所編。

是秦、楚爭霸的局面。秦國的對外擴張政策，非常露骨，在他的壓力下，各國惴惴不安。那時除秦、楚以外，齊國較有實力，所以齊、楚的聯盟，是抗禦秦國的最重要的辦法。

屈原熱愛自已的祖國，所以他極力主張聯齊抗秦。但楚國統治集團都鑽營於個人的眼前利益，而且在外交政策上始終搖擺不定，因此受到秦國的玩弄。在這樣的政治空氣中，屈原接連地遭受到毀謗、打擊和陷害，終於，失去了政治上發言的權利。不久，懷王也自食惡果，被秦國騙去，囚死在秦國。

懷王的兒子頃襄王即位（紀元前二九八年）以後，比他的父親尤爲昏庸，竟把屈原流放到遠方去。懷王死後還不過三年的光景，頃襄王畏懼秦國的武力，竟至於做了秦王的半子。這個糊塗軟弱的楚王，夢想取媚秦國，藉以坐穩自已的寶座。在放逐中的屈原和廣大的楚國人民，他們的痛心是可以想見的。

紀元前二七八年，秦王用武力粉碎了頃襄王搖尾乞憐的夢想，派遣大將白起攻楚，擊破了楚國的京城—郢都，把楚王的祖墳都挖了。頃襄王倉惶地逃到陳城去。長期處在流亡生活中的屈原，這時已經是六十二歲的老人，他經歷了這次痛心的巨大的喪亂，親眼看到了人民的災難深重，十分悲憤痛苦，終於在這一年的端午，自沉汨羅江而死。

屈原的一生，是一個歷史性的悲劇。

屈原在政治上的奮鬥和悲劇，他的思想和他的輝煌的詩篇，都反映了他的時代。他是關心人民、熱愛祖國的詩人。他所堅持的正義，反映了當時楚國人民的要求。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和他的詩篇，和當時楚國人民在精神上是有深刻的聯繫的。他的自沉汨羅江，引起當時人民沉痛的悼念，並且至今猶爲中國人民所紀念不衰。他是中國民族中堅持正義和充分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的偉大代表者之一。

屈原的作品，深切地表現出他自已的和人民的熾烈的愛國感情。他的詩歌形式，又是運用民歌而加以創造性的提高的結果。不朽的屈原，以自已的偉大天才，在中國文學史上完成了一項劃時代的功績，這就是他把人民羣衆的詩歌提高到高度的藝術創造，承繼了「詩經」的人民性的傳統，開闢了以後無數詩人的光榮的道路。他的作品，在中國文學上能佔有最光榮的位置，是理所當然的。

這個集子分兩個部分：

前一個部分「正篇」，包括屈原最重要的作品「離騷」和「九歌」、「九章」，共計二十一篇，皆附有淺近簡單的語體註解。據「漢書藝文志」上說，屈原傳世的作品凡二十五篇。那末，這二十一篇在屈原的比較可靠的作品中，應佔有很大的比重。「離騷」是屈原最負盛名的抒情長詩，無論對屈原其人及其作品的理解上，這篇東西都應該佔首要的位置。因而我們將它放在最前面，一仍過去舊註本的慣例，雖然我們的理由和前代的註家並不一樣。又，「離騷」因篇幅長，故每段後另加大意說明。「九歌」大部分是抒情的悽婉的戀歌，其次是戰鬥的悲壯的輓歌和莊嚴的肅穆的祭歌。傳說這一組詩章乃是根據原來流傳在沅、湘之間的祭歌改作的，這應該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因此放在「九章」的前面。「九章」大部分可以斷定是屈原晚年的作品，故放在最後。

後一部分附篇，包括「天問」、「招魂」、「遠遊」、「卜居」、「漁父」等五篇，其次第除「天問」原在「九章」之前，「招魂」據司馬遷的稱引放在「天問」之後，其餘皆仍王逸的舊例。「天問」是屈原作品中最奇特的一篇，在形式上是「詩經」四言的體裁，但就內容說却是一篇變幻莫測的奇文。這篇作品的組成，主要是對古代的歷史傳統，宗教信仰，宇宙和人生觀念，都起了根本的懷疑，因而一連串發生一百七十二個問題，這是一個對現實抱有濃厚感情的人，基於內心最深沉的煎熬而引起對一切信仰完全崩潰的反射。非常遺憾，截至現在爲止，由於文獻不足徵，這其中所存在的問題的解決，尚有待新材料的發現。「招魂」有人認爲是屈原招楚懷王的魂，有人認爲屈原自招，也有人認爲其性質和「九歌」中的「國殤」近似，乃是祭死於戰禍的亡靈。王逸把它歸之爲宋玉所著，「招魂」的作者是誰？是從來聚訟的問題之一。「遠遊」以次三篇，頗多可能是漢朝人的僞作。「遠遊」的道士氣太重，「卜居」、「漁父」的風格也不類屈原其他的篇什。但我們多少可以從這三篇作品中，約略地認識到屈原死後二三百年內熱愛屈原的人們對我們的偉大詩人的一種理解，——而這些理解，由於貼近屈原的時代，是有助於我們今日對於屈原的認識的。因此，「天問」及其他四篇，皆置於附篇，並不加註解。

這本集子的閱讀對象，乃是企圖供給一般文藝愛好者參攷的。因此在註解方面，力求明白易曉，力避在字句或故實上糾纏。在個別字句或語彙上，如遇有好幾種不同的理解，盡可能選取一種。如舊註所沒有的，或註釋得模糊不清的，就我們能力所及寫上比較可靠而明確的解釋。個別字句，如遇必要也採取試用語體文疏講的辦法。

這本集子主要以「四部備要」據汲古閣宋刻洪本校刊本爲底本，取其字體較爲統一通行。其中若干被公認的衍文脫字，及容易產生誤解的古文，略加勘定，以便利一般讀者閱讀。

在進行編註工作中，得到鼎堂先生的指導和游國恩、浦江清、林庚諸先生的幫助，我表示衷心的感謝。

一九五三年四月

屈原文學作品的人民性

游國恩

屈原是楚武王的後代，同楚王是本家。「史記」「屈原列傳」說他是楚的同姓，他自己也表明他是帝高陽的苗裔，高陽即顓頊，相傳是楚國的祖先，所以屈原的出身於貴族是沒有問題的。不過貴族也有親有疏，屈原雖然與楚王是一家，但在氏族的宗法上來說，他同楚懷王的關係還是很疏遠的。由於屈原的階級出身是一個沒落的貴族，以及他的長期流放的緣故，使他有機會接觸人民；又由於春秋戰國間這個大時代的影響，使他的思想意識就或多或少地傾向於人民。所以反映在他的文學作品上就有了充分的人民性。這種充分的人民性就構成了屈原文學的現實主義的重要部分。例如「離騷」說：

「長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艱！」

又說：

「怨靈脩之浩蕩兮，
終不察夫民心。」

又說：

「民生各有所樂兮，
余獨好脩以爲常。」

又說：

「皇天無私阿兮，
覽民德焉錯輔。……
瞻前而顧後兮，
相觀民之計極。」

又說：

「民好惡其不同兮？
惟此黨人其獨異！」

「抽思」又說：

「願搖起而横奔兮，
覽民尤以自鎭。」

以上所說的「民生」、「民心」、「民德」、「民尤」、「民之計極」和民之好惡那些「民」字，有的是單指一般人民，有的連屈原自己也包括在內。他爲什麼念念不忘人民呢？正因爲他是熱愛人民同情人民的。他在內政上的措施是「奉先功以照下，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他在外交上的主張是聯齊國，以抗「虎狼之秦」。修明法度，抵抗强敵，對人民是有利的。在屈原整個詩篇中的表現，就相當地能够代表人民的感情，反映人民的要求，符合人民的願望，這是他的文學作品最基本的特點。

屈原的文學作品又充分地表現了熱愛祖國的情緒。他熱愛祖國的鄉土，熱愛祖國的山川，熱愛祖國的風土人情，熱愛祖國的一草一木，教人們讀了對祖國有特別親切之感。他一離開國都就痛心，沒有一刻會忘記了回來，他走得越遠就越難過。例如「哀郢」一篇，這種心情就表現得最爲突出：

「去故鄉而就遠兮，
遵江夏以流亡。
出國門而軫懷兮，
甲之鼂吾以行。……
望長楸而太息兮，
涕淫淫其若霰。
過夏首而西浮兮，
顧龍門而不見！
羌靈魂之欲歸兮，
何須臾而忘反？
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鄉之日遠！」

他在放逐途中，非常苦悶，常常借着山川景物風土人情來安慰自己，以求得暫時的快樂。例如「哀郢」說：

「登大墳以遠望兮，
聊以舒吾憂心。」

又如「思美人」說：

「開春發歲兮，

白日出之悠悠。
吾將蕩志而愉樂兮，
遵江夏以忘憂。
擥大薄之芳茝兮，
搴長州之宿莽。
惜吾不及古人兮，
吾誰與玩此芳草！……
吾且儃佪以娛憂兮，
觀南人之變態。
竊快在中心兮，
揚厥憑而不竢。」

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其實他在放逐途中，無時不懷念祖國，特別是季節和氣候變化的時候，就非常難過，（「抽思」：「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慢慢！」）常常夜裏睡不着覺，即使睡着了，一夜做上了好幾次夢，在夢裏回到了郢都。（「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司馬遷說他「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可謂一個極其扼要和正確的概括。

由於屈原堅持正確的外交政策，他一面苦諫懷王，一面向「黨人」作不疲倦的鬥爭，希望能够挽回頹勢，轉危爲安。個人利害在所不計。所以說：

「惟黨人之偷樂兮，
路幽昧以險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離騷」。

「黨人」們的親秦的主張把楚王引到黑暗危險的道路上去，這眞敎人害怕。可是他並不是怕自己遭受任何禍殃，而是怕祖國將會覆亡。及至鬥爭失敗，由見疏而見放，他還是那樣不顧自己，只怪懷王三反四覆，舉棋不定，弄得國事不可收拾。所以又說：

「初既與余成言兮，
後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
傷靈脩之數化！」——「離騷」

不但如此，而且一再表示堅强不屈，絕不妥協的精神。例如他說：「欲變節以從俗兮，愧易初而屈志。」（「思美人」）又說：「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涉江」）又說：「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甚至說：「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又說：「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以上「離騷」）屈原爲什麼這樣堅强呢？就因爲不肯爲了個人利益而危害國家。他認爲如果皇輿敗績，他個人沒有利益可言。他深深地認識到：個人利益即包括在國家利益之中。這樣，他就把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統一起來。所以他在長期放逐之中總是想念祖國，不忘郢都。（「哀郢」：「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總是想回到祖國的懷抱，死也要回去。（「哀郢」：「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在一個時期中，他雖然設想到去國，而終因看見「舊鄉」，寧死也不肯走，最後只有一死而已。這種眞摯純潔的感情就洋溢在他的每一首詩篇裏面，這當然又是他的文學作品的另一個基本特點。

現在再來具體分析屈原文學的各方面。

第一，是採用民間文學的形式並加以發展。這種形式主要表現在句中或句末普遍地用一個「兮」字。這個「兮」字據淸代的音韻學者說，它的古音念「啊」，同我們現代的口語詞一樣。後人稱這種文學體裁爲「騷」體，其實所謂「騷」體並非屈原所創造的。「詩經」及古代的南方民歌早已有之，屈原不過是沿用而已。其次，表現在句法的長短參差上：他不但打破從前那種方塊式的四言詩形式，而且各篇的形式上也不盡相同，甚至一篇之中前後也不同。例如「離騷」、「懷沙」、「橘頌」、「招魂」等篇，固然形式各異，而「懷沙」的前後和「招魂」的首尾與中間的句法也截然不同，可見屈原不但採用了民間文學形式，而且不斷地加以發展和變化。

第二，是大量採用楚國的方言。方言是活在人民口頭上的語言。據現在可考的，其中如「羌」、「謇」、「紛」、「憑」、「修」、「扈」、「遺」、「咍」、「須」、「潭」、「瀛」、「軑」、「泭」、「敦」、「箏」、「嬋媛」、「侘傺」等詞，已經前人指出並證明確爲古代楚國人的口語。而「招魂」一篇一連串用了一百一十四個「些」字（脫簡及異文不計），也證明是楚國舊俗巫師執行禁咒時的口語，所以讀起來就特別生動。我想在當時當地必然會更受歡迎。

第三，是大量吸收神話和傳說。神話和傳說是民間的口頭創作。屈原作品中曾把它們大量地吸收進來，作爲文學資料。例如（一）女岐無夫而生九子。（二）共工氏與顓頊戰敗，頭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使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三）鯀死化爲黃熊（熊，三足鼈），入於羽淵。（四）禹塡洪水，又使應龍以尾畫地開河。（五）啓母塗山氏化爲石而生啓。（六）啓上天偷了上帝「九辯」「九歌」的樂舞。（七）羿射十個太陽，射落了九個。（八）簡

狄吞燕卵而生契。（九）后稷被棄於寒冰之上，鳥用翼來掩護他。（十）伊尹生於空桑。以上都見於「天問」。而玄鳥生商的神話又見於「離騷」及「思美人」。這就使得它們的內容更豐富、更生動。

第四，是描寫楚國的地方風俗。「九歌」本是楚國民間祭神的歌曲，屈原把它修改得非常美妙。其間靈巫偃蹇，五音繁會，儼然是逼眞的地方歌舞戲在極熱鬧極生動的氣氛中表演着。又如「離騷」提到占卦的情形，有「索藑茅與筳篿」的話。藑茅是一種靈草，筳篿是竹栖筊。結草判竹擲地，視其俯仰，以卜吉凶，本是楚國民間的風俗。這種風俗過去在南方各地還普遍得很。至於「離騷」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陽招魂，也都是楚國民俗的反映。

第五，是故事性特別强。「離騷」雖然是抒情詩，但故事性很强。一開始它就用傳記的體裁來叙述自己的世系、祖考、生辰和名字，接着就叙述自己的性格、才能、志願和遭遇。然後假設女嬃責罵、靈氛占卦、巫咸降神三大段對話的形式來充實故事的內容。在女嬃罵他之後，又幻想就重華去陳詞，而繼之以叩閽求女，這是「離騷」中最熱鬧的一段，也是故事性發展到最高峯的時候。其後屈原聽了靈氛的勸告，離開祖國了：他便駕着飛龍，轉道崑崙山，發天津，至西極，經過流沙赤水，最後路過不周山，想到西海去。他忽然在空中看見祖國，終於捨不得走，偉大的「離騷」也就這樣地結束了。這種饒有故事性的寫法，也是從民間文學中出來的。

第六，是想像力非常豐富。例如「離騷」在陳詞重華之後，幻想上叩天閽，駕雲乘龍，御日驅月，飛廉雷師供其奔走；飄風雲霓都來歡迎。及天門不開，乃濟白水，登閬風，遊春宮，求宓妃，在天上再兜一個圈子才下來。眞是設想新奇，得未曾有。而「招魂」一篇描寫四方上下許多可怕的事物，如長人千仞，雄虺九首，赤蟻若象，玄蜂若壺（瓠），豺狼縱目，土伯九約等，更是富於想像。如果我們認識到屈原的文學資料多半淵源於民間神話，那就不難理解了。

以上只是舉出幾點最重要的來講，這些特點都充分地反映了屈原文學的人民性。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屈原是我們民族的熱愛祖國 熱愛人民的偉大詩人。屈原的文學在我國文學史上起了極大的影響，而這個影響我們肯定它是好的。屈原的文學有豐富的生活內容，現實性和鬥爭性都非常的强，又有豐富的人民意識和大量的民間文學的資料以及通俗的爲人民所愛好的民間文學形式，因此它的人民性也就特別强。我國古典文學向來是「風」「騷」並稱，「風」是「國風」，代表「詩經」，「騷」是「離騷」，代表「楚辭」，它們在上述各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我們常說，我國的文學具有優良的傳統。究竟是傳什麼統呢？具體地說，就是傳「風」「騷」的統，也就是傳「詩經」、「楚辭」之統。更確切地說，就是傳人民文學的統，或者傳接近人民、富有人民性的文學的統。自從屈原遺留下來的許多偉大的作品以後，二千多年來，多少文人沒有不愛好的，沒有不受其影響的。他們不斷地模仿其體裁和作風，特別是他的愛祖國愛人民的思想和熱情，如杜甫、白居易、陸游等很多詩人都非常嚮往他，崇拜他，所以他們的成就也就特別大。其餘多少作家，有形無形，直接間接，對文學有所貢獻，也就是文學上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的繼續和發揚，都是與「風」「騷」這兩股古典文學的源泉分不開的，特別是與作爲一個政治鬥士的屈原分不開的。

屈原這樣偉大的詩人，是值得我們全國人民永遠崇敬永遠紀念的。我們爲着祖國有了這樣一個偉大的詩人而感到驕傲。

訂正

本刊四月號第四十四頁上欄第四行「三十億元」應爲「三十萬億元」。

又，五月號第三十六頁上欄第十六行「蘇聯在一九一三年的播種面積……」至第十八行「……增加爲八十億普特」一段，應改爲「蘇聯在一九一三年的總播種面積爲一億零五百萬公頃，穀物播種面積爲九千四百四十萬公頃，一九五二年比一九一三年總播種面積增加百分之四十，穀物播種面積增加百分之五；同期的穀物產量由五十億普特增加爲八十億普特，其他作物產量增加更多。」同頁上欄第二十五行「一切以『人口過剩』的資本主義辯護……」中「的」字應改「爲」字。第三十七頁下欄第二十行「按走『組織起來』的道路逐步前進」中「走」字應改爲「照」字。

又，五月號第五十三頁下欄第十四行「國濟核算制」應爲「經濟核算制」。

馬克思論第二次鴉片戰爭（下）

馬克思

第三篇：「毒麵包案」

一八五七年六月二日「紐約每日論壇報」載㈠

巴麥尊子爵提交國會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文件裏，我們找到摘錄若干我們的伯駕博士㈡和葉大臣之間的往來照會，據此，我們必須說，我們的博士似乎不太高明。博士致函葉大臣指責香港麵包放毒㈢的事情時，葉大臣的答覆如下：

「本月二日本大臣接獲貴公使上月十六日照會，玆悉內稱：據自香港前往澳門之貴國領事向貴公使面稱，二、三日前，香港若干華民將毒藥滲入麵包以供公衆食用，並未分別欲害何國之人，凡食者皆罹重病，存亡莫卜。

「本大臣閱悉此情，殊深駭異。査貴我兩國之人，素稱和睦，中外通商，向來亦和平交易；獨英吉利人數月以來，極爲蠻橫，稱兵啓釁，迭次轟擊市廛民居，毀屋無算，甚有全家化爲灰燼者。華民之頓增其仇英之心者自不乏其人，惟密謀毒害，亦屬可憎。今各事旣出於香港，本大臣無從査其究竟。起事之道，皆由於英人對華民爲害無窮，故左近之人出此以報復彼等私怨耳。

「貴國之人，從未加害華民，自無損及彼此和睦之事。貴公使義當發佈忠言，告誡貴國之人各安生業，華民永將以禮相待必無疑義。何事足使華民起心暗害貴國之人乎？貴公使可深長思之也。須至照覆者，並頌永好。」

再沒有比我們標劃出來的這個建議更好的說法了，這就是說，伯駕博士和他的國人最好還是當心他們自己的事情，不要混到英國人所掀起的那場吵鬧裏面去。

可是伯駕博士對於這片忠言並不合意，却必得致函葉大臣替他自己和美國當局之站到英國人一邊去的事情作辯護。下文就是從伯駕的這樣一封信裏摘錄下來的：

「如果讓本公使來判斷這場糾紛的誰是誰非，則本公使願問，當發生嚴重糾紛的時機，如果兩國政府高級官員親自相見，按照事理正義解決問題，從而防止財產的大規模破壞與流血慘劇，豈非正道。要知此等破壞慘劇實由於貴大臣計不出此所造成的。前些年廣州進城問題的交涉，外間曾有所聞，趁此機會，本公使也願聞知此次交涉中，貴大臣關於此事的陳說，眞情如何。本公使長期駐華，據悉貴大臣所稱和事實是大有出入的。

「本着眞誠友好的精神，本公使可向貴大臣表示如下的信念：中外之間，一切困難的根源，在於中國不願意承認英、法、美、以及其他西方大國和自己有平等地位，是自己眞正的朋友，而以平等朋友態度相待。就此種重大問題而論，敝國政府感覺英國人是正確的一方，所以決計和他們合作。」

葉大臣的覆文沒有發表，但我們不能就此假定他會對博士不加反駁。博士比任何人更淸楚地瞭解到，中英之間過去和當前糾紛的眞正根源，並不像他所宣稱的那樣是因爲「中國不願意承認英、法、美、以及其他西方大國和自己有平等的地位」，而過去是，現在還是，因爲中國當局不願意讓他們的人民爲了東印度公司和英、法、美、各國少數不法商人的金錢利益而被鴉片所毒害的原故。鴉片是過去一世紀以內——在這以前中國人全然不知有鴉片共物——由這

㈠「紐約每日論壇報」把馬克思這篇論文當作社論發表，無題。譯者按：編者加標題曰「幾封官方文件」，不能指示內容，故易今題。

㈡ 伯駕博士（Dr. Peter Parker）是美國駐華公使（駐於澳門）。

些「西方大國」的人傳到中國去的一種毒藥，其使用以驚人的速度擴大開來，對於中華帝國的道德、健康、和物質福利立刻發生致命的影響。當中國發現這些「西方大國」在中國的主要生意過去是，現在仍舊是，販賣、並傳播這種毒藥的時候，中國人怎麼可能把這些「西方大國」當作他們「眞正的朋友而以朋友相待」呢？到了這些「大國」聯合中國當局撲滅了這種邪惡的交易，首先證明他們自己是〔中國人的〕「眞正的朋友」的時候，然後再埋怨中國人不願意那樣看待他們，也不算遲呀。

共他中國官員在外交文件的處理上好像也不遜於葉大臣。〔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九日包令爵士向閩浙總督呈遞指責葉總督的文書，並要求轉呈北京朝廷，總督的覆文說：

「來文係用英文書寫，本部堂不悉其內容，無從索解。

「總之，本部堂義當進言，貴我兩國友好多年，今本部堂仍望雙方確遵萬年和約，庶幾彼此自來和睦關係幸賴增強。」

同樣文書又曾遞送另一省的總督，覆文說：

「本部堂樂於聞悉貴大臣之和平宣告，惟設使本部堂將貴大臣因葉大臣之舉措而悍然破壞萬年和約之事上奏，則惟有不利於貴大臣所懸懸自認之和平而已。且也，商務非他，乃對外問題，此事獨葉大臣始有權司理之，是以本部堂更不能以此事上奏。」

下列〔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㈣的上諭，也不表示目前皇帝有意於答應英國人的要求：

「本日已諭葉名琛，如果英夷自爲轉圜，不必疾之已甚。倘仍頑梗如故，勢難遷就議和，復起要求之漸。葉名琛久任粵疆，夷情素所諳熟，諒必能酌度辦理。因思江蘇、浙江、福建、沿海地方，向爲該夷火輪船熟習之路，倘該夷不得逞志於粵東，復向各海口滋擾，亦當預爲之防，著怡良、趙德轍、王懿德、何桂清，密飭所屬地方官吏，如遇夷船駛至，不動聲色，妥爲防範。或來訴粵東搆釁情事，亦着據理折服，俾知無隙可乘，廢然思返，仍不可稍涉張皇，以致民心惶惑。」

㈢ 所有的引文都錄自「皇家海軍廣州行動文書續編，自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八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Fur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Proceedings of H. M. Naval Forces at Canton）一八五七年印行。伯駕博士是由包令爵士扯到本案裏面來的。包令在一八五七年正月把毒麵包案說成是一種陰謀，報告外交部。原來包令家屬和好些中國僕役曾因吃了含有砒霜的麵包而中毒生病，並無死亡。包令向他的朋友保證說，「我們對於殺人放火的事情是不會畏縮的」(見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利物浦郵差報(Liverpool Courier)。他報告外交部說是「謠言講，如果放毒成功，就實行暴動。分析結果……說明有很大量的砒霜，人們以爲毒劑過量，使人很早就嘔吐，因而毒計未能達到目的。」儘管包令拚命誣賴麵包師阿龍，但經過英國人所組織的法庭以「有意放毒殺人」死刑罪審訊了五天之後，阿龍和他的難友還是無罪開釋的(一八五七年四月)。不過，阿龍等被開釋後立刻又被逮捕，囚入監牢，最後還是釋放了。參看「關於在香港囚禁中國人犯與審訊麵包師及其他人等放毒罪的有關文件」（Papers Connected with the Confinement of Chinese Prisoners at Hong Kong and with the trial of a Baker and others on the Charge of Poisoning）。此文件是在本文發表後才由國會印行的，恩格斯在「波斯與中國」那篇通訊裏曾經參考過。

㈣ 譯者註：查下引咸豐上諭原文見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十四，頒諭日期爲咸豐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辛未，相當公元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此處稱十二月二十七日，誤。

第四篇：

英國的政治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四日「紐約每日論壇報」載㈠

馬克思

在國會開幕詞的辯論中，最引起人興味的題目，要算是第三次對華戰爭、對法商約㈡和同意大利的糾紛了。應該了解，中國問題，不僅牽涉到一個國際問題，而且也牽涉到一個極端重要的憲法問題。由巴麥尊子爵的獨斷命令而進行的第二次對華戰爭，起先曾經引起國會對他的內閣不信任，接着就是下院被他強迫解散。而就是在那由他一手包辦所選舉出來的新的下院裏，也從來沒有人要求取消舊下院所通過的決議。一直到現在，巴麥尊子爵的第二次對華戰爭，

還受着一個國會決議案的譴責。然而事情還不止於此。

一八五九年九月十六日，英國接到英軍在白河敗退的消息。巴麥尊子爵，並不召開國會，反而致書路易・普那帕特（Louis Bonaparte），和這個獨裁君王商量派遣一支新的英法遠征軍進攻中國。正如格萊伯爵所說的，在這三個月中，英國的港口和軍械廠中，「充滿了整裝待發的嘈雜聲浪」，同時，更採取各種步驟，從事運送大砲、軍需、和砲艦，並且除去海軍以外，還要再派遣一萬人以上的强大軍力到中國去。如此，這個國家，的確是在着手一個新的戰爭，它一方面和法國簽訂條約，一方面包下來一筆龐大的支出而事先不給國會任何通知，國會在它的聚會上，祇好冷冷清清地「感謝女王陛下把已經發生的事情以及派遣遠征軍到中國的準備工作告訴了他們。」㈡ 路易・拿破侖（Louis Napoleon）本人對待他自已的立法院，或者亞力山大大帝（Emperor Alrexander）對待他的貴族院，又能比巴麥尊子爵對待英國下院的辦法有什麼不同呢？

在一八五七年下院開幕詞的辯論中，現任財政大臣格拉斯登先生談到波斯戰爭的時候，曾經激昂慷慨地說道：「不怕有人反對，我敢說，凡是不首先通過國會就開始戰爭的行爲，和我國的慣例完全不相符合，這種行爲危害憲法，爲了使這樣危險的行爲，永遠不再重演，下院絕對需要加以干涉。」㈣巴麥尊子爵不僅重演了「如此共危害憲法」的行爲，他這次，不僅得到了僞善的格拉斯登先生的同意而重演了一回，並且他好像是在試驗內閣不負責任的勁頭，操縱國會的權力對抗國王，操縱國王的特權對抗國會，同時又操縱二者的特權以對抗人民，——他具有在同一幕戲裏重演這種驚險場面的胆量。他的頭一次對華戰爭遭到國會的反對，他不顧這個反對，又進行另外一次的對華戰爭。而在兩院當中，却只有一個人鼓起了足够的勇氣去反對他這種僭越大權的行動；同時，奇怪的是這一個人並不是下院的平民派，而是貴族派。這個人就是格萊伯爵。他對於女王的開幕詞提出修正，意思是說，在沒有聽取上下兩院的意見以前，不得派遣遠征軍㈤。

執政黨代言人和反對派領袖對待格萊伯爵修正案所採取的態度，標誌着英國代議機關很快地就要碰上一個政治危機。格萊伯爵承認，在形式上，國王享有宣戰權，但是事先不得到國會的批准，內閣不能在任何方面有一文錢的支出，所以，在沒有通知國會，並請求國會對可能負担的費用作出支付的辦法以前，國王的負責代表決不能派遣從事戰爭的遠征軍，這就是憲法與慣例。因此，只要國會認爲適當，它從頭起就可以制止內閣所盤算的任何不公正、不體面的戰爭。爲了說明過去是怎樣嚴格地遵守這些規矩的，格萊伯爵舉了幾個例子：一七九〇年，有幾隻英國船在美國的西北海岸被西班牙人所截奪，皮特（Pitt）曾向兩院致送了國王的咨文，要求國會在負担可能的支出上投信任票。其次，在一八二六年十二月，當西班牙弗丁南七世（Ferdinand VII of Spain），因援助唐・米鳩（Don Miguel）而向葡萄牙進行侵略時，爲了抵抗侵略，唐・白得羅（Don Pedro）的女兒曾向英國請求援助，康尼（Canning）致送了同樣的咨文，把事情的性質和可能負担的費用通知國會。在結尾時，格萊伯爵廣泛地暗示，內閣已經敢於提高稅收而不取得國會的同意，因爲已經臨到頭上的大量支出，總是必須支付的，而除去挪用完全是準備做其他用途的款項而外，也就沒有其他辦法可以開支。

然則，格萊伯爵從內閣方面得到甚麼樣子的回答呢？首先，那位曾經在巴麥尊第二次對華戰爭的合法性上反對得最厲害的紐卡索公爵回答道：「除非爲了達到政黨的某種重大目的，決沒有人對開幕詞提出修正案，」這是近年來已經樹立的「非常美好的慣例」㈥。這樣說來，格萊伯爵的動機不良，他是爲了自已熱中於內閣的位置而去拆現任內閣的台的。就紐卡索公爵的一生看來，觸犯那個「非常美好的慣例」又是甚麼意思呢？他是不是，荒唐怪誕到這樣程度，以至於玄想除去爲了政黨的重大目的而外，他們祇不過是胡吵瞎鬧而已呢？其

㈠ 本篇原爲「紐約每日論壇報」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七日倫敦通訊。

㈡ 指主要由考布登（Cobden）負責簽訂的對法商約。同日「紐約每日論壇報」載有馬克思論述這個商約的文章（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八日發）。

㈢ 引自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四日上院辯論女皇開幕詞時格萊伯爵的修正發言。

㈣ 此係一八五七年二月三日格拉斯登的演說詞，爲格萊伯爵在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四日的辯論中所轉引。重點是馬克思加的。格拉斯登此時任巴麥尊內閣財政大臣。

㈤ 此處係指格萊第三伯爵（一八〇二——一八九四年），他是制定改革法的格萊伯爵的兒子。他在殖民地政策的關鍵時期（一八四六——一八五二年）曾任殖民地大臣，同時是上院中會格黨的領袖，自此以後，他沒有在政府中担任職務，但經常是兩黨政策的獨立批評者。他對於開幕詞的修正案中，對國會不能獲悉派遣遠征軍的準備情況，不能有機會審查這件事的處理是否適當，並批准其所應負担的費用，表示遺憾。他拒絕撤回他的修正案，認爲派遣遠征軍而沒有得到國會的同意，這是第一次。他的提案被否決（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四日）。這個憲法問題以前即已討論過。（參閱「巴麥尊內閣的失敗」及「新的對華戰爭」二文。

㈥ 「泰晤士報」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所載爲「……除非爲了追求達到政黨的某種重大目的。」「國會辯論集（上院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所引則爲「除非希望並且可能達到某些政治上的重要企圖」。

次，巴麥尊子爵一再違反皮特和康尼所亟切遵守的憲法成規，難道不是衆人皆知的事情嗎？那位高貴的子爵不是曾於一八三一年在葡萄牙，一八五〇年在希臘，以及像紐卡公爵所可能補充的，在波斯、在阿富汗，並在其他許多國家中進行過他自己的戰爭的嗎？如果國會在三十年的過程中，一直讓巴麥尊子爵僭越宣戰，構和以及課稅的大權，那末，他們爲甚麼忽然違背他們那長期的卑賤的傳統呢？憲法可能在格萊伯爵這一邊，但是習慣却無疑是在巴麥尊那一邊的。既然他過去類似的「美好的」花樣，從來沒有被譴責過，那末，爲甚麼這一次一定要這位高貴的子爵斤斤計較呢？說實話，紐卡索公爵不去責備格萊伯爵的造反，不去責備他企圖破壞巴麥尊子爵任意處理英國軍事和財政的永世特權，已經是太寬大的了。

紐卡索公爵竭力證明遠征白河是合法的，他的方式也是同樣地別出心裁的。因爲根據一八四三年的中英條約，英國得享受天朝讓予的最惠國的一切權利。現在，俄國在最近與中國簽訂的條約中，規定有航行白河之權。因此，按照一八四三年的條約，英國也得有這種航行權。這一點，紐卡索公爵說，他可以堅持「並不需要任何重要的，特殊的辯護」。實在說起來，他未必可以！一方面，這裏有些尷尬的事情，因爲俄國的條約是在白河慘敗之後才批准，從而才實際存在的。自然，這不過是一個淺顯的顛倒論證罷了。但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一發生戰爭狀態，所有現存條約，都停止發生效力。如果英國在派遣遠征軍到白河的時候，說已經和中國處於戰爭狀態，那末他們自然不能援用一八四三年的條約，也不能援用其他任何條約。

如果那時還沒有存在着戰爭狀態，那末，巴麥尊內閣就是發動一個新的戰爭而沒有得到國會的批准。

爲了躲開這個左右爲難的窘境，可憐的紐卡索，又主張自從砲擊廣州以來，過去兩年中，「英國決沒有和中國處於和平狀態」。因此，政府不是重新發動戰爭，而是繼續進行已經存在的戰爭，所以他可以說無須乎援引只在和平時期才有效的條約來做特別的辯護。可是，內閣首相巴麥尊子爵同時又在下院把這麼一種奇特的辯論法搞得更漂亮，他說在這一段時期中，英國「從來沒有和中國發生過戰爭」。他們現在不是在戰爭。自然，這一段時期中發生過砲擊廣州，白河慘敗，以及英法遠征軍等等事件，但是並沒有發生戰爭，因爲始終沒有宣戰，因爲，一直到此時，中國的皇帝還允許他們照常在上海做生意。正是這個，對中國人說來，乃是巴麥尊破壞戰爭的國際合法形式的事實，又被他自己拿來作爲，對國會說來，是忽視了憲法形式的辯護理由，而他在上院的代言人格蘭維里伯爵索性帶着輕蔑的神氣宣告說：對於中國說來，「政府咨詢國會的意見」，乃是「純粹技術問題」。政府咨詢國會的意見，乃是一個純技術問題！

然則，英國的國會和法國的立法院之間，還存在着甚麼區別呢？在法國，至少是一個假定其爲民族英雄的後裔的人，他才敢於把自己當作國家，同時公開承担這樣越權獨斷的一切危險。而在英國則是所謂內閣裏的那麼幾個二流的代言人，幾個聲名狼籍的官迷，幾個無名的廢物蛋，竟至於利用國會的軟弱，倚仗一個無名報紙的胡言亂語，一聲不響的，毫無危險地，偷偷地竊得了不負責的權力。如果你想知道法國皇帝的僭權獨斷和英國內閣的僭權獨斷有何區別，只須一方面拿一個獨裁者所引起的騷動，另一方面拿股份銀行的經理，慈善會的秘書、或是教區牧師這些人的欺詐撞騙，生意經式的權術來比一比就會明白了。

達布伯爵充分認識到兩方面在保持內閣的無能與不負責任上得到同等的利益，自然，「不能够同意高貴的格萊伯爵對於政府的失職所發表的强烈意見」。他不十分同意格萊伯爵的控訴，認爲「政府應該召集國會，徵詢中國問題上的意見」，因而，「如果格萊要求表決修正案的話，他一定不會投票支持他」。

因此，這個修正案並沒有表決，而兩院在中國問題上的整個辯論，也就在兩方對於那位如此其光榮地把英國海軍葬身在白河的污泥裏去的賀布海軍上將（Admiral Hope）的稀奇的問候聲中，煙消雲散了。

（嚴中平　汪敬虞譯　向　達校）

我國紀念馬克思誕生一百三十五周年

五月五日我國首都北京和中國共產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所在的大城市都隆重舉行紀念卡爾•馬克思一百三十五周年誕辰的各項活動。

北京圖書館舉辦的紀念卡爾•馬克思誕生一百三十五周年展覽會，在五日下午正式開幕。展覽會上精選展出書籍六百八十四册、包括馬、恩經典著述的中、俄、波、捷、羅、匈、保、朝鮮、越南、英、法、德、日等十餘國文字的譯本；圖片二百六十七張；世界各國紀念馬克思的報紙十八份；圖表十六幅。此外，另有珍貴實物，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馬克思木刻畫、印有馬克思像的鈔票等以及馬克思彫塑、馬、恩畫像等藝術品多件。

黨內危機和我們的任務

斯大林

誰都知道，我們黨正遭遇深重的危機。黨員的退黨，組織縮小並且軟弱，各個組織彼此隔離，沒有統一的黨的工作；這一切都說明黨病了，黨正遭遇嚴重的危機。

第一件特別使黨苦惱的事，是黨的組織和廣大羣衆脫節。有一個時期，我們各地的組織都有幾千個黨員，領導幾十萬羣衆。那時黨在羣衆中有牢固的根基。現在却不同了。各地組織中剩下的已不是幾千人，而是幾十人，最多也不過幾百人。至於領導幾十萬羣衆，那就更談不上了。固然，我們黨在思想上對羣衆有廣泛的的影響，羣衆認識黨，羣衆尊重黨。這就是「革命後」的黨和「革命前」的黨第一個不同的地方。但是黨的全部影響實在也僅限於此。單有思想上的影響，還是非常不够的。問題在於：組織上的鞏固性很差，限制了思想影響的擴大，——我們的組織和廣大羣衆脫節的根源就在這裏。只要指出彼得堡的情況，就立刻可以了解危機的全部嚴重性：那裏在一九〇七年約有八千黨員，而現在連三、四百人都難湊足了。至於遭遇同樣危機的莫斯科、烏拉爾、波蘭、頓巴斯以及其他地方，那就更不用說了。

但是還不止此。黨的病不僅在於和羣衆脫節，而且還在於黨的各個組織彼此毫無聯系，不是過着統一的黨的生活，而是彼此隔離。彼得堡不知道高加索在做什麼，高加索不知道烏拉爾在做什麼，如此等等，每一個地方過着自己的獨特的生活。嚴格地說，過着共同生活的統一的黨，也就是我們大家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引以自豪的那個黨，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我們正處在最不成樣子的手工業方式的狀態中。現在國外出版的機關報，一方面是「無產者報」和「呼聲報」，另一方面是「社會民主黨人報」，都沒有並且也不能把分散在俄國各地的組織聯系起來，不能使它們過統一的黨的生活。如果以爲遠離俄國現實的國外機關報，能把早已經過小組活動階段的黨的工作連成一氣，那就太奇怪了。誠然，在各個彼此隔離的組織之間有許多共同的、從思想上把它們聯系起來的東西，——它們有一個經過革命考驗的共同綱領，有經過革命認可的共同的實際工作原則，有光榮的革命傳統。這正是「革命後」的黨和「革命前」的黨的第二個重要區別。但這還不够。問題在於：黨的組織在思想上的統一，還遠不能把黨從組織渙散和彼此隔離的境地中拯救出來。只要指出一點就够了：甚至黨內簡單的書信往來也沒有達到多少令人滿意的程度。至於把黨眞正聯系成一個統一的機體，那就更談不上了。

總之，（一）黨和廣大羣衆脫節，（二）黨組織彼此隔離，這就是黨目前所遭遇的危機的實質。

不難了解，革命本身的危機，反革命的暫時勝利，發動失敗後的沉寂以及黨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兩年所享有的點滴自由的完全喪失，都是造成這一切現象的原因。在革命向前推進的時候，在有自由的時候，黨發展了，擴大了，鞏固了。革命退却了，自由沒有了，黨就開始衰弱下來。起初是知識分子脫黨，隨後，一些最動搖的工人也脫黨了。黨的成長，特別是先進工人的成長，也是加速知識分子脫黨的原因之一；因爲先進工人的複雜要求超過了「一九〇五年知識分子」貧乏的知識水平。

當然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在將來的自由來到以前，黨應當在危機中苟延殘喘，像某些人所錯誤設想的那樣。要知道，第一、自由本身的到來多半取決於黨是否能擺脫危機而以健壯的、新生的姿態出現，自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要爭得自由，也要靠組織得很好的工人政黨。第二、盡人皆知的階級鬥爭的規律告訴我們，資產階級的組織性日益加强，必然會使無產階級的組織性相應地加强起來。而誰都知道，先行革新我們的黨——唯一的工人政黨，是我們無產階級這個階級的組織性增强的必要條件。

因此，在自由來臨以前，使黨健全，使黨擺脫危機，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不可免的。

整個問題在於：要找出使黨健全的辦法，要開闢黨賴以（一）聯系羣衆、（二）把彼此隔離的各個組織結成統一機體的途徑。

* * *

那末，我們黨怎樣才能擺脫危機，爲此須要採取什麼辦法呢？

有些人對我們說，盡量使黨成爲公開的黨，並把它團結在公開的杜馬黨團周圍。但是連最無關緊要的文化團體之類的公開機構都受到殘酷的迫害，那又怎樣盡量使黨成爲公開的黨呢？難道能放棄黨的革命要求嗎？然而，這樣就是葬送黨，而不是革新黨！此外，既然杜馬黨團本身不僅是和羣衆脫節，而且是

和黨組織脫節的，它又怎能把黨和羣衆聯系起來呢？

很明顯，這樣解決問題，反把問題弄得更混亂，使黨更難擺脫危機。

另外一些人對我們說，盡量把黨的職責交給工人，以便使黨擺脫不堅定的知識分子。毫無疑問，使黨擺脫不需要的客人，而把職責集中在工人自己手中，這對於黨的革新工作一定會大有幫助。然而同樣很明顯：僅僅「轉交職責」，但是又保存舊的組織系統，使用老一套的黨的工作方法，從國外來進行「領導」，那是不能把黨和羣衆聯系起來，不能把黨結成一個統一的整體的。

顯然，用治標的辦法是做不出什麼大事的，必須找到根本辦法來根本醫治黨的病。

黨的病首先是和羣衆脫節，所以無論如何要使黨聯系這些羣衆。但是，在我們目前的條件下，只有首先和主要地注意那些特別使廣大羣衆關心的問題，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就拿羣衆日益貧困的事實和資本家的進攻來說吧。大規模的歇業已像風暴似的從工人頭上掠過，而縮減生產、任意解僱工人、減少工資、延長工作日，——總之，資本家的進攻，至今還在繼續着。很難想像，這一切使工人多麼痛苦，多麼焦急，工人和廠主間發生了多少「誤會」和衝突，工人頭腦中因此出現了多少值得注意的問題。我們的組織除進行一般的政治工作外，要不倦地參與這一切小衝突，要把這些小衝突同偉大的階級鬥爭聯系起來，要支持羣衆日常的抗議和要求，用活生生的事實來表明我們黨的偉大原則。誰都應當明白，只有這樣才能使「逼得走投無路」的羣衆動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使他們「脫離」可詛咒的停滯狀態。而使他們「脫離」這種狀態，也正是把他們團結在我們組織的周圍。

工廠黨委會就是能在羣衆中最有成效地開展這一工作的黨的機關。參加工廠黨委會的先進工人，就是能把自己周圍的羣衆團結在黨的周圍的活躍分子。只是工廠黨委會必須不倦地參與工人的一切鬥爭，保衛他們的日常利益，並且把這些日常利益和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聯系起來，使工廠黨委會成爲黨的主要堡壘，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其次，爲了接近羣衆，也必須把黨的其他更高級的組織建立得不僅適合於保衛羣衆的政治利益，而且適合於保衛羣衆的經濟利益。黨組織必須不忽略任何一個多少有些重要性的生產部門。爲此就必須在建立組織時，除按照地區的原則外，還要採用按照生產部門的原則，例如把各種不同生產部門的工廠黨委會按照生產部門分別組成各個不同的分區，再按照地區把這些分區聯合爲區等等。如果分區的數目增加得太多，那也沒有什麼不好，相反的，黨組織卻能獲得堅固的基礎，和羣衆更密切地聯系起來。

黨組織的成份在解決危機方面具有更大的意義。必須讓最有經驗、最有威望的先進工人到各個地方組織中去工作，使地方組織的工作集中在他們堅强的手中，使他們（正是他們）在組織中佔最重要的職位（從實際工作和組織工作直到文字工作）。如果居於重要職位的工人經驗不足，修養不够，即使最初還常跌交，也不要緊，實際工作和較有經驗的同志們的指點，會擴大他們的眼界，終究會把他們培養成眞正的著作家和運動的領袖。不要忘記，倍倍爾這樣的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是在工作過程中、在實踐中鍛鍊出來的，而目前我們的運動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俄國的倍倍爾，需要工人出身的、有經驗的、堅定的領袖。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在組織工作方面的口號應當是：「給先進分子更廣闊的道路參加黨的各部門工作」，「給他們更廣大的活動範圍」！

當然不言而喻，先進分子除了要有作領導工作的願望和主動性以外，還要有豐富的學識，而我國有學識的工人是很少的。這裏也就正用得着有經驗而又積極的知識分子的幫助。必須建立一些高級的小組，即先進分子的「學習討論會」，——即使一個區建立一個也好，必須有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這一切大可彌補先進分子的缺陷，把他們培養成未來的演講人和思想領導者。同時，先進分子必須在他們的工廠裏經常做報告「盡量實習」，不要因爲怕在聽衆面前「丢臉」而裹足不前。要永遠拋棄過分的謙虛和在聽衆面前的恐懼，要大胆勇敢，相信自己的力量：即使在開始時失敗了，跌了一兩交，也不要緊，因爲跌一兩個交你就會像「基督履海」似的行走自如了。

總之，（一）根據那些和無產階級總的階級需要有關的日常需要的，進行宣傳；（二）組織和鞏固工廠黨委會，作爲黨在各區中的最重要的據點；（三）把黨的最重要的職責「交給」先進分子；（四）組織先進分子的「學習討論會」——這就是我們的組織能够把廣大羣衆團結在自己周圍的辦法。

不能不指出，解決黨內危機的上述辦法是實際生活本身規定出來的。中央區和烏拉爾早已不依靠知識分子，在那裏由工人自己處理黨組織的工作。在索爾莫夫、魯干斯克(在頓巴斯)、尼古拉也夫，工人在一九〇八年印發了傳單；在尼古拉也夫，除傳單外，還出版了秘密的機關報。而巴庫的組織，過去和現在都不斷地參與工人的一切鬥爭，過去和現在幾乎沒有放過工人和石油業主的任何一次衝突，當然，同時還進行一般的政治鼓動。這也就是爲什麼巴庫的組織直到現在還和羣衆保持着聯系的原因之一。

關於黨聯系廣大工人羣衆的方法問題就是這樣。

但是黨的病不僅在於黨和羣衆脫節，而且還在於黨組織彼此隔離。

現在我們就來談談後一個問題。

究竟怎樣把彼此隔離的各個地方組織聯系起來？怎樣把它們集合成一個有聯系的、過着統一生活的黨呢？

也許可以認爲，有時舉行的全黨代表會議就能解決這一任務，就能把各地組織聯合起來。或者在國外出版的「無產者報」、「呼聲報」和「社會民主黨人報」，終究會把黨的組織集合起來，團結起來。毫無疑問，無論前者或後者對於聯系各地組織都有不小的作用。至少到目前爲止，代表會議和在國外出版的機關報還是聯合彼此隔離的組織的唯一手段。但是，第一、代表會議，何況是很難得舉行的代表會議，只能暫時把各地組織連成一氣，因而這樣的聯系不像所需要的那樣牢固。一般說來，在代表會議閉會期間，這種聯系便斷了。實際上還是繼續用手工業方式進行工作。第二、至於在國外出版的機關報（且撇開它們運到國內的數量極其有限這點不談），它們也自然落後於俄國的黨的生活，不能及時覺察到和接觸到工人深切關心的問題，因而也就不能把我們的地方組織牢固地連在一起。事實證明：自倫敦代表大會以來，黨雖能召開過兩次代表會議（十六），在國外出版了幾十期機關報，但是把我們的組織聯結成一個眞正的黨的事業，解決危機的事業，還只是勉勉强强進展了一點。

因此，代表會議和在國外出版的機關報，對於黨內的聯系，雖然是極其重要的，但是對於解決危機，對於牢固地把地方組織聯合起來，却是不够的。

顯然，需要治本的辦法。

只有辦一個俄國全國性的報紙，即成爲聯系黨的各種工作的中心並在俄國出版的報紙才是治本的辦法。

只有在共同的黨的工作中，才能把分散在俄國各地的組織聯合起來。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中心來綜合地方組織的經驗，然後再把已經概括起來的黨的經驗推廣到一切地方組織去，那就不可能有共同的工作。全國性的報紙就可能成爲這樣的中心，即領導黨的工作、統一和指導黨的工作的中心。但是這個報紙爲了能眞正領導工作，就必須使各地把各種請求、聲明書、信件、通訊、控訴、抗議、工作計劃、羣衆所深切關心的問題等等源源不斷地寄給它，使這個報紙和各地保持最密切最牢固的聯系，從而使這個報紙擁有足够的材料，能及時覺察到、接觸到以及闡明必要的問題，根據這些材料作出必要的指示，提出必要的口號，並使這些指示和口號成爲全黨和一切組織的武器……

沒有這樣的條件，就不能領導黨的工作；不去領導黨的工作，就不能把各地組織牢固地團結成一個整體！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着重指出我們需要的正是全國性的（而不是在國外出版的）報紙、正是起領導作用的（而不僅僅是很風行的）報紙。

不用說，能負責創辦這種報紙的唯一機關，就是黨的中央委員會。領導黨的工作這一任務本來就是中央委員會的責任。但是這個任務現在執行得不好，結果地方組織幾乎完全陷於分離狀態。然而辦得很好的全國性的報紙，能够成爲中央用來眞正團結黨和領導黨的工作的最有效的工具。而且我們可以斷言，只有用這種辦法，才能使中央從有名無實的核心變爲名副其實的、全黨的核心，變爲眞正把黨連成一氣並眞正在黨的工作中起領導作用的核心。因此，創辦和領導全國性的報紙，是中央委員會直接的任務。

總之，創辦全國性的報紙作爲一個能把全黨聯合和團結在中央委員會周圍的機關報，這就是我們的任務，這就是解決黨所遭遇的危機的辦法。

現在把上面所說的總結一下。由於革命的危機，黨內也發生了危機——黨組織失掉了和羣衆的牢固聯系，黨分離成一些單獨的組織。

必須使我們的組織和廣大羣衆聯系起來，這是地方的任務。

必須使上述各組織在黨中央委員會的周圍彼此聯系起來，這是中央的任務。

爲了解決地方的任務，除在進行一般的政治鼓動外，必須根據迫切的日常需要來進行經濟上的鼓動，經常參與工人的鬥爭，建立和鞏固工廠黨委會，把黨的職責盡可能集中在先進工人的手中，組織先進分子的「學習討論會」來培養堅定而有學識的工人領袖。

爲了解決中央的任務，就必須創辦一個能把地方組織和黨的中央委員會聯系起來並且把它們團結成一個整體的全國性的報紙。

只有解決了這兩個任務，黨才能擺脫危機而以健壯的、新生的姿態出現，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黨才能担負起英勇的俄國無產階級的名副其實的先鋒隊這一重大使命。

解決黨內危機的辦法就是這樣。

不用說，黨愈能充分利用它周圍的各種公開機會——從杜馬講壇和工會直到合作社和喪葬基金會，就愈能迅速地完成解決危機的任務，完成革新和健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任務。

載於一九〇九年八月一日和二十七日

「巴庫無產者報」

第六和第七期

本文沒有署名

按報上原文刊印

（譯自「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一四六至一五八頁）

馬列主義基礎參攷資料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國民經濟計劃化

我們偉大的祖國已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爲了從理論上幫助大家來認識國民經濟計劃化，我們特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中，初步地把有關論述這個問題的重要部分，輯錄出來，供經濟工作者和一般讀者的參考。

——編者

一 論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的客觀法則

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有計劃經濟

在資本主義生產內，一切都不依社會計劃來行，一切都視個別資本家的境遇資金等等而定，這等等，都有無限的差別。由此發生的，是生產力的莫大的浪費。（馬克思：「資本論」，郭大力、王亞南譯，三聯書店版，第二卷，第一二六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發於單個商品生產者所組成的社會內，這些生產者，是用交換他們生產品的方法來發生聯繫的。但是每個根據於商品生產之上的社會，都有這樣的特點，就是：在它內面，生產者喪失了統御自己社會關係的權力。每個人用其偶然歸於自己支配之下的生產手段，爲自己而生產，並用來滿足自己個人的交換的需要。誰也不知道，他所生產的那種產品，要有多少數量供給於市上，不知道他能够找到多少數量的消費者；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生產品，究竟是否爲人所需要，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抵償成本，不知道，一般的是否能够賣去他的產品。在社會的生產中，支配着無政府狀態。（恩格斯：「反杜林論」，吳黎平譯，三聯書店版，第三四九頁）

無產階級政權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整架大機器

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就在於當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時，已有資本主義關係底現成形式，而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政權，却得不到這種現成關係，不過是有資本主義那些最發展的形式，而資本主義那些最發展的形式，實際上又祇包括一小部分工業上層，却還極少觸及農業。組織統計，監督各巨大企業，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爲一整架大機器，變成爲一個使幾萬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動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擺在我們肩上的偉大組織任務。（列寧：「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報告」，「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三四八頁）

進行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勝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

危機，失業，浪費和大衆貧困，這就是資本主義無可醫治的病症。而我們的制度却不患這種毛病，因爲政權是握在我們手裏，握在工人階級手裏，因爲我們進行着計劃經濟，有計劃地積累資源，並按國民經濟各部門來加以正確分配。我們不患資本主義所患的那種無可醫治的病症。這就是我們和資本主義不同的地方，這就是我們優勝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而這種優勝處是有決定一切的意義的。（斯大林：「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四三九頁）

不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原則就不能建立計劃經濟

什麼是計劃經濟呢，它有一些什麼特徵呢？計劃經濟是力求消滅失業現象。我們且假定：在保存資本主義制度方面可以做到把失業現象減少到某種最

低限度。但是不論哪一個資本家從來不會而且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完全消滅失業現象，消滅失業後備軍，因爲失業後備軍底使命就是壓制勞動市場，保證工資低廉的勞動人手。您看，這已經是資產階級社會「計劃經濟」中的一個破綻。其次，計劃經濟是以加强其生產品爲人民羣衆所特別需要的工業部門底生產爲前提。可是您知道，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底擴大是依據完全不同的動機來進行的，哪一個經濟部門底利潤率最大，資本就奔向哪一個經濟部門。您決不能迫使資本家讓自己遭受損失，同意較低的利潤率，以便滿足人民的需要。如果不從資本家下面解放出來，如果不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原則，那末您就不能建立計劃經濟。（斯大林：「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人民出版社版，第三頁）

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的客觀規律性

若我們設想一個非資本主義的社會，那就是設想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我們的問題，將還原得非常單純：即，社會必須事先計算，須以多少勞動，多少生產手段，多少生活資料，用在某種事業上，方能運用無害。（馬克思：「資本論」，郭大力、王亞南譯，三聯書店版，第二卷，第二四八頁）

社會的力量，在未被我們認識及處理以前，正是和自然的力量一樣，發生着盲目的强制的破壞的作用。可是我們一經認識了它，理解了它的活動、它的方向及它的影響，那時就靠着我們來使它更多地服從我們的意志，運用它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點特別可以適用於現在强大的生產力。……正如雷雨時所發電光的破壞力與電報上弧光燈上所順馴地運行着的電力二者中間的區別一樣，也正如火災時的火與供人應用的火二者中間的區別一樣。當我們最後認識了這些生產力的本性，並按照這一本性來處置這些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就要爲社會的有計劃的生產所代替，這種生產，是以滿足全社會及各個人的需要爲根據的。（恩格斯：「反杜林論」，吳黎平譯，三聯書店版，第三六〇—三六一頁）

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是作爲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法則的對立物而產生的。它是當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法則失去效力以後，在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基礎上產生的。它之所以發生了作用，是因爲只有在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經濟法則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才能進行。（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六頁）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基礎

人們有時援引美國和德國那裏的經濟機關，彷彿那些機關也是按計劃原則領導國民經濟的。同志們，決不是，那裏還沒有達到這點，並且當那裏還有資本主義制度存在時是始終不能達到這點的。爲要按計劃原則來領導，就要具備另一種即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的工業體系，就至少要具備收歸國有的工業、收歸國有的信貸系統、收歸國有的土地、城鄉間的社會主義結合，工人階級掌握的國家政權等等。（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莫斯科中文版，第六〇頁）

二　論國民經濟計劃化是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法則的反映

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是通過國民經濟計劃化來實現的

不能把我們的各個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跟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按比例發展的客觀經濟法則混爲一談。……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使我們的計劃機關有可能去正確地計劃社會生產。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現實混爲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要把這種可能變爲現實，就必須研究這個經濟法則，必須掌握它，必須學會以完備的知識去應用它，必須制定出能完全反映這個法則的要求的計劃。不能說，我們的各個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都完全反映出這個經濟法則的要求。（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七頁）

國民經濟計劃化應服從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法則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要求

有人說，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是國民經濟有計劃的、按比例的發展的法則。這是不對的。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也就是說，多少眞實地反映這一法則的國民經濟計劃化，如果不知道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是爲着什麼任務而進行，或者任務不明確，那它本身是不能提供出什麼來的。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只是在具有國民經濟的計劃發展所要實現的任務時，才能產生應有的效果。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本身並不能提供這個任務。國民經濟計劃化尤其不能提供這個任務。這個任務是包含在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中，即表現於這一法則的上述要求內。因此，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的作用，只是在它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爲依據時，才能充分發揮起來。

至於說到國民經濟的計劃化，那末，它只有遵守下列兩個條件時，才能得到良好的結果，這兩個條件是：（甲）它正確地反映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

則的要求，（乙）它在各方面適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要求。（斯大林，前引書，第三六頁）

三　論國民經濟計劃的擬訂

擬訂國民經濟計劃應以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爲依據

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這些基本原理，類如關於社會生產之分爲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的原理；關於在擴大再生產下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佔優先地位的原理；關於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之間的對比關係的原理；關於剩餘產品是積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關於社會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關於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唯一源泉的原理，——所有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這一切基本原理，不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在計劃國民經濟時，不運用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斯大林，前引書，第七二—七三頁）

沒有明確的目標就不能領導社會主義建設

如果我們不知道要向那裏前進，不知道行動的目標，我們就不能够向前邁進。如果我們對着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和我們能够建設完成它，缺乏遠景，缺乏信心，我們就不能够進行建設。沒有明確的遠景，沒有明確的目標，黨就不能領導建設。（「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二七九頁）

編製國民經濟計劃應從掌握經濟發展的基本環節開始

可是，爲要實行這種偉大計劃（編者按：指第一個五年計劃），決不可茫無頭緒，隨便動手來作。爲要實行這種計劃，首先就要找到計劃中的基本環節，因爲只有找到並抓住這個基本環節以後，才可把這計劃其他一切環節拖出來。

五年計劃底基本環節是什麽呢？

五年計劃底基本環節，就是重工業和它的核心，即機器製造業。因爲只有重工業，才能把全部工業、運輸業以及農業都改造過來，振興起來。因此，也就必須從重工業來着手實行五年計劃。所以也就必須把恢復重工業當作實現五年計劃的基礎。（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四九七頁）

國民經濟計劃應具有統一性

所有各個生產部門的計劃，必須嚴格一致，互相關聯；共同構成一個我們

如此迫切需要的統一的經濟計劃。（列寧：「在第八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〇頁）

必須研究國民經濟對照表的編製格式問題

還必須提出普遍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論的問題。必須研究我國國民經濟對照表編製格式問題。……蘇聯國民經濟對照表格式，應當由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製定出來，如果他們一般願意仔細研究過渡時期各經濟問題的話。如果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指定一部分專門工作人員，根據過渡時期經濟問題的新提法來專門研究這些問題，那就很好了。（斯大林：「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四〇〇頁）

任何計劃工作都不能離開正確的核算

同志們，任何建設工作，任何國家工作，任何計劃工作，沒有正確的核算都是不可想像的。而沒有統計，則核算也是不可想像的。核算離開統計就一步也不能前進。（「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二一四頁）

要擬製全國電氣化的計劃

社會主義底唯一物質基礎，就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的大機器工業。但問題還不能局限於這個一般的原理。必須把這個原理加以具體化。所謂適合於最新技術水準並能改造農業的大工業，也就是全國電氣化。擬製全蘇俄電氣化計劃這一科學工作，我們本來是應當做的，而且我們也已經把它做到了。（「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第八八七頁）

擬訂計劃要從實際出發，反對製訂空想的大計劃

必須使我們的工業計劃不是按官僚主義虛構的辦法製定的，而要與我們國民經濟的情況、與我們資源、後備力量底精確核計密切聯繫起來。不能在工業建設之計劃上落後於工業底發展。但也不能跑向前去，脫離我國的農業，不顧我國的積累速度。（斯大林：「論蘇聯經濟形勢與黨底政策」，「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解放社版，下冊，第六四頁）

計劃應以先進的技術定額爲依據

如果我們那些遠遠落到了斯達漢諾夫運動後面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經濟工作人員翻然悔悟，不再去繼續拘守舊技術定額，而是認眞來改變態度，用科學精神，用新的斯達漢諾夫的精神來改變態度，那就會很好了。……沒有技術定額，便無法進行計劃經濟。除此而外，其所以需要技術定額，是爲了督促落後

羣衆來趕上先進分子。技術定額是一種巨大的調節力量，它能在生產中把廣泛工人羣衆組織在工人階級先進分子周圍。所以，我們需要有技術定額，但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現行的定額，而是較高的定額。（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六六四—六六五頁）

四　論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和完成

社會主義的計劃是指令性的計劃

我們的計劃不是預料式的計劃，不是猜測式的計劃，而是指令性的計劃，這種計劃是各個領導機關必須遵照執行，因而能決定我們經濟在全國範圍內將來發展方向的。（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莫斯科中文版，第六〇頁）

反對空談計劃，而要以切實的態度來對待計劃

當然，關於「計劃」這個東西本來是可以談論不休，爭論不休的。然而我們決不能容許進行關於所謂「原則」（即關於計劃編製「原則」）的空泛議論和爭論，因為現在的問題是應該著手研究現有的這個唯一合乎科學要求的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指示和根據更詳細研究實際材料來加以修正。

必須特別設法把科學的電氣化計劃與日常的實踐計劃及具體實現這種實踐計劃的事務聯繫起來。這當然是完全不容爭辯的。究竟怎樣聯繫起來呢？為要知道這點，就必須使經濟學家、著作家及統計學家們不是空談一般計劃，而是詳細研究我們現有計劃執行情形，研究我們這些實際事業方面所作出的錯誤，以及改正這些錯誤的辦法。若不進行這種研究工作，那我們就會是盲目行事。（列寧：「論統一經濟計劃」，莫斯科中文版，第一〇—一一頁）

我的意見是：

一、不要再把那怕是一分鐘的時間浪費在關於計劃的空談中；

二、立即開始實際行動起來；

三、至少使我們的工作三分之一服從於這一行動底利益（三分之二用在日常需要上），用來調運物力和人力，恢復企業，分配勞動力，供給糧食，組織供給站和供給工作本身等等。

四、…………（斯大林：「論電氣化計劃給列寧的信」，中譯文見「新建設」一九五三年一月號，第三七頁）

國民經濟計劃必須在執行過程中加以審查和訂正

對於我們布爾什維克，五年計劃並不是什麼一成不變和永不更改的東西。對於我們，五年計劃，像任何計劃一樣，只是大體上規定了的東西，還必須根據地方上的經驗，根據實行計劃的經驗，使它精確，加以變更，使它完善。任何五年計劃也不能預先計算到我們制度中所包含的各種可能性，這些可能性是只有在工作過程中，在工廠、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以及各區域實行計劃過程中才能發現的。祇有官僚主義者才以為只要計劃一經製定，計劃工作便完結了。不知製定計劃只是計劃化的開始。眞正對計劃的領導，僅是在計劃製定後，在各地方上把計劃研究後，在計劃實行和改正過程中才展開的。（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第三四七頁）

計劃必須依賴千百萬勞動群衆的實踐來完成

如果以為生產計劃就是一張數字表和工作任務一覽表，那就是愚蠢的想法了。其實，生產計劃是千百萬人底活的實際行動。我們的生產計劃底實在性，就是創造新生活的千百萬勞動者。我們的生產計劃底實在性，就是活的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的勞動意志，我們按新方法來工作的決心，我們執行計劃的決心。（斯大林：「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四六九頁）

保證社會主義國民經濟計劃化勝利的三個基本因素

試問有什麼東西能夠而且確實表現了主要作用，使我們黨不管有各種錯誤和缺點，而終究達到了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偉大成功呢？

究竟是什麼基本因素使我們不顧一切而達到了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勝利呢？

首先就是千百萬工人和集體農民所表現的積極性和舍己精神，熱忱和首倡性，他們和工程技術人員一起施展巨大力量來發展了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沒有這個情況，我們就會不能達到目的，就會不能前進一步，這是無可懷疑的。

其次，就是黨和政府所實行的堅强領導，它們號召羣衆前進，並克服了前進途中的一切困難。

最後，就是蘇維埃制度所特具的長處和優勢，它包含有克服一切困難所必要的雄厚能力。

這就是保證蘇聯獲得了歷史勝利的三個基本因素。（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五二九頁）

斯大林著作中譯文簡目

例言

一、爲了便於讀者們學習斯大林的著作，特編製本簡目。

二、本簡目首列斯大林每篇著作的題目，依寫作先後分爲八個時期排列。

三、在斯大林每篇著作之後，列有中譯文的出處。如有幾種譯文者，則僅列一、二種常見的報刊或版本。

四、本簡目所列中譯文的出處，凡散見於各報刊者，均分別註明日期或刊期。其他部分，均指下列中譯文版本。

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係一九四九年解放社出版。

馬恩列斯論游擊鬥爭：係聯共（布）馬恩列學院編，一九四四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係曹葆華等譯，一九五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列寧文選：係聯共（布）馬恩列學院編，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係一九四九年解放社出版，分上下兩册。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係張仲實等譯，一九五〇年解放社出版。

斯大林選集：係一九四九年東北新華書店出版。

斯大林文選(一)(九)：係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編（根據「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一卷及第九卷譯出），一九五二年該校出版。

列寧主義問題：係唯眞譯校，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論列寧：係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論民族問題：係張仲實譯，一九四八年東北書店出版。

斯大林論戰後國際關係：係一九四九年聯合出版社出版。

斯大林論戰後國際形勢：係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重編（原係聯合出版社編「斯大林論戰後國際關係」），一九五二年該校出版。

斯大林論批評與自我批評：係曹葆華等譯，一九五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斯大林論青年：係中國青年社編，一九四九年青年出版社出版。

整風文獻：係一九五〇年解放社出版。

外文出版局單行本：係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單行本。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係北京人民出版社單行本。

中國人民大學單行本，係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單行本。

五、本簡目誤漏之處，恐所難免，請讀者多予指正，以便增訂。

十月革命前（一九〇一年——一九一七年）

編輯部的話（一九〇一年九月）
「人民日報」（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三日）
「新建設」（一九五三年四月號）

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最近任務（一九〇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學習譯叢」（一九五二年第一號）
「斯大林文選」（一）

社會民主黨是怎樣理解民族問題的（一九〇四年九月一日）
「新建設」（五卷三期）
「學習譯叢」（一九五三年第四號）

無產者階級與無產者政黨（一九〇五年一月）
外文出版局單行本（一九五一年）
「新建設」（題爲「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政黨」）（一九五三年四月號）

查明了什麼？（告高加索工人書）（一九〇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馬恩列斯論游擊鬥爭」

略論黨內的意見分歧（一九〇五年四月）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一九五一年六月）

武裝起義和我們的策略（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五日）
「斯大林文選」（一）

臨時革命政府與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五日）
「斯大林文選」（一）
「學習譯叢」（一九五三年第三號）
答「社會民主黨人」報（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五日）
「斯大林文選」（一）
「略論黨內的意見分歧」
斯大林於一九〇五年在梯弗里斯羣衆大會上的發言（目前時局和工人黨統一代表大會）（摘錄）
「馬恩列斯論游擊鬥爭」
兩個搏鬥（關於一月九日）（一九〇六年一月七日）
「斯大林文選」（一）
國家杜馬與社會民主黨底策略（一九〇六年三月八日）
「斯大林文選」（一）
土地問題（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七、二十二、二十三日）
「斯大林文選」（一）
論目前形勢（一九〇六年四月三十日）
「斯大林文選」（一）
馬克思與恩格斯論起義（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三日）
「斯大林文選」（一）
階級鬥爭（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斯大林文選」（一）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九〇六年六、七月）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一九五二年九月）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倫敦代表大會（一個代表的札記）（一九〇七年六、七月）
外文出版局單行本（一九四〇年）
五一萬歲！（一九一二年四月初）
「人民日報」（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
「新建設」（一九五三年五月號）
我們的目的（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新建設」（一九五三年五月號）
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九一二年末到一九一三年初）
外文出版局單行本（一九五〇年）
新華書店單行本（一九四九年）
論工兵代表蘇維埃（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中國人民大學單行本（一九五三年四月）
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論民族問題」

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一九一八年——一九二〇年）

烏克蘭人民一九一八年反德寇侵犯的鬥爭（烏克蘭樞紐）（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馬恩列斯論游擊鬥爭」
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十九日）
「論民族問題」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摘錄）
不要忘記東方（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
關於南方的軍事形勢（一九二〇年一月七日）
中國人民大學單行本（一九五二年）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底組織者和領袖（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論列寧」
「列寧文選」（一）
協約國對俄國的新進攻（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五、六日）
中國人民大學單行本（一九五二年）
蘇維埃政權對於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
「論民族問題」
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年（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中國人民大學單行本（一九五二年）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五年）

我們的意見分歧（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
中國人民大學單行本（一九五二年）
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迫切任務（報告提綱）（一九二一年二月十日）
「論民族問題」

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迫切任務（報告與結語）（一九二一年三月十日）
「論民族問題」
給列寧的信（論電氣化）（一九二一年三月）
「新建設」（一九五三年一月號）
論民族問題的提法（一九二一年五月八日）
「論民族問題」
十月革命與俄羅斯共產主義者的民族政策（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六、七日）
「論民族問題」
列寧同志在休養中（短評）（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論列寧」
論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論民族問題」
論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論民族問題」
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戰略與策略問題（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學習譯叢」（一九五二年第五號）
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因素（報告大綱）（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論民族問題」
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因素（報告與結語）（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論民族問題」
報紙是集體的組織者（一九二三年五月六日）
「人民日報」（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九日）
在俄國共產黨（布）中央與各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區負責工作人員第四次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
「論民族問題」
十月革命和中等階層問題（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論民族問題」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摘錄）
迎接第一屆女工農婦代表大會五週年（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新中國婦女」（一九五二年一月號）
追悼列寧（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論列寧」
「列寧文選」（二）
論列寧（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論列寧」
「列寧文選」（一）
論共產主義青年團內底矛盾（一九二四年四月三日）
「斯大林論青年」
論列寧主義基礎（一九二四年四月初）
外文出版局單行本（一九四九年）
「列寧主義問題」
論工人通訊員（一九二四年六月）
「人民日報」（一九五〇年八月二日）
給傑米揚・別德內依的信（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
斯大林論斯維爾德洛夫（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新華日報」（重慶）（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七日）
給「農民報」（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人民日報」（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斯大林選集（一）
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到十月革命之路」一書底序言）（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外文出版局單行本（一九五〇年）
「列寧主義問題」
女工和農婦們，謹記着並努力執行依里奇底遺訓吧！（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
「論列寧」

＊俄文原題爲：Об объединении совет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可譯爲論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

＊＊俄文原題爲：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и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意爲：論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組織）故兩題之中譯文不應相同。

論「紅色青年」的任務（一九二五年一月）
「人民日報」（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

致「工人報」（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論列寧」
「列寧文選」（一）

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摘自「論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
「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
「整風文獻」

慶祝國際婦女節（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
「新中國婦女」創刊號（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
「人民日報」（一九五〇年三月七日）

俄共（布）中央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

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論民族問題」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

論農村中共產主義青年團底積極分子（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
「斯大林論青年」

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臨時大會工作的總結（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
「斯大林選集」（一）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摘錄）

東方大學的政治任務（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論民族問題」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摘錄）

問題與答覆（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
「斯大林選集」（一）

再論民族問題（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摘錄）
「論民族問題」

共產主義青年團底任務（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選集」（一）
「斯大林論青年」

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及結論）（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三日）
外文出版局單行本（一九五二年）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一九五三年四月）

為國家工業化而鬥爭時期（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九年）

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外文出版局單行本
「斯大林選集」（二）（題為「關於列寧主義底問題」）

論蘇聯經濟形勢與黨底政策（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題為「論蘇聯經濟狀況與黨的政策」）（一九五三年三月）
「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下）

給卡加諾維赤同志及烏克蘭共產黨（布）其他中央委員的信（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論民族問題」

論聯共黨內的反對派聯盟（報告提綱）（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斯大林選集」（二）

論聯共（布）黨內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報告與結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至三日）
「斯大林選集」（二）

論中國革命底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

再論聯共（布）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報告與結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七日）
「斯大林選集」（二）
「斯大林文選」（九）

在莫斯科州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
「斯大林文選」（九）

給扎以切夫同志的信（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文選」（九）

給連那的工人們（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文選」（九）

在斯大林鐵路工廠十月之路工人大會上的演說（摘要）（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
「斯大林文選」（九）

給英維特科夫同志和阿雷波夫同志的信（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
「斯大林文選」（九）

關於工農政府問題（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斯大林選集」（三）

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全蘇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論青年」

給初公諾夫的信（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

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外文出版局單行本（一九五一年）
「列寧主義問題」

中國革命問題（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

論中國革命底幾個問題（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

與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列寧主義問題」
「斯大林選集」（三）

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底任務（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

給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生們（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

答斯·頗克羅夫斯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文選」（九）

時事問題簡評（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

中國問題（摘錄）（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

國際形勢與蘇聯國防（摘錄）（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

與第一屆美國工人代表團談話（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斯大林選集」（三）
「列寧文選」（一）（摘錄）

俄國反對派底政治面目（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選集」（三）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摘錄）

托洛茨基反對派之過去與現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選集」（三）

與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斯大林選集」（三）

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七日）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一九五三年四月）
「列寧主義問題」

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及結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七日）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一九五三年四月）

論紅軍底三個特點（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外文出版局單行本（一九五〇年）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一九五三年四月）

論自我批評（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
「斯大林論批評與自我批評」

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一九五三年四月）
「中國青年」（一九五三年第六期）

在糧食戰線上（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列寧主義問題」
「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下）

（張心緒編）

（未完）

新書介紹

介紹「蘇聯初期文化建設史略」

楊履武

伊·斯米爾諾夫著　徐亞倩譯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印行

在「蘇聯初期文化建設史略」一書中，作者根據確切的史實，生動地描繪了蘇維埃政權成立初期，即自一九一七年十月起至一九一八年七月止，在列寧和蘇維埃政府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種種活動。這些活動是在與資產階級文化和一切依附於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分子的殘酷鬥爭中進行的。雖然祇有短短的八個月，但它却是社會主義文化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中開始蓬勃生長起來的歷史行程，是從摧毀資產階級文化的統治到建設無產階級文化的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列寧在這個期間所提出的向資產階級文化進行鬥爭的許多措施，是非常英明而富有歷史意義的。雖然，蘇聯在十月革命勝利初期的具體情況與我們新中國革命的全面勝利並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第一年，在政治上有好些不同的地方，但列寧在文化革命戰綫上的傑出措施，對於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工作，仍有其偉大的現實意義。我們現在把本書各章的內容，扼要地介紹於後：

第一章「列寧斯大林論蘇維埃國家在文化建設中的任務」的中心論點，在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領導思想。在蘇維埃初期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孟什維克、馬克思主義反對派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在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建設中的歷史作用，他們認爲不必經過階級鬥爭、不必改變國家體制，更不須要廣大人民羣衆參加鬥爭，單就文化教育團體的力量就可求得社會主義文化的實現，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體制中，也可能創造社會主義文化。孟什維克還無恥地說，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文化程度不够」，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是不能取得勝利的。列寧無情地揭露並且駁斥了這些機會主義的論點，他在那篇有名的論文「論我們的革命」中說：「假如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先有『相當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不能够說得出，究竟怎樣才是相當的文化水平），那末爲什麼我們就不可以用革命的方法，首先取得這個『相當文化水平』的先決條件，然後再以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爲基礎而向前推進，趕上別的民族呢？」（原書第五頁）列寧在他的著作中曾屢次强調說，確立並鞏固蘇維埃制度是發展眞正人民文化的基本條件，只有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取得政權後，勞苦大衆才能獲得教育，人民文化才能發揚光大。所以，從蘇維埃國家成立的第一天起，列寧首先把解除舊俄遺留下來的嚴重困難——勞動羣衆的普遍文盲，人民的社會主義教育和再教育，作爲文化革命的重要任務之一，使廣大勞動人民獲得知識，獲得光明，使新的文化生活在廣大的勞動人民中顯現出來，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得到教育和改造，養成其社會主義的精神，幫助他們克服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

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蘇維埃國家的確立與鞏固，爲社會主義社會、政治、文化的建設，鋪設了一條新的道路，使廣大人民羣衆得以接觸文化、科學、藝術和文學上的高度成就。

在第二章「蘇維埃國家剷除封建殘餘的措施及其對文化上的影響」中，作者指出：在沙皇俄羅斯時代遺留下來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一部分公民在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享有各種特權身份制度，勞動婦女所處地位的低賤以及教會特權在一部分人民的精神上、生活上的種種反動統治，所有這些封建殘餘制度，成了蘇維埃政權成立初期在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的重大障礙。爲了清除這些障礙，列寧、斯大林採取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發佈了「俄羅斯各民族人權宣言」、「民族政策」、「廢除身份制度和公民等級」、「離婚條例」、「自由婚姻條例」、「關於信仰自由、教會與宗教團體的命令」等等，這些革命措施徹底地革除了中世紀的、農奴制的、封建主義的野蠻而殘酷的社會秩序和社會制度，使各族人民從互相壓迫與互相歧視中獲得解放而進於互相友愛和互相團結，使婦女從封建政權與夫權的雙重壓迫下解救出來，獲得政治、經濟、文化和婚姻各方面的自由和平等，使被教會所統治的一切學校裏的師生擺脫了宣教師的蒙昧主義和神秘主義教育，進一步使俄羅斯文化擺脫了宗教的桎梏。這幾個月內蘇維埃政權在剷除封建殘餘方面所獲得的如此巨大的成就，列寧認爲對於人民在政治、文化的發展上，是有着極大的功績的。他說：「除了經過這樣的徹底破壞，再沒有也不會有別的道路可以達到

社會主義。」（原書第六八頁）

十月革命前夕，絕大多數的俄羅斯報紙是反革命的，這些資產階級的出版物，用盡一切可恥的謊言來詆毀布爾什維克黨，要求臨時政府壓制革命情緒沸騰的羣衆和懲罰進步工人。十月革命勝利後最初幾天，列寧即以斷然的革命手段，封閉了一些重要的反動報紙，如：立憲民主黨的「言論報」、「俄羅斯自由報」和下流無恥的「戈比報」等等，並沒收其一切財產，拘禁其主要編輯人員，徹底解除資產階級的言論武裝，爲了在立法上鞏固無產階級出版事業，列寧又親自簽署並公布了「出版法令」。法令中這樣說：「大家知道，資產階級的報紙乃是資產階級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尤其是在此緊急關頭，新生的工農政權還剛在日漸鞏固之中，決不能把此種危險不亞於炸彈和機關槍的武器，原封不動地保留在敵人的手中。這些黃色的、綠色的報紙隨時可以造謠誣謗，危害人民新獲得的勝利。所以不得不採取緊急臨時措置，杜絕謠言和誣謗的洪流。」（原書第七四頁）出版法公布不久，一些繼續出版的資產階級報紙，發表反動言論更爲激烈，已經被封的報紙則改頭換面，繼續進行其反革命的活動，破壞蘇維埃的法令，如右翼社會革命黨的「民務報」會先後改名了六次，孟什維克的反革命報紙「士兵呼聲」，在短短兩個月的壽命中，也改名了九次。蘇維埃政府立即成立革命出版法庭，來鎮壓這些反動的不服從「出版法」的資產階級報紙。由於反革命報紙的肅清，便爲大規模地建設人民出版事業開闢了廣闊的道路。所以，不到幾個月，從黨中央到地方黨部，便開始恢復與創辦了人民自己的出版物，如「眞理報」、「工農臨時政府公報」、「貧農報」、「青年無產者」……等等。這些新興的人民出版事業，「繼承着布爾什維克報紙的傳統，不但成爲宣傳者和鼓動者，而且成爲全國民衆的組織者。中央和地方蘇維埃和布爾什維克黨的報紙，向人民闡明革命的法令和黨的口號的本質和意義，把勞動人民團結在蘇維埃和共產黨的周圍，以蘇維埃政府的措施爲中心，把民衆組織起來，並向工人、農民、士兵指出實際行動的路綫」。（原書第九九頁）第三章「反革命報紙的消滅和蘇維埃定期刊物的創辦」，就闡明了這些問題。

在第四章「羣衆政治教育工作的展開和國民教育制度的改造」中，作者指出：十月革命的勝利，給勞動人民的教育帶來了根本的改變。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以多種多樣的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的形式，對廣大羣衆進行政治教育，把教育和文化擴展與深入到廣大的人民羣衆中去，成了當時蘇維埃教育的主流，而將羣衆鼓動工作列爲羣衆政治啓蒙工作的主要環節之一。列寧指出：必須派遣布爾什維克政治鼓動員深入窮鄉僻壤，運用口頭、文字等各種各樣的方式，大力展開政治鼓動工作，向人民闡明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性質與歷史意義，並把蘇維埃革命勝利的消息和蘇維埃政府發佈的一切政策法令，傳佈到工人、農民、士兵的羣衆中去，傳佈到全國各大城市、遼遠的邊區和前綫的戰壕中去，在全國各城市、各農村、各部隊中形成政治鼓動的洪流。這是列寧在展開羣衆政治教育運動中的一個最出色的指示。當時革命的彼得格勒就成了一個政治鼓動的大本營。

在全國形成羣衆性文化啓蒙洪流的同時，列寧對圖書館和圖書出版事業也特別予以關懷，並給圖書館規定了具體的任務。列寧在「論彼得格勒公共圖書館的任務」一文中開頭就寫着這麼一句名言：「要合理地、自覺地、順利地參加革命，就得學習。」（原書第一四〇頁）這句話成了俄國文化革命的口號。列寧又在「我們能爲國民教育做點什麼」一文中寫道：「我們所要注意的，是要使孩子們也會利用豐富的藏書；我們所關心的，是要使讀者可以在家裏博覽公共圖書；我們認爲公共圖書館的驕傲和光榮並不在於它珍藏着多少稀世珍本，多少十六世紀的出版物或者十世紀的手抄本，而在於圖書在人民中間流傳得如何廣，吸引到的新讀者如何多，讀者對圖書的任何要求如何迅速地獲得滿足，以及有多少圖書分送到讀者的家裏，有多少孩子被引導着從事閱讀，而學會如何利用圖書館……。」（原書第一四一頁）。蘇維埃政府就遵循着列寧的這一指示，大規模地組織並推動圖書出版事業，把各種各樣的好書，推廣到廣大的讀者羣衆中去。

在國民教育制度方面，也進行了巨大的改革工作。根據列寧的指示：「人民都有以本民族語言受教育的權利，學校與教會分離，學校完全世俗化，全國各民族兒童不分性別須受免費與義務的普通綜合技術教育，國家對學生免費供給課業用品、食物和衣着，吸引廣大民主階層人士從事國民教育事業，並選拔人民教師。」（原書第一五五頁）爲了執行這一系列的革命措施，就把資產階級的舊有教育機構徹底予以打碎，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員部，把全國人民教育的領導權集中掌握在蘇維埃國家手中，並進一步，粉碎了爲反革命分子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以及立憲民主黨所煽動的教師的反蘇維埃罷教運動，勝利地把廣大的教師羣衆從反革命方面爭取過來，團結在蘇維埃政府的周圍，爲廣大的勞動人民服務。

這個國民教育的改造工作還不限於中、小學教育方面，而且深入到高等教育。革命前限制工農子弟進入大學，現在高等學校是向工農開門了，一切限制工農入學的不合理的法規，全被廢除了。

在科學和藝術方面，列寧同樣地提出了一系列的英明的措施。作者在第五章「科學和藝術方面的初步措施」中，生動地描繪了這方面的經過情形。

首先，在動員科學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戰綫上，列寧採取了革命的、但

也是極其審慎的政策：即一面團結資產階級的專家和科學工作者，一面與這些資產階級專家和科學工作者在思想上的反人民的見解和立場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政策，並且有計劃地逐步地改組舊的科學研究機構，把資產階級的科學研究成爲服務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列寧指出：我們不先向科學院提出黨的政治性和組織性的任何條件，「只需要求科學工作者盡公民的責任——就是爲人民服務，與人民所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合作。假如科學工作者立即準備這樣做，一切工作就有了基礎。」（原書第二〇七頁）對科學工作者採取急躁的態度，是絕大的危險，這將使學者遠離蘇維埃制度。就在列寧的英明的政策下，資產階級科學家參與了公共事業、經濟、文化以及國防等建設工作，把科學研究與社會主義經濟事業的實踐結合了起來。

在這一時期中，列寧發佈了「關於檔案庫業務的改組和集中」的法令，這是蘇維埃文化建設中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措施。法令中宣佈有關國家、教堂或私人的檔案庫，都集中保管，轉爲全民族的文化財產。

對於藝術方面的措施是改組皇家藝術機構，將全國藝術領導權集中於教育人民委員部，並在該部增設藝術處和文藝出版處，從事於文藝問題及政策的研究。這一時期在文藝方面的主要活動是指導文物國有化和文物保護，並利用藝術以實現紀念性宣傳的計劃。列寧指出：與奪取地主、資產階級政權的同時，必須沒收地主、資產階級的一切藝術珍品和文化寶物爲國有，並予以嚴格的保護，在教育人民委員部下組織「博物院暨保護藝術品古蹟事業委員會」有計劃、有組織地主持這項工作。這些措施意味着蘇維埃藝術在發展上的歷史性的變化，即從爲資產階級所玩弄的藝術，轉過來爲勞動人民服務的現實主義的藝術。

在這個基礎上，列寧的進一步的措施是「用藝術爲工具來從事紀念性的宣傳」，即與配合社會主義建設計劃的同時，廣泛地利用藝術，選擇適當地點，爲革命先驅者雕塑各種紀念像，來宣傳並喚起羣衆對革命烈士光輝事蹟的懷念和崇敬，並爲蘇維埃新社會在藝術方面開創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風格。

作者伊·斯米爾諾夫在最後一章結論中指出：列寧在蘇維埃初期的文化建設方面的英明政策是：「從資本主義的工具，轉變爲社會主義工具。」作者又指出：「列寧善於抉擇問題，確定主導問題和關鍵問題的所在；……列寧還賦有善於綜合的才能，使各部門文化事業服從於一個目標——全國性的建設。」（原書第二六九頁）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短短的八個月，列寧於極其複雜而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天才地英明地指出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並且勇敢地克服敵人從四方八面襲擊過來的、對幼年的蘇維埃政權的瘋狂破壞以及種種困難，而又頑強地堅持下去，終於實現了在教育、科學、藝術、出版事業等各方面的偉大改造，這些偉大的成就，成了蘇維埃文化建設史中最光輝燦爛的一頁。

蘇聯新書

十五世紀後半期俄羅斯中央集權國家的對外政策　К·В·巴捷萊維奇著　莫斯科大學出版部一九五二年出版　五四四頁

爲擴張主義服務的現代美國資產階級社會學　М·П·巴斯金著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О·И·薩雅平主編　莫斯科蘇聯科學院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　一九六頁

「中世紀史」　蘇聯科學院院士Е·А·柯斯明斯基與通訊院士С·Д·斯卡兹金合編　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與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學主編　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　七四八頁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九一年法國對外政策　А·З·孟弗萊德著　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莫斯科蘇聯科學院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　五九二頁

德國宗教改革前政治鬥爭史大綱　М·М·斯米林著　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莫斯科蘇聯科學院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　四一六頁

印度的農村（南部古扎拉特）　И·У·穆莫著　（譯自英文）　莫斯科外國著作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　一二八頁

「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經濟問題」　文集　А·Д·古沙柯夫和Н·С·莫斯洛娃合編　莫斯科職工會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　五二〇頁

現代軍國主義與壟斷資本　С·М·維西奈夫著　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莫斯科蘇聯科學院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　二一六頁

企業經營的分析　М·И·巴卡諾夫和И·А·蕭洛莫維奇合著　莫斯科國家財政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　三四〇頁

蘇聯國家收入的計算與報告　И·А·契斯妥夫著　莫斯科國家財政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　一一六頁

「蘇維埃民法與勞動法問題」　文集　蘇聯科學院法律研究所　莫斯科蘇聯科學院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　二〇八頁

蘇聯勞動法　Н·Г·亞歷山大洛夫和А·Е·巴舍爾斯特尼克合著　莫斯科法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　四四八頁

資本主義國家的强迫勞動與奴役　А·Е·巴舍爾斯特尼克和И·Д·列文合著　蘇聯科學院法律研究所　莫斯科蘇聯科學院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　三〇四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狀况和鬥爭」　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莫斯科蘇聯科學院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　四六八頁

「蘇維埃國家與法制的基礎」　М·П·加萊娃和Г·И·費爾金合編　莫斯科法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　四三二頁

國內報刊重要學術論文提要

斯大林教導我們必須認眞學習理論

胡繩

在斯大林遺留給我們的著作寶庫中，有許多地方論述到理論對於革命事業的重大作用，批評了不重視理論和否認理論作用的各種傾向，闡明了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正確態度。

斯大林曾以如此簡潔明瞭的話來說明理論的作用：「理論如果是眞正的理論，就能賦予實際工作者確定方針的能力，明白認識的前途，進行工作的把握，確信我們事業必勝的信念。」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複雜的巨大的工程。能夠指導我們掌握這個工程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學說使得我們能夠用深刻的階級分析的方法來洞曉一切社會現象的本質。斯大林說：「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使實踐不僅能瞭解各階級在目前如何行進和向那裏行進，而且能瞭解這些階級在最近將來會如何行進和向那裏行進。」沒有這種認識，就不能來從事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

斯大林曾這樣說：「實際工作者如果不學習列寧主義，如果不努力掌握列寧主義，如果不願意把自己的實際工作和必要的理論訓練聯繫在一起，那他們的命運就會是暗中摸索。」

理論之所以不容輕視，輕視理論之所以會形成巨大危險，更因爲，如果我們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自己，我們就不可避免地在這個問題或那個問題上爲資產階級思想所俘虜，爲各種反動的思想所俘虜。

在强調理論的重要性時，當然，我們絲毫也不應該忘記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和理論必須服務於實踐。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在和革命實踐密切聯繫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所以這個理論是富於批判性和戰鬥性的，是要不斷地以革命的新的經驗來充實和發展的。教條主義的態度割斷了理論和實踐的聯繫，同時也就使理論喪失了批判性和戰鬥性。理論在教條主義者的手裏成爲死氣沉沉的無用的東西。

毛澤東同志特別重視列寧、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特別重視學習蘇聯共產黨歷史的意義。在中國革命勝利以後，毛澤東同志又再三向全黨指出向「我們的最好的先生」蘇聯共產黨學習的必要。

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所發現和發展了的普遍眞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同志不斷地用理論必須和實踐相結合的這種思想教育全黨，絲毫也不放鬆地和教條主義及經驗主義的傾向作鬥爭。

學習斯大林的這些最可珍貴的教導，我們的任務就是，在我們的黨內外，更廣泛、更深入地宣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克服各種輕視理論、否認理論的作用和不用爲科學研究所必要的刻苦鑽研的態度來對待理論學習的傾向。

我們的任務就是，認眞地展開理論上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和在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傾向以及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和用教條主義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傾向進行不調和的鬥爭。

我們的任務就是，從事巨大的有組織的努力來克服目前還存在着的理論落後於實踐的嚴重現象，如果容忍這種現象，顯然將不可避免地對實踐發生危害的作用。

斯大林曾說：「我們的理論工作不僅應當趕上實際工作，而且還要超過實際工作，武裝我們的實際工作者去爭取社會主義勝利。」斯大林的這個指示是我們在理論戰綫上的奮鬥目標。

（摘自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

改造我們的領導作風

潘梓年

目前，全國範圍內正在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鬥爭，這個鬥爭是需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作爲武器的，我們對於「毛澤東選集」的學習要求就格外來得迫切。我們看到「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當中有許多著作是對於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特別是對於反對官僚主義有着直接的指導作用。例如「『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們的學習」、「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尤其是「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以及「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游擊區也能夠進行生產」等等。我們很好地來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就可以從這裏面汲取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思想的力量。

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毛主席說：「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羣衆相結合。」在我們做文教工作的同志當中，特別是做領導工作的同志當中，還是普遍而嚴重的存在着官僚主義的領導作風，就是因爲沒有很好地學會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領導和羣衆相結合這樣兩個必需採用的方法。

要使領導與羣衆相結合，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是首先要把羣衆的積極性發動起來，另一方面就要有有力

的領導骨幹，去恰當地把羣衆的積極性組織起來。

要怎樣發動羣衆的積極性呢？就思想改造來講，主要是要使大家認識清楚當前的客觀形勢，使他們具體地、親切地看到大勢所趨，感覺到、認識到自己只有向進步的方面努力，才能給自己開闢廣闊的前途。同時，用發展的觀點分析過去和現在，使大家具體地、親切地認識到現在和過去在歷史發展階段上已是怎樣的不同，從這裏認識到自己的進步不只是需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而，引起或加強對自己進步的信心。

怎樣把羣衆的積極性組織起來呢？主要是根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加以分析研究，找出滿足自己要求的切實可行的辦法。這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中也有很好的範例。比如「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游擊區也能夠進行生產」等篇，就是我們應該很好地去學習研究的。

爲了使我們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很好地開展，我們還必須像毛主席所指示的：要着重於對當時環境的分析，對錯誤內容的分析，對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分析。由於我們的文教工作者很大數量的人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因此，很容易產生急躁冒進，很容易在思想上作風上表現出片面性、局部性，常常不能從全面來考慮問題，不能從整個的發展過程來考慮問題，而只是從局部、從目前去看問題。因而常常容易爲一個局部問題所局限，爲這種問題所發生的比較強烈的力量所吸引，所困住。在我們檢查我們自己官僚主義作風的時候，從一方面需要看到這種作風對革命工作、對人民事業的危害性，同時也要分析使得我們產生這種錯誤的當時的環境和它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摘自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六日「長江日報」）

斯大林關於殖民地革命問題的理論

蕭剛

斯大林的事業和學說給全世界被壓迫人民以無窮的和無敵的力量，因此，斯大林時代成爲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的覺醒並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的民族解放鬥爭空前發展的時代。

三十年前，斯大林所說的「社會主義可以作爲（而且已經開始作爲！）帝國主義廣大殖民地國家千百萬羣衆的解放旗幟了」的名言，已成爲公認的事實。

二十九年前，斯大林指出：「被財政資本所壓迫所剝削的殖民地和依賴國，是帝國主義最巨大的後備力量和最嚴重的實力來源。」「最重要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是削弱、瓦解和摧毀帝國主義的鬥爭，因此，「發展國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要求把這兩種革命運動聯合爲一條反對共同敵人帝國主義的共同戰綫」。

斯大林指出：殖民地民族問題本質上是農民問題。在殖民地和附屬國裏，農民佔人口總數的大多數，受着雙重壓迫——封建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壓迫。本國的封建統治者——王公地主、軍閥官僚——是帝國主義統治的支柱，帝國主義者通過他們，利用他們並支持他們去鎮壓並榨取廣大勞動人民的血汗。他們爲了保持自己的封建剝削利益，也甘心受帝國主義者的驅策。

在殖民地和附屬國裏，廣大的農民羣衆，絕大多數沒有或幾乎沒有土地，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封建地主的壓榨下，幾乎終年在飢餓狀態中，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更苦。他們迫切要求着根本改革現存的制度，希望土地革命，因此，他們是解放鬥爭中最廣大的動力，是無產階級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革命隊伍的主力。

現在，各個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工人階級政黨都明確提出了有關工農聯盟的綱領和滿足農民羣衆迫切需要的土地革命綱領，而農民羣衆也認識到自己的可靠的領導者和同盟者只是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農民羣衆已構成了一股偉大的民族的和民主的力量，使反帝反封建的殖民地解放鬥爭日益波瀾壯闊。

斯大林教導說：要使殖民地和附屬國從帝國主義奴役下解放出來，要形成反帝國主義的聯盟（民族統一戰綫），要實行無產階級的領導，要有獨立的共產黨。

斯大林的英明指示，二十餘年來爲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所證明了，爲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勝利所證明了，現在和將來必然繼續爲正在進行革命鬥爭的各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的勝利所證明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武庫中永遠銳利的武器。

（摘自「世界知識」一九五三年第九期）

約・維・斯大林與社會主義核算

中國人民大學簿記核算教研室

斯大林一貫地關懷蘇聯科學的發展。斯大林的指導思想，在任何知識領域的科學工作和實踐工作中都開闢了廣闊的前途。

我們以會計核算的理論和實踐領域爲例。

在蘇聯，核算科學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創始人的指示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列寧和斯大林指出了依照確定的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規律性來研究核算問題的必要。因此，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蘇維埃核算的方法論的基礎。

斯大林在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表明了核算在國家工作和計劃工作中的意義，他指示說：「……任何建設工作，任何國家工作，任何計劃工作，如果沒有正確的核算，是不可想像的。沒有統計，核算一步也不能前進。而核算如果缺少統計，也是不可想像的。」

一九二九年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斯大林提出了根據馬克思主義來製訂蘇聯國民經濟平衡表格式的任務。執行這個指示，就要求重新審查核算和統計，並正確地綜合經濟過程。

斯大林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關於只有在消滅浪費現象和動員工業內部資源、在施行並鞏固經濟核算制和有系統地減低成本的基礎上，才能增加工業內部積累的指示，要求改進核算和報表，要求對國家計劃的完成情況組織有系統的監督。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我們的國家在國內的基本任務，就是進行和平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特別注意核算，這就提高了社會主義經濟核算的作用和意義。

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重新強調指出：「……在我們的企業中，這樣一些問題，如經濟核算和贏利問題、成本問題、價格問題等等，就具有現實的意

義。」這裏又一次地在核算面前提出發掘經濟中未被利用的內部潛力的任務。在現今條件下，利用會計來表明企業中的先進工作經驗，調查並施行材料、燃料、電力和勞動時間的先進支出定額，具有重大的意義。

核算的科學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應該永遠記住偉大的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中核算的指示，應該不斷地改進核算的理論，把它投到巨大的思想理論的高度，並改善核算的實務。

（摘自「工業會計」一九五三年第四期）

新經濟政策的實質

張先疇

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估計到過渡時期經濟的特點，為建設社會主義經濟而制訂的政策。是保證工人階級與農民結成堅强的聯盟以戰勝資本主義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經濟而規定的政策。

在整個過渡時期，布爾什維克黨所制訂的新經濟政策，就是從組織一個統一的國民經濟這一點出發，來考慮使工業和農業如何正確地結合，考慮如何提高小農努力經營的興趣來保證迅速恢復農業，並以此為基礎來提高國家的工業，排擠私人資本，積累充裕的資金，以建立强大的社會主義工業與集體化農業，然後轉入堅決的進攻，以最後消滅資本主義的殘餘。

在恢復國民經濟時期，國家工業和農民經濟的結合，工人階級與農民結成堅强的經濟聯盟，是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但是，怎樣才能達到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呢？怎樣才能鞏固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經濟聯盟呢？什麼是當時事變過程鏈條中的基本環節呢？這就是發展商業，就是組織城鄉間的商品流通。

斯大林一九二八年七月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發表的「論共產國際綱領」的演講中指出：「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策，其目的在於戰勝資本主義成份，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其程序是利用市場，通過市場，而不是不要市場和越過市場的直接的物品交換。」

斯大林一九二六年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指出：「其實，新經濟政策是黨容許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而預期社會主義成份定會戰勝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其實，新經濟政策只是以退却而開始了的，但它是打算着在退却過程中實行重新佈置力量並舉行進攻的。其實，我們實行進攻已有幾年了，而且進攻得很有成效，我們發展着我們的工業，發展着蘇維埃商業，排擠着私人資本。」斯大林揭露了「反對派」是從一種不正確的設想出發，即以為當時所發生的是單方面的資本主義恢復過程。

在戰勝一切「左」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歪曲新經濟政策的荒謬理論中，斯大林深刻地闡述了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實質下了這樣一個經典的定義：「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國家所採取的一種特殊政策，它預計到在一切經濟命脈操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條件下，容許資本主義存在，它預計到資本主義成份和社會主義成份間的鬥爭，預計到保證社會主義成份的作用不斷增長而資本主義成份不斷削弱下去，預計到社會主義成份戰勝資本主義成份，預計到消滅階級和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

（摘自「學習」一九五三年第五期）

蘇聯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的國家銀行工作

鄭伯彬

在一九二五年，蘇聯已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同年十二月聯共（布）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後，展開了為實施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鬥爭。這時候，蘇聯貨幣工作的一個最首要的問題，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資金積累問題。蘇聯在工業化資金積累問題上所採取的辦法，並不是求諸於國外資本的援助，而是在國內發掘財源，用社會主義內部節約的辦法來解決的。

在這個前提和要求下，作為金融部門的銀行，是怎樣促進社會主義建設資金的積累呢？蘇聯的經驗說明了建設期中的貨幣工作，必須是穩定通貨價值，更有效地組織貨幣流通。

蘇聯在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期中的貨幣政策，堅決地執行了穩定盧布的路綫。蘇聯國家銀行逐步實施了以下各項工作：一、促使工業成本的降低，使工業製成品有系統地降低價格；二、通過信貸與商業的結合，並通過信貸與農業生產的結合，維持農產品的價格；三、通過進一步加强財政信用制度，以增大國家預算與健全信用制度的組織；四、加强貨幣信用制度的計劃性，加强調節貨幣流通上的一切計劃工作。

我們仔細體會一下，這許多的工作，對目前我們國家在建設期中的要求來說，也依然是非常必要的。要使銀行工作在建設期中發揮積極的效能，國家銀行還必須通過貨幣和信用的武器，促使工業生產加强經濟核算，加速一切企業的資金週轉，從而更進一步地加强財政和信用制度，使國家資金更有效地分配與再分配於建設期中所必需發展的國民經濟各部門。

國家銀行組織全國貨幣的有計劃的流通，需要編製兩個基本計劃。即根據全國資金來源與資金運用情況編製的信貸計劃和根據全國現金流通情況編製的現金出納計劃。這兩個計劃是穩定通貨、有計劃的組織現金與信用的分配和再分配，使之服務於建設需要的重要槓桿。

蘇聯的經驗告訴了我們，在建設期間銀行工作的一系列的新的制度的建立，不但需要內部技術方面的充分準備，而且還說明了銀行內部的技術問題，不但影響銀行本身業務的發展，影響新的信用制度的建立，而且還影響其他所有的經濟企業，影響整個社會化企業的經濟核算，影響社會主義建設資金的積累。

（摘自「經濟周報」一九五三年第十六期）

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

尙鉞

歷史的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其他部門不同，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指導下，從具體人類社會自身發展的事件中，從社會的一切方面相互作用中，從社會的一切現象中，深入到事件與現象本質裏去，找出最典型最特徵的東西，闡發人類社會發展、變化的法則的科學。而決定社會的發展、變化的是物質資料的謀得方式，即生產方式，所

以歷史科學在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時，首先在於揭示勞動者推進人類社會發展、變化的規律。而人類社會的歷史，除原始公社和社會主義社會外，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因此，歷史科學的對象與任務，對於長期的階級社會，主要的是研究一定的階級社會的產生、發展和衰落的規律，研究階級鬥爭的規律，研究無產階級勝利、怎樣消滅階級、最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規律。所以，歷史科學是從各方面的研究揭示人類社會發展全程的科學。

我們的歷史科學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研究和揭示生產的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的規律，也就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因此，我們的歷史科學首先就在於從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的歷史，勞動羣衆的歷史和人民大衆的歷史中，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法則，而不以帝王將相、侵略者和征服者的活動爲中心。

今日，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下，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把中國歷史提高到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水平來學習和研究，就顯得更加必要了。因爲舊有的剝削階級的歷史學的目的和任務，是爲着培養少數的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它不僅歪曲歷史，掩沒客觀眞理，把歷史故意弄成永遠混亂和漆黑一團，而且在國際上以狹隘的民族觀點，分化中國勞動人民與外國勞動人民的關係。我們的歷史科學的目的和任務，在這裏，就必須與揭示中國社會發展規律同時，透過豐富的正確的史料，以國際主義的精神來教育我國的人民大衆，並與各國勞動人民、特別是與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大衆建立兄弟般的友愛關係。同時在國內，從促進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教育中，透過歷史事實和現象，培養愛國主義，兄弟民族互助友愛的思想、感情和精神。

深刻地研究一下近三年來的中國歷史，就可以看見我們黨，在偉大的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英明領導之下，對各種問題的政策，把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社會的革命實踐結合起來的最典型的範例。

我們爲着正確地了解和體會黨的政策，站穩立場，在執行黨的政策的時候不犯錯誤，或者少犯錯誤，首先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觀點、立場和方法，並將這些觀點和方法運用到中國歷史的和現實社會的本質中去，掌握革命實踐的方向和步驟。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給了我們學習和研究中國社會歷史以最完善、也最銳利的武器。但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任務，是研究歷史過程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它與通史不同。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通史的任務，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指導之下，盡量具體地、盡量眞實地叙述、描寫、分析和總結這個國家、或民族的社會生產和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有影響的事件、人物、現象及其矛盾發展的全部過程，從而揭示這個國家或民族的社會發展規律。

（摘自「歷史教學」一九五三年五月號）

中國的語言學

羅常培

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有最豐富的文化遺產。中國古代雖然沒有語言學這個名目，實際上也作了不少語言學方面的工作。在古書中，常常可以看到關於語言的理論，雖然是片斷的，可是非常精采。如戰國時的荀子、三國時的稽康、東漢時的王充、鄭玄、劉熙等，對於語言，都有所論述。

訓詁就是解釋古代的字義，主要是注解古書。現存經典的注解，可以追溯到漢朝（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二二〇年）。漢朝最有名的經學大師鄭玄所作的詩經、周禮、儀禮、禮記的注解，都是很重要的著作。漢朝以來，歷代學者都有很好的成績。

中國字典可以按體例分成四種：（一）沒有注解的分類字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紀的史籀篇，現存最古的是史游（公元前一世紀）的急就章。（二）按意義編排的字典，最古的是爾雅。此外，揚雄（公元前五三—公元一八年）的方言是中國第一部記錄方言的書，劉熙的釋名，是一種分類字彙。（三）按字的偏旁編排的字典始於許愼的說文解字（公元一〇〇年，簡稱說文）。清代官修的康熙字典成書於一七一六年，共收四七、〇二一字，分部就是根據字彙的。（四）公元三世紀發明了反切的方法，才有按音編排的字典，就是韻書。最早的是魏（公元二二〇—二六五年）李登的聲類，其次是晉呂靜的韻集（公元三〇〇年左右），現在都不存在了。最重要的韻書是陸法言的切韻（公元六〇一年）。有了韻書，才有韻圖。韻圖大概在九世紀就有，不過現存韻圖最早是十二世紀的。至於新韻書，有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宋濂等的洪武正韻、阮元等的經籍纂詁。古音的研究，在清朝有飛躍的進步。如顧炎武、段玉裁、王念孫、江有浩、錢大昕、陳澧等，在這方面都有相當的成績。

公元一世紀，佛教傳入中國，中國人接觸到梵文，翻譯了大量的佛經，保存了無數印度已經失傳的典籍。同時，梵文的研究對中國音韻學也起了影響。十九世紀起，中國人研究歐洲語言的漸漸多了。馬健忠（一八四四—一九〇〇）對拉丁文很有研究，他寫出了第一部漢語語法—馬氏文通（一八九八）。

近幾十年來的工作，主要的是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漢語語法的研究、漢語歷史的研究、漢字改革研究、漢藏系語言的調查研究。

漢語有方言的差別，漢字却是全國統一的。漢字的優點是通行全國，缺點是形體複雜難認、難寫，學習比較煩。十九世紀起，不斷有人提議如何改革漢字，以便普及教育。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後，特別關心並且努力設法提高全國人民的文化水平。一方面組織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研究中國文字拼音化和漢字簡化的問題；一方面大力推行識字運動，普及教育。

全國少數民族的語言，可以作如下的分類：

一、漢藏語系：1.洞台語（洞水語、台語）。2.苗瑤語（苗語、瑤語）。3.藏緬語（藏語、彝語、荆濮語等）。

二、阿爾泰語系：1.突厥語（維吾爾語等）。2.蒙古語。3.通古斯語（滿洲、錫伯、索倫、赫哲、鄂倫春等語）。

三、印歐語系（俄羅斯語、塔吉克語）。

四、南島語系（台灣高山語）。

五、南亞語系（雲南緬甸交界的崩龍語、瓦語）。

其中漢藏語系人口最多，阿爾泰語系次之，其他三系人口都很少。在少數民族語言中，調查工作做得最多的是漢藏語系，有好些調查報告發表。語言學工作者熱誠地幫助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制定文字，或改革其舊有的不合用的文字。西康西昌區域的新彝文已經實驗推行，成績優良。還有許多少數民族語言已經編出教科書，在積極試教中。

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發表後，對中國語言學的工作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過去中國語言學界偏重語言本身的問題，專題研究和方言調查有好些存在着脫離現實的偏向。解放以後，語言學工作者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事實上已經改正這種偏向。現在讀了斯大林的文章，更從理論上有了明確的認識。準備着在斯大林語言學說的基礎上，結合中國語言研究的具體情況，建立中國語言學的系統的理論。

二、過去有好些從事文字改革的人，以爲語言文字是有階級性的，因此，走了一些彎路，現在已經沒有人再信這種「理論」，文字改革工作已經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三、中國共產黨中央重視語法的教育，在人民日報上連載「語法修辭講話」，糾正文理不通的現象，引起全國人民學習語法的高潮。

四、三年以來，在幫助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制定文字，編教科書方面，把語言調查跟語文教育結合起來，已經獲得了若干成績。

(摘自「科學通報」一九五三年四月號)

關於黨的政策思想與文學藝術創作問題

柏山

在去年文藝整風過程中，普遍揭發了文學藝術創作上所存在的脫離政治和概念化公式化的兩種傾向。

這兩種傾向反映了：在創作思想上，對於黨的政策思想與文學藝術創作的關係，存在着兩種極端錯誤的認識：一是認爲黨的政策思想是要妨碍作家的創作情緒，作家只要有技術，就可以創作，因而强調技術的重要，而對於學習黨的政策，提高黨的政策思想，不是感到淡漠，就認爲是一種負担。很明顯的，眞正的藝術品，必須是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否認思想性，就是否認革命的文藝要有革命的政治內容，也就是拒絕爲工農兵服務；否認藝術性，就是否認革命的文藝需要有高度的藝術形式，拒絕深刻地研究生活，反映生活，表現生活。要做到這種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首先就需要通過作家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黨的政策的學習。

其次，和上述這種論點恰恰相反的，即是認爲文學藝術創作的任務，就在機械的表現（實際上是撥弄）黨的政策。把文學藝術的思想性直接了解爲就是政策性，其結論就是要有思想性就要寫政策，思想即政策。因此，有人這樣說：文學藝術表現政策是目的，而在作品中描寫人物，不過是體現政策的一種手段而已。這裏，最基本的錯誤，就在於不理解黨的政策思想應當作爲作家認識現實、提高作家認識現實的能力的動力，而不是也不能作爲文學藝術創作直接表現的形式。文學藝術創作不以創造普通人的明朗的藝術形象作爲創作的主要任務，而以機械地講解黨的政策爲目的，以政策思想代替客觀現實，代替生活，乃是直接違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也具體的反映了公式化概念化傾向的創作思想。

因此，目前爲了進一步澄清文學藝術創作思想的混亂，必須克服上述對黨的政策思想與文學藝術創作的兩種錯誤認識。第一、應當在文藝整風的基礎上繼續加强作家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黨的政策的學習，使作家不僅具有一般的工人階級思想，而且具有具體的政策思想，以便於深入羣衆，深入生活，能在萬花繚亂的現實生活中辨別方向，辨別是非，辨別事物的本質與現象。

第二、應當在文藝整風的基礎上，深入生活，並與各項實際工作和具體鬥爭密切相結合。既不要沉沒在生活的海洋裏抬不起頭來，迷失方向；又不應站在岸上冷眼旁觀。作爲一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必須投身於偉大的羣衆生活中去，不但在形式上和羣衆生活在一起，而且要在思想感情上與羣衆打成一片。要眞正達到這一要求，還必須具有高度的思想水平和敏銳的觀察力。

(摘自「文藝月報」一九五三年四月號)

我們爲什麼紀念屈原？

陸侃如

世界和平大會建議各國進步人民共同紀念中國的偉大詩人屈原。這給中國人民以莫大的鼓舞與激勵。二千二百多年來，中國人民一直熱愛着屈原。年年到端午節，競渡角黍的風俗普遍到全國每一個角落。歷史上還不會有第二個作家能獲得這樣廣泛而悠久的愛戴與懷念。

世界和平大會建議紀念屈原，是完全符合於一向努力保衛人類文化優秀傳統的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與要求的。因爲，屈原代表中華民族愛祖國、愛人民的崇高品質，他的作品代表中國古典文學的高度成就。

屈原是楚人，他與楚國休戚相關，他的作品裏充滿着火一般的愛國熱情。他爲祖國的强盛而興奮，也爲祖國的衰敗而悲痛。他個人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和祖國人民的命運，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愛國主義一向是中國優秀的古典文學的創作原則之一。屈原便是這光榮傳統的傑出的代表。

對祖國的熱愛使屈原不能同那些陷祖國於衰亡的壞人妥協。他具有極其頑强的鬥爭性，他在作品裏勇敢地揭露一切醜惡。在艱苦的歲月裏，他不怕任何犧牲，能夠堅持鬥爭到底，決不中途妥協。無論在放逐前，或是在放逐後，他的作品裏滿是堅決表明態度的不朽詩句。當自己的主張無法實現的時候，便投水自殺而不辭。

因爲他熱愛人民，所以他的作品的體裁與語言也都接近人民。屈原創作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能夠忠實地學習人民詩歌。

具備進步的宇宙觀與進步的創作方法的作家，那只有在消滅了人剝削人的新社會裏才能大量出現，只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教導之下才能大量產生。我們現在紀念屈原，一面要學習他的優點，一面也該認識到：作爲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必須掌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不但要能夠繼承歷史上的光榮傳統，而且要能夠發揚光大，超越前人。

(摘自「文史哲」一九五三年第三期)

小啓

本刊一九五三年一月號——六月號分類總目錄，將於下期隨本刊附送，請讀者注意。

國外報刊重要學術論文介紹

介紹「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J·杜克洛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法文版）今天（一九五三年四月四日）由「社會出版社」出版了。這是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方面的一件大事，而就我們——法國共產黨人來說，這是一件有理由引爲驕傲和高興的事。

從「全集」第一卷的學習中，我們得出的第一個教訓是：斯大林對於列寧主義的忠誠。在俄國工人運動和俄國革命的發展所提出的一切問題上，斯大林的思想與列寧一致，他堅決地保衛了列寧主義的觀點，勇猛地擊退列寧主義的敵人。

斯大林在他所著：「略論黨內的意見分歧」、「答社會民主黨人報」等文中捍衛了列寧的指示。在這些著作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斯大林對於列寧在反孟什維克的鬥爭中的思想、立場表示熱烈的支持，對於普列漢諾夫和馬爾托夫的論據展開猛烈的論戰，而且可以找到特別出色的篇幅，列入馬克思主義文獻而永垂不朽。

例如斯大林光輝地論證了工人運動的自發性和覺悟問題，這是列寧在「做什麼？」一書中所討論的問題。他說：自發的運動就是沒有社會主義的運動，傾向於服從資產階級思想的運動。服從資產階級的思想，這就意味着取消社會主義的思想。

必須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工人運動自發論是機會主義的理論。工人階級必須有爲革命理論所武裝的、完全覺悟的革命政黨。祇有科學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才能保證工人階級的勝利。

在一切重要的理論和策略問題上，斯大林固然貢獻了他自己獨特的天才，並且遵循着列寧的教訓；而在民族問題上，他更進一步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斯大林在他的革命活動初期所一手建立的南高加索無產階級組織，就有不同民族的工人團結在一起。列寧曾一再指出南高加索的黨組織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模範。

十月革命所以能勝利地解決了困難的民族問題，應歸功於斯大林。一個百數以上的民族携手走向共產主義的多民族國家是由斯大林一手創建起來的。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不僅能使我們更好地認識斯大林，並且能使我們在各種各樣的範圍內汲取革命的教訓。

在黨的組織和任務上、在革命的戰略和策略上、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上、在工農聯盟問題上，斯大林所寫的每一頁都值得我們每一個戰士去體會和鑽研的。我們每一個戰士讀完了這一卷，將要武裝得更好，對於我們事

業即將到來的勝利，將更加樂觀，更加充滿信心。

在新舊力量進行着的偉大戰鬥中，我們也必將獲得勝利，無論如何，前途必歸於不可戰勝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前途必歸於共產主義！

（寄寒摘譯自一九五三年四月四日法國「人道報」）

偉大的國際主義原則

H·馬勤斯金

我們的共產黨和其他國家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一切活動，都是依據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闡揚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即各國人民平等、自由和兄弟般合作的原則的。

列寧和斯大林指出，無產階級不僅不輕視愛國主義，恰恰相反，正是工人階級才是最崇高的愛國主義傳統的代表者和繼承者。列寧經常指出，革命的無產階級對於自己祖國的命運，是不能漠不關心的。他教導說，人民對於自己祖國的熱愛，是在長期的鬥爭中培養起來的最深切的感情。

我們的黨證明自己完全有能力把一個民族的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同尊重別的民族的愛國主義感情和民族自豪感結合起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其目的要挑起各國間的鬥爭，而共產黨人的政策，却旨在結束民族的壓迫，爲各民族持久的團結創造眞正的條件。

俄國的無產階級和貧農階級在推翻了本國剝削者的政權之後，不僅解決了自己民族的任務，而且也解決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任務。蘇聯爲國際工人運動建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強大的根據地，在它的週圍開始形成了一個世界勞動人民的統一的革命陣綫。

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高舉着列寧、斯大林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不疲倦地以忠實於國際主義原則的精神來教育我國的勞動人民。在國內培養國際主義的精神，其目的在於建立、鞏固和不斷地發展蘇聯各民族間的友好關係，保證社會主義民族的物質和精神力量的增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不但維護了自己民族的利益，而且也維護了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利益。全世界的勞動人民永遠記住，正是這一個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才把人類從希特勒法西斯奴役的威脅下拯救了出來，正是它幫助了歐、亞許多國家恢復了自己民族的主權，正是它給了各個獲得解放的民族以走上獨立自主和民主發展的道路的可能性。

現在，對待蘇聯的態度，就是一個檢驗是否忠於國際主義思想、是否忠於國際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標準。如果一個人不是蘇聯的朋友，不是一個擁護蘇聯的人，那末，他就不可能是一個眞正爲各族人民的利益而鬥爭的戰士，就不可能是一個眞正的國際主義者。

（一民摘譯自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一日蘇聯「文學報」）

斯大林憲法與國家管理問題

И・И・葉甫吉赫夫

蘇維埃管理和蘇維埃行政法是完全從斯大林憲法所規定的那些管理原則出發的。斯大林憲法是全部蘇維埃法的法律上的基礎，因此，它對於蘇維埃國家機器的管理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活動，有着巨大的組織上的意義。

憲法第一二六條規定：共產黨是勞動羣衆為鞏固及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而奮鬥中之先鋒隊，勞動羣衆所有一切社會團體和國家機關之領導核心。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是蘇維埃國家一切機關的積極活動的最重要條件。

憲法也確立了蘇維埃國家執行機關的實際活動的具體原則。這些原則是：（一）民主集中主義，（二）羣衆參加管理，（三）計劃化，（四）社會主義的法治，（五）民族平等。

在國家管理上，民主集中主義的重要原則之一——最高的領導和國家管理，集中在最高機關的手中——表現於憲法第一四條。依照這條，在管理領域內最重要的職權（蘇聯國防的組織、國家安全的保衛、有全蘇聯意義的經濟企業的管理、運輸和交通的管理、國民經濟的統一統計制度的組織等），歸屬於蘇聯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國家管理機關。民主集中主義的這個原則也清楚地表現於第六七條，依照這條的規定，蘇聯部長會議所頒發的決議和指令在蘇聯全境均須執行。憲法中所標示的民主集中原則不僅明白地確定了國家機關的組織結構，而且也確定了國家工作人員的活動的性質，國家工作人員也須嚴格地遵循黨和國家的紀律。

羣衆參加於國家管理，被鞏固在憲法的一系列條文中。憲法第二條由於規定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構成蘇聯的政治基礎，同時決定了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在國家管理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國家管理機關的一切活動是由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指導的，因為依照第三條，蘇聯全部政權屬於城鄉勞動者，由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實現之。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是工人階級專政的主要的國家槓桿。

憲法第一一條規定，蘇聯之經濟生活，受國家所定國民經濟計劃之決定及指導。這種計劃是具有法律的效力的。這樣，第一一條鞏固了蘇維埃管理的最重要原則之一，即計劃化的原則。

社會主義法治的原則，作為國家管理的最重要原則之一，在蘇聯憲法中也有一貫的表現。憲法第三二條規定蘇聯立法權，專由蘇聯最高蘇維埃行使之。這個關於頒布法律的制度的規定使一切國家管理機關成為依據現行法律並執行現行法律的執行機關。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管理中的社會主義法治原則，憲法第九章所規定的司法組織制度有着巨大的意義。這章着重地確定了審判員獨立和僅僅服從法律。大家知道，國家管理中一系列的爭議、行政侵權行為和管理行為（例如住宅事件）是受法院審查的。憲法不僅規定了蘇維埃國家管理中的法治原則，而且也明白地規定了監督法治執行的基本方法。

憲法也貫徹了國家管理中民族平等的原則。從第一五條可見各盟員共和國享有主權，因此在其自己的範圍內，得依照憲法的規定，獨立實施其國家政權。根據憲法第七章，各自治共和國的國家權力機關和管理機關也依照自治原則執行其國家管理。而且，各民族省和民族區同樣可以行使其行政的自治。最後，憲法第一二三條規定：蘇聯公民，不分民族及種族，在經濟生活，國家生活，文化生活，社會及政治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是為確定不變之法律。

（浩培摘譯自蘇聯「莫斯科大學學報」一九五三年第一期）

斯大林與美國帝國主義

W・Z・福斯特

斯大林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對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陣營的局勢，作了精闢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其在政治經濟方面產生的後果，進一步加深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因此，現在有了兩個平行的同時也是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美帝國主義愚蠢地以為對於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實行經濟封鎖，就可以窒殺它們，事實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却扼住了自己的經濟咽喉。

在美帝國主義操縱之下，各資本主義國家正在加緊軍火生產，以彌補它日趨縮小的世界市場。這更是它在政治上經濟上瘋狂的表現。軍火生產的結果勢必降低廣大人民的生活水準，產生大批的失業並使國民經濟破產。尤其壞的是，它必然還要由此走上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道路。

斯大林所指出的關於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正確地表述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特點和要求。正如他所說，美國資本家正用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手段來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潤。這些利潤統統是以軍火生產為基礎的。華爾街壟斷資本家目前圖謀獲得世界霸權的實質，也正是為了要把最大限度利潤的原則推廣運用到世界各地。

斯大林的「國家機關服從於壟斷組織」的理論，在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證明。在他的內閣及政府各部門中任用了大批的大企業代表人，摩根、杜邦和洛克斐勒的壟斷資本集團已取得了對於政府的直接控制。而且在這控制當中，以艾森豪威爾為首的大批軍人也鑽進了政府。這說明戰爭危機和美國的法西斯勢力正在日益滋長。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更因美國帝國主義爭奪資本主義世界霸權而加深，它使資本主義各國間的矛盾更趨尖銳了。關於這一問題，斯大林特別強調了美帝國主義的內在弱點，這就是指反蘇的戰爭同盟。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充滿着矛盾，所以只要有帝國主義存在，帝國主義國家間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就仍然是存在的。

斯大林說明了兩個陣營的和平共處是可能的。共產黨人不要戰爭。只有華爾街壟斷資本家才要戰爭。斯大林又指出了，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在實踐上比兩個陣營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兩個陣營之間的戰爭却不是不可避免的。這當然不是說，美國與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之間沒有嚴重的戰爭危機存在。相反的，美國的首腦人物在他們所代表的壟斷資本家命令之下，正在加速對於蘇聯與其盟國的作戰準備，幻想孤注一擲以逃避其當前的危機。除非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一致起來堅決反對戰爭，好戰的政府就會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們黨的提案正確地指出了防止新的戰爭是工人階級、黑人以及人民的一切民主組織共同一致奮鬥的目標。

這個政策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時局的分析以及我國和全世界人民當前最迫切的需要而訂出來的。在目前，我們必須動員人民羣衆起來一致要求在朝鮮立即停戰，並阻止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等人刼持本屆聯合國大會進行擴大戰爭的陰謀。

（宗遜摘譯自美國「政治評論」雜誌一九五三年二月號）

斯大林與蘇聯青年

Б・巴雅諾夫

斯大林是蘇聯青年的偉大的領袖、父親和導師。他熱愛青年，認爲「青年就是我們的將來，我們的希望」。他關懷着年青的一代，教育着他們，使他們成爲共產主義社會的堅毅的建設者。

和列寧一起，斯大林締造了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十月革命前夕，在斯大林的直接領導下召開了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當時準備武裝起義的工作正在極端緊張地進行着，但列寧和斯大林仍然關心到青年工作，使大會通過了關於青年組織的重要決議，這一決議奠定了共青團的基礎。

共青團從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其全部活動都與列寧斯大林的名字緊密地聯繫着。

列寧和斯大林確定了共青團的階級性質、它與黨的關係、它在蘇維埃國家體系中的地位、它在廣大青年羣衆中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所起的作用等。

共青團是非黨的羣衆性組織，在它的隊伍中團結着廣大的先進工農青年。團是黨的最主要的助手之一，也是黨的後備力量。它團結青年，教育青年，把優秀的團員輸送入黨，不斷地壯大着黨的隊伍。

斯大林非常關心共青團幹部的培養問題。他指出：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提高思想水平，培養頑强戰鬥的精神，不驕不餒，面對困難，力求克服。必須培養對新事物的敏感，這是每一個共產主義者必須具備的品質。共青團幹部必須密切聯繫羣衆，與羣衆的任何隔離都將使他們所面臨的任務無法完成。

列寧和斯大林認爲教育青年是國家最重要的事業之一。由於他們不倦的關懷，在蘇聯爲教育青年創造了一切必要的條件。

斯大林要求也相信青年會成爲人類一切最崇高的品質的體現者。他向青年們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指示，他教導青年要無限地熱愛和忠誠於祖國、黨、人民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把這些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終身爲共產主義戰鬥到底。應該有這種明確的目的和爲達到這一目的所作的有意識的努力。要勇敢、沉毅、堅定，像列寧一樣，在戰鬥中永不恐懼動搖。充分地估計並深信自己的和蘇個人民的無敵力量。要培養社會主義勞動態度，並且要熱愛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具體工作與整個革命事業統一起來，踏實而創造性地勞動。要積極學習，永不滿足已有的成績，努力爭取更大的勝利。

資本主義包圍仍然存在，帝國主義的死期愈近，則其掙扎亦必愈加瘋狂。每一個公民，每一個青年都要提高政治警惕性，堅決與一切麻痺情緒和太平觀念進行鬥爭。

蘇聯青年決不會辜負斯大林的教導。他們正沿着列寧和斯大林所指示的勝利的大道邁進。他們宣誓：「斯大林的名字是我們的旗幟，我們的太陽；斯大林的學說是我們的無敵武器；斯大林的事業是我們生活的目的；斯大林的生活與鬥爭是我們不朽的榜樣。」

（錦棠摘譯自蘇聯「青年共產黨人」雜誌一九五三年四月號）

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奠基石

И・布留明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巨大勝利的環境下，國際工人階級和全體進步人類紀念馬克思逝世七十週年。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在揭示並論證工人階級的革命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最偉大的科學發現，就是創造剩餘價值的理論。列寧說：「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主要基石。」恩格斯在馬克思墳前的演說，把剩餘價值論和馬克思發現人類歷史發展法則，即歷史唯物主義的學說並列。

資產階級的古典經濟學家，縱然早就注意到資本主義利潤、借貸利息、地租，即剩餘價值的各種變形的問題，也不能創造出剩餘價值論來。本質上，利潤與地租是未償付的勞動這一事實，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已經近於瞭解了。但是他們既不能正確地說明這個原理，也不能使這個原理成爲了解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法則的出發點。他們不僅不能解決剩餘價值的問題，並且不能正確地提出這個問題，甚至還要避談這個問題。馬克思說：「里嘉圖自己從來沒有要考慮剩餘價值的起源。他視此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物。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的自然形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能提出並解決剩餘價值問題的原因，在於他們爲本階級的利益所限制着。

只有馬克思才能創造剩餘價值的理論。只有無產階級這一革命階級，這一代替資本主義的、新的、進步的生產方式代表者的思想家，才能揭發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才能以剩餘價值論對資本主義制度給以無情的和眞正科學的批評。所以剩餘價值論是無產階級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說明了剩餘價值論在馬克思經濟學說中所佔的重要地位。斯大林指出，最適合於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這個概念的，是剩餘價值法則，即資本主義利潤的產生和增殖的法則。這個法則眞正預先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特點。但剩餘價值法則是過於一般的法則。它沒有涉及最高利潤率的問題，而保證這種利潤率，却是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斯大林爲了彌補這個缺陷，把剩餘價值法則具體化，使它進一步地發展以適應於壟斷資本主義的條件，因爲壟斷資本主義所要求的，不是隨便什麼利潤，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潤。斯大林對剩餘價值論作了新的闡揚，更深刻地分析了剩餘價值的涵義。斯大林特別强調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及其所服從的任務這一問題的意義。解決這個問題是了解剩餘價值法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起着決定作用的鎖鑰。

（從周摘譯自蘇聯「經濟問題」雜誌一九五三年三月號）

發展生產力的主要的推動力

Ф·B·康士坦丁諾夫

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發生和不斷解決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問題，它們的相互關係、相互適應、彼此矛盾和衝突的問題，在歷史唯物主義中佔着最重要的地位。

歷史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相反，它能看見社會生產的變化、發展中社會發展的最深刻的原因。社會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過程。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結構、決定它的面貌。生產方式的改變，引起整個社會制度、社會觀點、政治法律及其他制度的改變。爲什麼生產方式本身要發生改變呢？這種改變總是爲生產力的改變所決定的。新的生產力和落後的衰亡的生產關係的衝突，是社會革命——連社會主義革命也在內的最深刻的經濟基礎。社會發展的原因，是隱藏在生產力發展之中的。

用什麼來決定社會生產力本身的發展呢？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源泉、主要的推動力在那裏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壟斷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法則作了全面的分析。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剩餘價值的生產，資本積累，乃是壟斷前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強有力的推動力。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指出，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它就一天天加深了寄生性和腐朽性。衰亡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發展途徑中主要的有決定性的障碍物。所以，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並以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來代替它，生產力才能繼續向前發展。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相反，它是生產關係完全適應於生產力的例證。在蘇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保證了生產力發展的最大的可能性。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理論，明確地指出了作爲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的新生產關係的決定作用，全面論證並指出了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性質相適應的客觀的經濟法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佔有制，空前地提供了實現自覺的、有計劃的大規模改造自然界的可能性。社會主義的生產，服從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所起的作用，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表現着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這乃是社會主義生產最強大的推動力，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推動力。生產關係不斷地鞏固和改善，生產關係與日益增長着和不斷變化着的生產力相適應，——乃是進一步順利推動我們的社會走向共產主義的條件之一。

（石光摘譯自蘇聯「哲學問題」雜誌一九五三年第一期）

論中國人民民主的性質

B·馬斯林尼科夫

斯大林指示中國革命的特點，是中國革命較普通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更爲廣泛，而且一開始就超過了它的範圍。中國革命的實踐，充分證明了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性質、特點、前途及動力的分析的正確性。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千百萬農民羣衆參加革命，不僅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且也把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在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旗幟下。工人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作用，保證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工人階級在人民民主專政國家中的領導作用，是保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沿着非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決定條件。中國革命已經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在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領導權，普通是屬於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權是屬於工人階級。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後通常是建立自己的專政，摧毀國內的民主運動。而無產階級在中國卻是領導了革命和其他民主階級掌握政權，以便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任務。中國人民民主專政這種政權形式，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時就預料到了。

中國的人民政權，依據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經濟法則，沒收了屬於反動國民黨買辦集團及日寇在華的財產，轉交人民國家之手。它廢除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把土地轉交給農民，變封建與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爲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中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的生產，擺脫了價值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但是價值法則通過流通過程也影響於國營企業的生產。這是因爲國營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也作爲商品銷售到廣大的市場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價值法則發生作用的影響，雖然大部分生產資料脫離了這種過程。此外，有些原材料（其價值包括在國營工業生產費用之內）也通過流通過程進入國營企業。因此不考慮到價值法則，國營企業便不能解決經濟核算、贏利率、產品成本核算、價格和價格比率等問題。

歐洲人民民主國家解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需要較短的時間，就能着手社會主義建設。但要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就需要較多的時間，因爲中國過去是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於歐洲人民民主國家，並且現在中國人民還必須進行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武裝鬥爭。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國家在根本改造中國經濟，消滅中國農村的舊生產關係，建立工農業中的新生產關係，進行了巨大的努力。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積極活動，加快了中國生產力恢復和發展的速度和鞏固了人民民主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巨大的經濟成就，是自由中國人民創造力量高漲和勞動熱情澎湃的明證，是人民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和中蘇兩國人民偉大友誼蓬勃發展的標誌。

（從周摘譯自蘇聯「經濟問題」雜誌一九五三年三月號）

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制度的並存

И·A·謝列茲湼夫

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展開的強大的全世界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戰、保衞和平的運動，是一個廣泛的羣衆性的民主運動。和平擁護者認爲：和平是可以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並存的基礎上保持着的。爲了作到這一點，就要使各資本主義國家現存的政府實行與社會主義國家合作的

這個政策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時局的分析以及我國和全世界人民當前最迫切的需要而訂出來的。在目前，我們必須動員人民羣衆起來一致要求在朝鮮立即停戰，並阻止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等人刼持本屆聯合國大會進行擴大戰爭的陰謀。

（宗遜摘譯自美國「政治評論」雜誌一九五三年二月號）

斯大林與蘇聯青年

Б・巴雅諾夫

斯大林是蘇聯青年的偉大的領袖、父親和導師。他熱愛青年，認爲「青年就是我們的將來，我們的希望」。他關懷着年青的一代，教育着他們，使他們成爲共產主義社會的堅毅的建設者。

和列寧一起，斯大林締造了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十月革命前夕，在斯大林的直接領導下召開了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當時準備武裝起義的工作正在極端緊張地進行着，但列寧和斯大林仍然關心到青年工作，使大會通過了關於青年組織的重要決議，這一決議奠定了共青團的基礎。

共青團從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其全部活動都與列寧斯大林的名字緊密地聯繫着。

列寧和斯大林確定了共青團的階級性質、它與黨的關係、它在蘇維埃國家體系中的地位、它在廣大青年羣衆中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所起的作用等。

共青團是非黨的羣衆性組織，在它的隊伍中團結着廣大的先進工農青年。團是黨的最主要的助手之一，也是黨的後備力量。它團結青年，教育青年，把優秀的團員輸送入黨，不斷地壯大着黨的隊伍。

斯大林非常關心共青團幹部的培養問題。他指出：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提高思想水平，培養頑强戰鬥的精神，不驕不餒，面對困難，力求克服。必須培養對新事物的敏感，這是每一個共產主義者必須具備的品質。共青團幹部必須密切聯繫羣衆，與羣衆的任何隔離都將使他們所面臨的任務無法完成。

列寧和斯大林認爲教育青年是國家最重要的事業之一。由於他們不倦的關懷，在蘇聯爲教育青年創造了一切必要的條件。

斯大林要求也相信青年會成爲人類一切最崇高的品質的體現者。他向青年們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指示，他教導青年要無限地熱愛和忠誠於祖國、黨、人民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把這些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終身爲共產主義戰鬥到底。應該有這種明確的目的和爲達到這一目的所作的有意識的努力。要勇敢、沉毅、堅定，像列寧一樣，在戰鬥中永不恐懼動搖。充分地估計並深信自己的和整個人民的無敵力量。要培養社會主義勞動態度，並且要熱愛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具體工作與整個革命事業統一起來，踏實而創造性地勞動。要積極學習，永不滿足已有的成績，努力爭取更大的勝利。

資本主義包圍仍然存在，帝國主義的死期愈近，則其掙扎亦必愈加瘋狂。每一個公民，每一個青年都要提高政治警惕性，堅決與一切麻痺情緒和太平觀念進行鬥爭。

蘇聯青年決不會辜負斯大林的教導。他們正沿着列寧和斯大林所指示的勝利的大道邁進。他們宣誓：「斯大林的名字是我們的旗幟，我們的太陽；斯大林的學說是我們的無敵武器；斯大林的事業是我們生活的目的；斯大林的生活與鬥爭是我們不朽的榜樣。」

（錦棠摘譯自蘇聯「青年共產黨人」雜誌一九五三年四月號）

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奠基石

И・布留明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巨大勝利的環境下，國際工人階級和全體進步人類紀念馬克思逝世七十週年。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在揭示並論證工人階級的革命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最偉大的科學發現，就是創造剩餘價值的理論。列寧說：「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主要基石。」恩格斯在馬克思墳前的演說，把剩餘價值論和馬克思發現人類歷史發展法則，即歷史唯物主義的學說並列。

資產階級的古典經濟學家，縱然早就注意到資本主義利潤、借貸利息、地租，即剩餘價值的各種變形的問題，也不能創造出剩餘價值論來。本質上，利潤與地租是未償付的勞動這一事實，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已經近於瞭解了。但是他們既不能正確地說明這個原理，也不能使這個原理成爲了解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法則的出發點。他們不僅不能解決剩餘價值的問題，並且不能正確地提出這個問題，甚至還要避談這個問題。馬克思說：「里嘉圖自己從來沒有要考慮剩餘價值的起源。他視此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物。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的自然形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能提出並解決剩餘價值問題的原因，在於他們爲本階級的利益所限制着。

只有馬克思才能創造剩餘價值的理論。只有無產階級這一革命階級，這一代替資本主義的、新的、進步的生產方式代表者的思想家，才能揭發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才能以剩餘價值論對資本主義制度給以無情的和眞正科學的批評。所以剩餘價值論是無產階級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說明了剩餘價值論在馬克思經濟學說中所佔的重要地位。斯大林指出，最適合於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這個概念的，是剩餘價值法則，即資本主義利潤的產生和增殖的法則。這個法則眞正預先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特點。但剩餘價值法則是過於一般的法則。它沒有涉及最高利潤率的問題，而保證這種利潤率，却是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斯大林爲了彌補這個缺陷，把剩餘價值法則具體化，使它進一步地發展以適應於壟斷資本主義的條件，因爲壟斷資本主義所要求的，不是隨便什麼利潤，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潤。斯大林對剩餘價值論作了新的闡揚，更深刻地分析了剩餘價值的涵義。斯大林特別强調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及其所服從的任務這一問題的意義。解決這個問題是了解剩餘價值法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起着決定作用的鎖鑰。

（從周摘譯自蘇聯「經濟問題」雜誌一九五三年三月號）

發展生產力的主要推動力

Φ·B·康士坦丁諾夫

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發生和不斷解決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問題，它們的相互關係、相互適應、彼此矛盾和衝突的問題，在歷史唯物主義中佔着最重要的地位。

歷史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相反，它能看見社會生產的變化、發展中社會發展的最深刻的原因。社會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過程。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結構、決定它的面貌。生產方式的改變，引起整個社會制度、社會觀點、政治法律及其他制度的改變。爲什麼生產方式本身要發生改變呢？這種改變總是爲生產力的改變所決定的。新的生產力和落後的衰亡的生產關係的衝突，是社會革命——連社會主義革命也在內的最深刻的經濟基礎。社會發展的原因，是隱藏在生產力發展之中的。

用什麼來決定社會生產力本身的發展呢？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源泉、主要的推動力在那裏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壟斷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法則作了全面的分析。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剩餘價值的生產，資本積累，乃是壟斷前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强有力的推動力。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指出，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它就一天天加深了寄生性和腐朽性。衰亡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發展途徑中主要的有決定性的障碍物。所以，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並以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來代替它，生產力才能繼續向前發展。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相反，它是生產關係完全適應於生產力的例證。在蘇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保證了生產力發展的最大的可能性。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理論，明確地指出了作爲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的新生產關係的決定作用，全面論證並指出了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性質相適應的客觀的經濟法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佔有制，空前地提供了實現自覺的、有計劃的大規模改造自然界的可能性。

社會主義的生產，服從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所起的作用，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表現着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這乃是社會主義生產最強大的推動力，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推動力。生產關係不斷地鞏固和改善，生產關係與日益增長着和不斷變化着的生產力相適應，——乃是進一步順利推動我們的社會走向共產主義的條件之一。

（石光摘譯自蘇聯「哲學問題」雜誌一九五三年第一期）

論中國人民民主的性質

B·馬斯林尼科夫

斯大林指示中國革命的特點，是中國革命較普通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更爲廣泛，而且一開始就超過了它的範圍。中國革命的實踐，充分證明了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性質、特點、前途及動力的分析的正確性。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千百萬農民羣衆參加革命，不僅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且也把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在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旗幟下。工人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作用，保證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工人階級在人民民主專政國家中的領導作用，是保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沿着非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決定條件。中國革命已經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在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領導權，普通是屬於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權是屬於工人階級。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後通常是建立自己的專政，摧毀國內的民主運動。而無產階級在中國卻是領導了革命和其他民主階級掌握政權，以便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任務。中國人民民主專政這種政權形式，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時就預料到了。

中國的人民政權，依據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經濟法則，沒收了屬於反動國民黨買辦集團及日寇在華的財產，轉交人民國家之手。它廢除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把土地轉交給農民，變封建與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爲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中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的生產，擺脫了價值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但是價值法則通過流通過程也影響於國營企業的生產。這是因爲國營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也作爲商品銷售到廣大的市場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價值法則發生作用的影響，雖然大部分生產資料脫離了這種過程。此外，有些原材料（其價值包括在國營工業生產費用之內）也通過流通過程進入國營企業。因此不考慮到價值法則，國營企業便不能解決經濟核算、贏利率、產品成本核算、價格和價格比率等問題。

歐洲人民民主國家解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需要較短的時間，就能着手社會主義建設。但要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就需要較多的時間，因爲中國過去是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於歐洲人民民主國家，並且現在中國人民還必須進行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武裝鬥爭。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國家在根本改造中國經濟，消滅中國農村的舊生產關係，建立工農業中的新生產關係，進行了巨大的努力。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積極活動，加快了中國生產力恢復和發展的速度和鞏固了人民民主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巨大的經濟成就，是自由中國人民創造力量高漲和勞動熱情澎湃的明證，是人民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和中蘇兩國人民偉大友誼蓬勃發展的標誌。

（從周摘譯自蘇聯「經濟問題」雜誌一九五三年三月號）

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制度的並存

И·A·謝列茲涅夫

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展開的強大的全世界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戰、保衛和平的運動，是一個廣泛的羣衆性的民主運動。和平擁護者認爲：和平是可以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並存的基礎上保持着的。爲了作到這一點，就要使各資本主義國家現存的政府實行與社會主義國家合作的

政策。如果這些政府不這樣作，那末，這些政府就應該由各民主政黨聯盟的政府來代替它們。所以現在的保衞和平運動，其目的並不是要推翻這個資本主義制度，這個運動不是社會主義的性質，而是一種民主主義的運動。

在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各國人民之間擴大和鞏固世界經濟、政治與文化聯繫的趨勢，是歷史的規律。在資本主義時代各國人民之間經濟、政治、文化及其他聯繫的發展，具有非常廣泛的性質。在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時代——國際經濟、政治、民族、文化及其他的聯繫更爲擴大。壟斷資本集團奪取世界霸權的企圖，總是以崩潰瓦解來結束。只有現代社會最前進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才能眞正地在各國人民自願平等的基礎上解決這個組織統一的世界經濟的進步的任務。

列寧根據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所作的深刻的分析，得出了社會主義能夠首先在一國獲得勝利的結論。列寧和斯大林指示說：統一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形成，是一個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長期的發展過程，是各資本主義國家逐漸脫離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加入到日益增長日益鞏固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過程。在統一的世界共產主義經濟體系形成的過程中，必然地要有一個行將退出歷史舞台的資本主義和日益生長日益鞏固的共產主義或長或短的並存時期。如果認爲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相反的兩極、是對立的相互排斥的兩面就應該不斷地處於相互流血鬥爭的狀態，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只有和平的敵人、戰爭販子或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本質的人和死啃書本的人才這樣說的。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說，組織蘇維埃國家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合作的眞實基礎，是輸出和輸入。各社會主義國家輸出和輸入的結構，是以這些國家具體的歷史發展階段、以它們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以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來決定的。列寧和斯大林一再指出：社會主義國家願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和一切的國家進行貿易和經濟上的合作。隨着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經濟關係的可能性是越來越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經濟突飛猛進的提高，已爲蘇聯和其他國家擴大貿易經濟關係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美國、英國和法國所實行的對各民主國家的封鎖政策，其結果並沒有像美國統治者所期望的那樣，使各民主國家的情況惡化，而相反地，却鞏固了新的民主世界市場。帝國主義者的封鎖嚴重地打擊了他們自己的輸出和加強了他們之間的市場競爭。資本主義國家的廣大人民由於這種困窘而處於萬分不安的境地，並正在從既成的僵局中尋求出路。一九五二年四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經濟會議，已經指出了資本主義世界所處的經濟困境的出路。這個唯一的出路就是調整各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陣營中各國間全面的貿易經濟關係。

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主要地是力求和平與各國人民在平等互助的基礎上的友誼與合作。蘇聯與各人民民主國家間的相互關係，是建築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堅實基礎之上的，是建築在這些國家的人民兄弟般互助的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和平共處及其在民主原則上全面合作的條件，不僅完全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人民的利益相一致，而且也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爲了不辜負全世界人民的希望，防止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必須經常地提高警惕，積極加強蘇維埃國家的國防和準備給予任何侵略者以粉碎性的打擊。

（石光摘譯自蘇聯「哲學問題」雜誌一九五三年第一期）

兩個世界市場與現代國際法

К·Я·契茹夫

世界分爲兩個陣營和兩個市場的結果，在對待國際法的問題上，現在較之任何過去的時期，更鮮明地顯示出兩種相反的態度。在組成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和其他民主國家間，在尊重國際法的基礎上、以及在眞誠地努力於鞏固並發展國際關係的民主原則和規範、以促成各民族間眞正的合作和堅固持久的和平的基礎上，建立了完全新的關係。在組成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間，美國的統治集團以及英、法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中支持他們的統治頭子則實行了以破壞現代國際法、以不法和帝國主義的掠奪代替法律爲目標的那種政策。

國際關係的基本概念或原則構成現代國際法的基礎和實質：這些概念或原則是：主權的原則、不干涉國家內政的原則、平等的原則、善意履行國際條約的原則、保衞世界和平的原則。

蘇聯承認這些基本概念或原則，它在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嚴格地遵循它們，而且爲了鞏固它們，它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共同進行了不懈的鬥爭。蘇聯的這種行動是以列寧和斯大林關於兩個制度並存的學說爲基礎的。在國際舞台上兩個陣營和兩個市場的成立雖然限制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間的交往，但是絕不排除它們之間的經濟、政治和其他關係，大多數的現代國家，不論它們的社會制度怎樣，在現階段的經濟發展上，與其周圍的國家保持經常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其他關係，而不孤立於其他國家之外，是自然和正常的。既然承認經濟制度不同的各國和平共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就須假定調節這些國家間關係的國際法規則也有存在的必要。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和民主規範是符合於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和期望的。

但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總是違反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在資本主義制度形成的時期，主權的原則、不干涉國家內政的原則以及平等的原則會被資產階級宣示過並被他們用作法律的基礎和標誌，以集合廣大的勞動人民大衆到他們方面，來進行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雖然全體資本主義國家曾經把這些民主的原則承認爲國際法的原則，但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弱小的民族已經不遵循它們了，而在它的後期即帝國主義時期，這些原則的違反成爲帝國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最主要的特徵。美、英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經濟擴張、組織侵略戰爭和奴役其他民族的帝國主義政策是明顯地違反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的。

在組成社會主義和民主陣營的國家間，善意履行國際條約的原則，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也被嚴格地遵循着。但是美國以及英、法兩國中支持美國的當權集團所採取的侵略政策也明白地違反了這個原則。美國政府，在英、法兩國政府的直接支持之下，違反雅爾達和波茨坦協定，拒絕了與德國簽訂和約，並拒絕了把它恢復成一個統一的、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這些政府分裂了德國，製造了傀儡的波恩國家，與它簽訂了單獨的一般軍事條約，並使西德成爲美國在歐洲侵略的軍事基地。美國政府，違反以前所負担的義務，在舊金山扮演了一個「和會」，並與日本簽訂了一個單獨的「和約」和「安全條

約」，藉以鞏固其對於它的佔領，並把它變爲美國在遠東的一個主要軍事基地。而且，美國政府還違反其由於開羅宣言所自願承担的義務，佔領了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可分部分的台灣島。相反，蘇聯的嚴格地履行雅爾達和波茨坦協定以及開羅宣言是它善意履行國際條約的顯著例子。

美、英、法三國爲了組織新的侵略戰爭所實施的戰後全部政策，是嚴重地違反保衛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原則的。這個原則是蘇聯首先提出來的，它現在已經成爲公認的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美國的統治集團違反這個原則，而組成了侵略的北大西洋集團，在朝鮮發動了侵略戰爭，把原來作爲保衛和平與安全而建立起來的聯合國變成新的侵略戰爭的機構。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綫則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保障堅固持久的世界和平並發展國際合作。蘇聯政府，在和平民主國家的政府的積極支持之下，屢次提議裁減軍備，禁止使用原子能於戰爭目的，禁止戰爭宣傳及中、蘇、美、英、法五國締結和平公約。但是美、英、法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拒絕蘇聯政府的這些和平提議。

社會主義陣營將發展和鞏固，而現代國際法原則的適用範圍也將隨之擴大。

（江左摘譯自蘇聯「蘇維埃國家與法律」雜誌一九五三年第一期）

科學——爲了人的福利

A·涅斯米揚諾夫

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科學是具有偉大作用的。眞正的科學，其目的是爲人們造福的。蘇維埃科學服務於人民的利益，促進人民物質福利和文化的高漲，幫助人民更加充分地和更好地利用自然的富源和力量來造福人羣。

我們的學者辛勤勞動，不是爲了破壞，而是爲了建設，爲了保證人類的幸福。爲人們的生活和健康而奮鬥，便是他們的研究目的。科學的成就在我們這裏是用來減輕人的勞動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繁重工作的廣泛機械化，國民經濟的自動化、電氣化和化學化，是建立在先進蘇維埃科學的成就基礎之上的。

由於大規模的理論研究以及經由科學與實踐的創造性合作來總結生產經驗，高度的技術才得以建立起來。爲了保證明天技術的發展，必須研究各種知識領域的根本理論問題。科學的進步和技術的進步是密切相關和互爲因果的現象。

蘇聯科學院根據列寧、斯大林關於生產力發展和分佈的學說，實行國內一系列廣大地區地下資源的綜合勘查。對有用的礦物、植物和動物界、氣候、土壤等等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探討建立新工業中心的科學原理，得出發展農業和運輸的根據，研究綜合掌握新區的問題。

重大的任務也擺在人文科學方面的學者們面前。蘇聯社會的文化增長乃是準備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基本先決條件之一。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揭露那些與辯證唯物主義背道而馳的理論和觀點，對於培養共產主義世界觀說來，是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

斯大林的天才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問世，替經濟科學的發展和高漲開闢了新的遠景。

現在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科學研究工作正針對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性的研究，探究與實現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有關的問題。

在哲學、歷史學、語言學方面，已準備進行一系列的重大研究。六卷本的「莫斯科史」，第一卷業經出版。諾夫哥羅得和花剌子模兩地的考古隊獲得了新的卓越的發現。

蘇維埃文化高舉着和平與各民族友好的旗幟，對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形成，對全人類文明的發展，給予着良好的影響。

蘇聯科學院非常重視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它逐年擴大着自己跟一切國家的國際科學聯繫。

我們認爲，各國學者之間的相互瞭解和實際的科學聯繫是能夠不依社會制度、政治見解和宗教信仰爲轉移而得到發展的。我們熱忱接待外國學者和派遣自己的代表參加包括在資本主義國家召開的科學代表大會和科學會議。蘇聯學者出席這些大會，報告自己的研究工作，並以極大興趣傾聽我們外國同人的報告和發言。

我們和偉大中國、各新民主國家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科學家和文化活動家的友好聯繫、交流經驗、相互幫助與經常的科學合作，特別迅速地增長，並且往後還要更加擴大發展。

我們遵循列寧和斯大林所指示的道路把蘇維埃科學向前推進，我們看到擺在自己面前的一個偉大目的——建設共產主義。蘇聯學者跟我們多民族國家的各族人民一起，爲國民經濟之新的强大高漲、爲蘇聯人民物質福利和文化的進一步增長而奮鬥。

（葉萌摘譯自蘇聯「消息報」一九五三年四月三十日）

蘇聯歷史科學的迫切問題

A·潘克拉托娃

由於黨和政府不斷的關懷，蘇聯歷史家近年來獲得了一定的成就。研究工作的重心，已轉移到生產的歷史、物質資料生產者的歷史、人民的歷史領域裏來。但是，整個說來，歷史戰綫上的情況，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領導同志，在改造自己的工作方面，做得很遲緩。他們集中了主要力量來鑽研封建制度的問題，而對於蘇維埃社會史、世界現代史和人民民主國家史的一些現實問題，却沒有保證完成最重要的任務。

研究蘇維埃社會史，在科學和實踐上，都是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但直到現在，在歷史家的著作中，對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中、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中的作用這類重大問題，還沒有得到多方面的深刻的科學闡述。相反，在這些著作中，仍存在着一些主觀唯心主義的錯誤。例如基穆教授認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自覺的法則」和「預計的、富有目的性的法則」是佔着統治地位的。他完全否認了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客觀性質。

蘇維埃社會史的許多作者，都不大注意研究無產階級專政確立的經濟前提。斯大林指出，蘇維埃政權所以在我國獲得勝利，是因爲它依靠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經濟法則，某些作者造成嚴重的主觀主義錯誤，他們在說明蘇維埃社會和國家的發展時，竟離開了黨的政策所依據的客觀經濟法則。例如，他們沒有考慮到，農業集

體化政策是以瞭解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法則的實質爲出發點的。此外，有些歷史家也沒充分估計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意義和作用。

歷史家對於無產階級從被剝削被壓迫階級變成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完全嶄新的社會階級，變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創造者和組織者階級這個重大問題，也沒有足夠的研究，歷史家還應認眞注意工農聯盟這一新的社會力量的形成過程以及工農聯盟變爲工農友愛的事實。必須指出新的經濟的、社會政治的和思想的條件，怎樣在我國形成了蘇維埃社會的新動力：精神和政治上的一致、蘇維埃愛國主義和民族的友愛。蘇聯歷史家也應根據豐富的具體材料，研究社會主義各民族形成的過程，指明這種過程的結果及其偉大歷史意義。

在世界現代史的研究方面，我們也做的很差。直到今天，還沒有眞正像樣的科學著作問世，因而未能揭示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世界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未能根據大量的實際材料，做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個體系競賽的總結，表明社會主義勢力一往直前的增長和資本主義的不斷削弱。

深刻地瞭解列寧—斯大林關於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理論，是有助於蘇聯歷史家來研究資本主義各國的政治和經濟情況的。這裏必須注意一個事實，即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瓦解的日益加劇和脫離資本主義的各國—蘇聯、中國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經濟威力的日益增强，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基礎。至於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法則，那也是必須極力加以揭露的。因此，歷史家應該注視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瓦解，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的瓦解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加深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在研究這些問題的同時，不可忘記列寧和斯大林關於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可能和平共處的指示。蘇聯什麼時候也不拒絕與資本主義各國在事務上的合作。當揭示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時，蘇聯歷史家應該更多地注意研究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並指出蘇聯一貫爲和平及各國人民的集體安全而鬥爭的事實。

從事研究現代史問題的科學工作者，必須加强研究世界革命運動和工人運動的歷史，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主義和民主陣營形成的歷史，研究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鬥爭的歷史，以及人民民主各國和在這些國家中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研究世界史，現代史，歐洲人民民主國家和偉大中國的歷史，朝鮮人民、越南人民及其他東方各國人民的解放鬥爭史，是能夠幫助蘇聯人和國際友人更好地瞭解蘇聯在全世界歷史上的作用以及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國際意義的。而這個勝利的鼓舞者和組織者，則是光榮的蘇聯共產黨。

（亞明摘譯自蘇聯「共產黨人」雜誌一九五三年第六期）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決議的啓示下的語言學問題

B·B·維諾格拉多夫

斯大林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首先强調科學法則的客觀性質，這一原理對於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有直接的關係。語言科學的規律反映語言發展中不依人們意志爲轉移的客觀歷史過程，這一規律的知識可以幫助社會更好地處理語言標準化問題，估計民族語言發展中各種過程的調整和支配的可能性、方法和性質。

斯大林指出，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來看待問題，把內容和形式、把深處的發展過程和表面現象嚴格地區別開來，那就可以得出一個唯一正確的結論。語言學家應該深入對語言、對它的形式和內容，對它的範疇和功能、對它的活的規律性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嚴格地分淸楚語言中活的發展着的東西和死亡着的東西。

斯大林指出，社會形態只能有某一個基本經濟法則，這一點提醒我們注意到各種語言發展內部規律中的相互關係和比重，以及在某一歷史時期有一個語言發展的基本內部規律的存在問題。

研究語言發展的客觀歷史規律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中心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學跟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語言學不同的地方。

斯大林指出了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發展規律，指出了消滅城市和鄉村、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本質差別的具體內容，對於我們研究社會主義民族語言的發展規律、研究方言土語消磨爲全民族語言的途徑和方法、研究各種職業者所用的詞彙和術語的差異、研究文學語言中書面語和口語的差異問題等，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斯大林指出大城市不僅不會滅亡，而且還要出現新的，成爲文化最發達的中心。這不能不影響鄉村裏存在的方言土語的命運，增加民族文學語言的文化教育作用。斯大林指出，用提高工人文化技術水平到技術人員水平的辦法來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間的本質差別，這對於語言和語言文體的豐富和發展有特別重要的作用。

斯大林指出，「換貨」這個名詞是不妥當的，要用「產品交換」來代替它。因此我們需要建立民族語言的新的、明確的術語，尤其是社會科學方面的術語，放棄不妥當的、不正確的、陳舊了的術語。

在馬林科夫同志的報告中指出普通語言學的兩個中心問題（一）作爲社會發展工具的語言問題，（二）民族文化和語言的進一步發展的前途和規律性問題。語言是社會發展工具的問題，在人民歷史，社會歷史中決定性的轉折點中常常是非常尖銳的。這在現代中國和越南就可以看出。

現代帝國主義統治者企圖在被侵略地方推行人工製造的「國際的」「基本英語」和「基本法語」。這種語言是注定不能成爲民族文化的形式和社會發展的工具的。

馬林科夫同志的報告中强調必須在社會生活和科學的一切部門中加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我們也必須在普通語言學中對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觀點和觀念，對馬爾的「新語言學」的殘餘等等進行鬥爭。

（楚南摘譯自蘇聯「語言學問題」雜誌一九五三年第一期）

新書簡介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

加克著　崔平譯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四月初版
二五開　五二頁　定價二、四〇〇元

本書是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的集體著作「歷史唯物論」的第八章。內容主要分五個部分：一、社會革命是由一種社會經濟形態過渡到另一種的規律；二、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四、革命勝利的客觀和主觀條件；五、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

作者首先對社會革命的原因、一切革命的主要問題、革命的性質和動力等，扼要地加以說明。接着，以大部分篇幅，論述了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作者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使命，就是消滅人對人的一切剝削。它的歷史意義，以及它同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根本區別就在這裏。而社會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勝利，首先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正確領導。最後，作者在闡述了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首先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的學說、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意義之後，特別強調說：「所有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的黨，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就應當在自己的行動中依靠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

這一本書，對於我們的理論學習，是有幫助的。

捻軍

中國史學會主編
神州國光社一九五三年四月初版
二五開　共六册　二八七六頁
定價一三〇、〇〇〇元

本書是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三種。全書六册，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專著綜合」，收錄王闓運的「平捻篇」等六篇，附錄方玉潤的「星烈日記彙要」等二十九篇；第二部分是「活動地區」，收錄尹耕雲等的「豫軍紀略」、各縣縣志等二〇九篇；第三部分是「函牘文集」，收錄吳式芬等的「瑛蘭坡藏名人尺牘」，袁甲三的文集等五十五篇。由於革命方面的文獻和記述，在當時是很少有的，所以，書中所收錄的資料，都是出自反動統治階級之手的。因此，本書編審委員會在「說明」中，特別提醒讀者，「必需從它的反面看，從它的自相矛盾處看，從它的偶爾流露實情上看，從它的得意忘形供認罪行時看，小心謹愼地，避免受它的欺騙，這樣，革命的眞實情形，大體上還是可以看出來的」。

大家知道，捻軍是北方農民的大規模武裝起義，也是太平天國革命在北方的再起，因此，研究太平天國革命，就一定要研究捻軍的活動。而有關捻軍的資料，在這部書中，可以說都搜羅進去了。

美帝國主義經濟侵華史論叢（一）

史學週刊社編
三聯書店一九五三年三月初版
三二開　一三〇頁　定價四、一〇〇元

本書共收輯了六篇文章，目的在於說明中日甲午戰後到「五四」愛國運動前美帝國主義對我國鐵路權益的掠奪。第一篇「美帝國主義對華投資的歷史發展及其侵略性」，概括地敍述了美國獨立後到我國辛亥革命前（一七八四年—一九一四年）這一百三十年間美帝國主義對我國經濟侵略的發展過程，從而也揭穿了它對中國侵略的一連串的陰謀。其餘五篇的內容，主要是論述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一年美帝國主義企圖掠奪我國鐵路權益的經過。原來盧漢、津鎮、錦璦、川漢各路，特別是粵漢路，在當時，都是美帝國主義奪取的目標。

本書依據比較可靠的材料，系統地說明了美帝國主義在這一時期對我國侵略的經過。不僅使我們認識到，美帝國主義在很早以前，就已成爲中國人民的死敵；同時，從這些材料中，也使我們清楚地看出，各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以及滿淸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者的勾結。

本書雖然在輯錄的文字中，有某些不妥之處，但還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達爾文與米丘林生物學

努日金著　王爵淵譯
中國科學院一九五三年三月初版
二五開　四二頁　定價三、〇〇〇元

本書是努日金博士在蘇聯科學院紀念達爾文逝世七十周年大會上的一篇講話。主要是論述有關生物學的四個問題：一、變異性的問題；二、遺傳性的問題；三、雜交的問題；四、泛生論的假說。

作者詳盡地說明了達爾文學說在生物科學發展上的巨大貢獻，指出了達爾文學說的兩個最重要的原理：第一、一個種由另一個種起源的學說；第二、自然的選擇與人工選擇的學說。但達爾文學說也有它的錯誤部分，即達爾文接受了馬爾薩斯學說的公式，把種內鬥爭作爲自然選擇的基礎，過分估計了選擇的作用。蘇聯先進的米丘林生物學，批判了並拋棄了達爾文學說中的錯誤觀念，接受了並發展了達爾文學說中的唯物主義的核心部分，把達爾文學說發展成爲最高的階段——創造性的達爾文主義，徹底粉碎了反動的魏斯曼、摩爾根主義的謬論。

對於研究生物學、特別是研究達爾文主義和米丘林學說的讀者，這是一本有用的參考書。

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本書是按照中共中央關於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幹部理論教育的指示的規定，爲了便利讀者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和經驗而編印的。全書輯錄「聯共（布）黨史」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和中央指示中規定必讀的其他文件，按章分印爲四冊，並同時出版高級組和中級組用的兩種版本。第一冊將於六月中出版。高級組第一冊定價七千元，中級組第一冊定價四千五百元。

高級組　第一冊　目錄

布爾什維克黨在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時期。「聯共（布）黨史」第九章。）

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

列寧：論統一經濟計劃

列寧：論糧食稅

列寧：論合作制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

中級組　第一冊　目錄

布爾什維克黨在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時期。「聯共（布）黨史」第九章。）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

蘇聯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

一九二九年公布的蘇聯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是蘇維埃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底宏偉綱領。這個計劃曾經動員與鼓舞了蘇聯全體人民爲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忘我的鬥爭。一九三二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把蘇聯從一個貧弱的、技術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富强的、新技術的工業國，使蘇聯工人和農民徹底擺脫了剝削的桎梏，並爲蘇聯全體勞動者開闢了享受豐裕文化生活的康莊大道。研究和學習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文件，可以使我們得到許多重要的啓發與幫助。（即將出版）

論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

本書內容包含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擬定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示和古比雪夫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前一個文件指出擬製第一個五年計劃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基礎和前提，指出五年計劃的基本階級方針和解決經濟建設中的每一重大問題的原則，指出廣泛動員工農羣衆和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對於保證實現計劃的重要意義與作用。古比雪夫的發言，分析了五年計劃的基本方針和計劃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增加工業產量，發展重工業，各個最重要工業部門的任務以及發展比例、區域分佈、資金、技術人員等問題。（定價二千元）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